

[美] 彼得·巴恩斯/著

Peter Barnes

吴士宏/译

应用其作为成功企业家的多年经验，巴恩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将如何升级，以使其保护而不是毁灭我们的星球。任何眼光长远的人都应阅读此书。

—— 小罗伯特·肯尼迪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高级律师

讨回公共权益的指南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资本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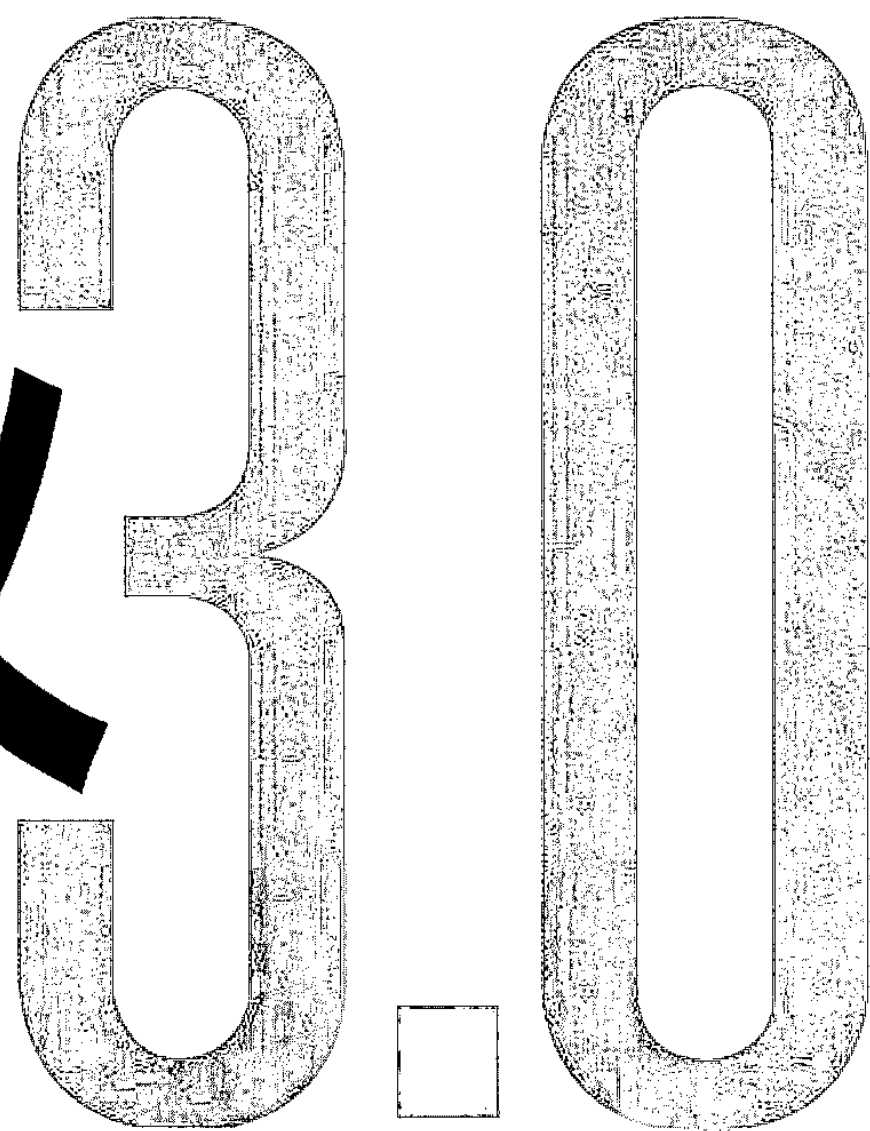
Capitalism

3.0

一本危险的书——它将带来资本主义的革命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讨回公共权益的指南

[美] 彼得·巴恩斯/著

Peter Barnes

吴士宏/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主义 3.0 / (美) 巴恩斯著; 吴士宏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7.12

书名原文: Capitalism 3.0

ISBN 978-7-5442-3876-2

I. 资… II. ①巴… ②吴… III. 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IV. 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7927 号

版权合同登记证号: 30-2007-163

悦读经济学

发现 财富秘密

项目创意 / 设计制作 / **紫图图书 ZITO**

本书著作权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或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及文章中作简单的摘引。违者必究。

Copyright © 2006 by Peter Barnes

Copyright licensed b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7 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

ZIBENZHUUYI 3.0

资 本 主 义 3.0

原 著 [美] 彼得·巴恩斯

翻 译 吴士宏

责任编辑 黄 利

封面设计 紫图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南海出版公司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10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876-2

定 价 25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资本主义 3.0
Capitalism 3.0

献给科妮莉亚与烟儿

To Cornelia and Smokey

因为，

劳动力是劳动者的无可置疑的财产，

当为其他人在公共权益中

保留了充足及同质的成果之后，

唯有劳动者对其曾

贡献出劳动的成果享有权利。

——约翰·洛克 (1690)

资本主义 3.0

Capitalism 3.0

讨 回 公 共 权 益 之 指 南

A GUIDE TO RECLAIMING THE COMMONS

[美] 彼得·巴恩斯 / 著

PETER BARNES

吴士宏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8·海口

推荐序

创造新文明的梦想

吴思

2000年夏天，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历史的长文，两千多年纵笔而下，意气浩荡，忍不住在结尾处遥想人类未来。

我想，市场经济制度的最大问题，就是它太能干了。无休止的竞争造就了人类的强大力量，打破了人类这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甚至其他物质运动形态的平衡。人类因此而遭到报应。造化中的弱者对人类的过度侵犯作出恶性反应，以自身毁灭的方式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这个道理和中国历代王朝走向崩溃的道理一样，官家过于强大，民不堪命，终于共同毁灭。

那么，如何是好呢？

我的梦想是：在人类的现实利益格局中，为造化的其他成员设立代表，替它们抵御人类的过度侵犯。不建立这样的制度，人类与造化其他成员的关系危机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将权利保护和代议制之类的设计扩展到其他物种。

中国的资源基础特别脆弱，或许能先行一步，抑制人类的过度侵犯，发展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文明。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梦想太奢侈了。毕竟这是全人类的前沿问题，而中国问题多多，公民的权利保护和代议制尚且屡遭诟病，哪里轮得上我们创造新文明？

读了彼得·巴恩斯的《资本主义3.0》，我有一种梦想成形的感觉。在这本书

中，巴恩斯为大气、河流、其他物种及尚未出生的人类后代找到了代表，建立了组织，帮助这个新生儿理顺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权利关系，而且借用了人类已有的组织创造，借用了市场的经济力量，借用了大众关心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

特别引人联想的是：巴恩斯认为，实现这个梦想的历史机遇，还没有在美国出现。在美国的制度中，选民和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最关注自己的眼前利益，放肆地从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那里借贷，拖欠不还，而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无力对抗。作者要等待时机，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安插一个债主。他说：“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支配了美国政府，但还不是全部。每个世纪总有一两次短暂的空隙，其间，非企业的力量能够占到一点优势。没人可以预言何时将会再出现这样的空隙，但可以放心地说，那是肯定会到来的。我们必须在其到来之前，为建立一个强大的、自我持续的公益部门作好准备。”

在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关注眼前利益的选民，都不能支配政府。我们似乎就在巴恩斯梦想的空隙之中，面临着由政府主导的文明创新的历史机遇。一旦梦想成真，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能获得新的财源。

中国真有机会先行一步吗？

我收到本书译稿的那天，2007年9月10日，新闻报道说，北京的平均气温比去年升高一度。我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日子。强汉，盛唐，气温就比上世纪50年代高出一两度，这没什么可怕的。但是，再往高走，历史经验就没用了。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我们？这类难题不肯等到中国解决其他问题之后降临，它现在就来了。在太湖，在淮河，在中国的东西南北，天上地下，危机无处不在。

2007年9月17日

译者序

升级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鉴

吴士宏

我为了公益研习，曾译了两本书（《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穷人的银行家》，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自传），也很明白了一点：做译者很难，并无意知难而继。于是，当紫图图书的编辑提议我翻译《资本主义3.0》一书时，我即以此作答。然而在阅读原著之后，我觉得这本书真是很有意思，犹豫再三还是放不下，最终就上手翻译了。

按照我的浅显理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资本主义既是当代最有效的社会经济体制之一，也是当代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根源，它肆意攫取人类共享的资源，超支挥霍人类与其他生物所共享的社会与自然资源。然而，资本主义的基本设计就是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其带来的弊病也都是出自其基因之“天然”。若想靠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幡然悔悟”是不可能的——那违背了其原始设计；若想靠着企业家们的“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不可能的——企业家们的终极义务就是要使企业在市场上获得成功；至于民主社会的民选领袖们，就更靠不住了——政客们要的是选票，而不是超过选期（四年或更久）的未来。要想纠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诸多弊病，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包括环境、气候等在内的严重问题，有两个思路，或者，推翻它；或者，升级它。作者提出的建议是，将资本主义升级：建立一个（一些）能够与资本主义体制达到平衡的机构体制，从而抑制资本主义的弊病，为当今社会、人类后代，以及其他物种保持维护并传承所共享的公共资源——包括自然环境资源、社会结构与文化。

题目很宏大——关系到整个资本主义体制；而结论很“简单”——建立公共权益信托机构，以人类后代以及人类以外物种为信托利益方。

在“公共权益信托机构”的设计之下，谁要继续占用这些今天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信托者的利益（比如，空气、水、矿藏），就需付钱，公共权益的资源，再也不是能够免费使用的。由此，企业将被迫投向更加可持续的科技，而那些公共权益的资源将得到保护。可能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可能站得住脚的：与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信托机构也是立足于财产所有权——资本主义体制下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许，为未来人类以及人类以外的生物的信托机构，就在这一点上可以最终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企业达到一种平衡？作者在书中阐述的一些当今已经存在的范例，也在表达着这种可能性。

我还不揣冒昧私下琢磨，这样的思路，或可能对中国摸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些启发和借鉴？或许在我们借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发展经验的同时，可以避免一些资本主义已经蹈之深重的麻烦？比如，以政府主导而建立一些真正为公共权益负责的信托机构……

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很多的学问，我都不大懂。只觉得这本书有意思，到底有没有意思，“意思”在哪里，还有待有识之士裁定。

谨此诚挚地感谢吴敬琏先生的关心，感谢吴思先生作序，感谢我的企业家与学者朋友们的兴趣和鼓励。并感谢紫图图书引入此书。

2007年10月

作者序

为《资本主义3.0》中文版序

彼得·巴恩斯

我是一个美国商人。我著写此书，旨在为我所看到的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些缺陷找到解决之道。然而，我相信中国也可以从本书的许多探索和思考中得到借鉴，因为你们也正行进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之上，也一定认识到了，这条道路并非通向天堂。

资本主义有很多好处——没有人对它能够产出丰富的、甚至是过剩的物质产品再抱有怀疑。但是，资本主义也确实存在着两个重大的副作用：其一，它毁坏自然；其二，它扩大贫富差距。它持续不断地、自动地重复着这两个副作用，并且不具备任何自我纠正的能力。如若中国不加小心，也将可能被卷入一种绝非愉快的社会环境之中。

然而，较之美国，中国有两个优势：其一，中国加入自由市场游戏的时间较美国短，尽可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其二，中国政府尚未像美国那样已被强大的私有企业所垄断。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另辟蹊径，从而在享有市场经济的要义精髓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

要想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公共权益部门。我指的不是一个强大的政府部门，而是指一个对人类未来后代与所有公民的利益一视同仁的、而非对资本或政客负责的部门。这个部门的角色是，保护自然，并确保每一个公民都能分享经由公共财富流动所产生的收益，其中包括一些非劳动产生的收入。在美国，这个部门可以经由信托的形式而得到最佳构建；在中国，或许有

其他方式可循，然而，目标应是相同的。

资本主义的这种新的形式，仍将保持其活力与效率，但还要兼备自我纠正机制，以限制其对自然的毁坏，以及财富被一小部分人所集中控制的状态。它将比美国当今的资本主义更加先进。我并坚信，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必将采用这种形式——若想在21世纪中生存。

我衷心希望，随着此书中文版的出版，中国也会以其中国特色的方式，迅速启动这个重要的转型。将来，也许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将不仅在于从中国出口的产品，并且于中国所出口的经济模式。

2007年10月26日

致谢

本书中所表述的思想是经由整个生命过程而形成的，所以，我心怀感激的人们远远多于了我所能提及的名字。

首先要提到我仙逝的双亲。我的母亲里贾娜（Regina）在世时是一位严格的英语教师，我的父亲里奥（Leo）是一位渊博的经济学家，所以毫不奇怪，我曾涉猎于新闻和商业这两个领域，而现在又在著写关于经济的书了。我的激情和语法，以及我的好奇与逻辑，归功于对他们二人各自的传承。

我的伴侣科妮莉亚·达兰特（Cornelia Durrant）使得本书终成现实。书中许多最锐利的看法，除了来自烟儿（Smokey）的，都来自于她。

我的编辑 Johanna Vondeling 从最初就理解此书，并把握了本书的全程轨迹；还要感谢 Steve Piersanti 与 BK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的全体同仁，感谢 John de Graaf 将我引介给 BK 出版社。

感谢 Seth Zuckerman 将无序的草稿理出清晰的头绪，否则我不可能按期交稿。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为我提供了在意大利贝拉焦（Bellagio）的写作地点，谨此深深地表达谢忱。

我在 Tomales Bay Institute 的研究员同事们——尤其是 Jonathan Rowe 和 David Bollier——从来都是思想和鼓励的源泉。还有，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我还要感谢 Dean Baker, Harriet Barlow, Connie Best, James Boyce, Rachel Breen, Marc Breslow, Peter Brown, Chuck Collins, Chris Desser, Peter Dorman, Brett Frischmann, Robert Glennon, Charles Halpern, Ann Hancock, Lewis Hyde, Marjorie Kelly, George Lakoff, Frances and Anna Lappé, Kathleen Maloney, Neil Mendenhall, David Morris, Richard Norgaard, Matt Pawa, Carolyn Raffensperger, Julie Ristau, Mark Sommer, Allen White, Bob Wilkinson, Susan Witt, 还有 Oran Young。

我还要感谢以下各位以其著述对我所产生的影响，他们是：E.F. Schumacher, Herman Daly, John Maynard Keynes, John Kenneth Galbraith, Ronald Coase, Louis Kelso, 还有 Henry George。

全靠着我的所有家人的爱与支持，本书的写作过程才成为可能，尤其要感谢伊莱（Eli）和扎克（Zack），深深地感谢你们！

目录

推荐序 创造新文明的梦想	4
译者序 升级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鉴	6
作者序 为《资本主义3.0》中文版序	8
致谢	10
前言	12

第一部 问题的提出

第一章 升级之时已至	20
第二章 资本主义简史	31
第三章 政府的局限	48
第四章 私有化的局限	63

第二部 解决方案

第五章 再造公共权益	76
第六章 造物之信托	89
第七章 共同的生存权利	110
第八章 文化共享	124

第三部 付诸实施

第九章 建立公共权益部门	140
第十章 你可以做的事	158

附录

企业、国家与公共部门的关键特征	170
注释	171
互联网资源指南	180
参考文献索引	182
关于作者	190
本书电子版本的说明	191

前言

我是一个商人。我相信社会应给予成功的创新者以利润的回报。同时，我也深知逐利行为所带来的不健康的副作用，诸如污染、浪费、不平等、焦虑，乃至对生活目的本身的众多困惑。

我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并不一概反对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然而历史说服我，政府未能适当地保护普通公民的利益，更不能对人类的后代、生态环境以及非人类物种提供有效的保护。其原因在于，多数时候——尽管还不是全部——政府都以私营企业的利益为先。这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系统性**问题，而不只是选举新的领导人所能解决的。如果你沿用传统的观点方法，你可能也会像我前不久那样陷入困惑和沮丧。如果我们知道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着深刻的弊病而政府又无能为力，那么，希望又何在呢？

我为我们时代的这一巨大困境而深受困扰。多年以来，右派一直在讲——不是讲，简直是在**大喊大叫**——政府有缺陷，而只有私有化、撤销管制以及减税才能拯救我们。而左派也一直在坚持，唯有政府才能够将我们从市场化的缺陷中拯救出来。问题是，两派都是正误参半。正确的是：两派各认为政府与市场是存在缺陷的；谬误则在于：两派认为唯一的拯救方案只存在于市场**或**政府之中。但若果真如此，我们将如何是好呢？或许，有一种被忽略了体制能够帮助我们？

10年前，当我从共同创建的运营资产公司（Working Assets）退休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困境问题。（运营资产公司，提供电话与信用卡服务，并通过其服务自动地向致力于改善世界的非营利组织提供捐助。）起初，我的思考集中在由于人工致热气体排放所带来的气候变化，有分析家将其视为“公共权益的悲剧”——这个概念在40年前由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¹（Garrett Hardin）提出，并得到普遍接受。根据哈丁的观点，人们出于内在的私利驱动，总会过度地耗费

公共权益。而我看到的则是双重的悲剧：其一，市场的悲剧，市场无法抑制自身的过度行为；其二，政府的悲剧，由于造成污染的企业威力强大，而人类的后代又不能为当局投票，政府就不去保护环境。

以这种方式观察形势，就导出了一个假说：如果公共权益是市场与政府失误的**受害者**，而不是导致其自我毁灭的根源，则解决办法就可能存在于对公共权益的加强之中。但如何能够做到呢？主流观点认为，由于公共权益历来缺乏明确有效的拥有者，所以历来很难对其加以管理。如果废弃物处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 Inc.**）拥有大气层，它就会对废气排放者收费，就像对在陆地上投放垃圾的人们收费一样。然而，没有什么人拥有大气层的权利，于是废气就可以没有限制、不用成本地尽情排放。

当然，无人拥有大气层是事出有因的。自人类有记忆起，空气从来就是充足的，所以从来不必去计较什么拥有权。但时至今日，早已昨是今非。我们广阔的天空已不再空旷，其间充斥着各色看不见的气体，改变着我们人类与其他生物一直赖以生存的气候环境。在这个新的环境之中，空气已变为短缺的资源，也许，若能够使得空气具有清晰的拥有者，并不是个坏主意。

但是，应该由谁来拥有天空呢？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就像修持禅宗（**Zen koan**），一个看似天真的询问，却意想不到地打开了很多扇门。我琢磨过如何创建一个拯救星球、拥有天空的营利性企业，毕竟，我曾经在持着良好的社会意愿的同时又能经营得很成功。当这种思路走不通时，我又想到一种可能，我们的社会是否能够创建一个代表未来人类来管理大气层的信托机构，而当代的公民则都作为其第二受益人。这个信托机构将会（假设它拥有大气层）像废弃物处理公司那样行事：根据向日渐减少的储存空间排放的废物量，向投放者收费。污染将持续减少而排放代价将持续增高。当信托得到最初的赋权之后，其他的就都会随之

发生，再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但是，如果真的由这个信托机构——而不是废弃物处理公司或是其他什么企业——来管理天空，还将带来一个美妙的奖励：每个美国人都将收到一份年度分红。

这个思想的实验过程已演变成为一个名为**天空信托**的提案，并取得了一些政治上的进展。这也是我关于公共权益思考的核心所在，并由此引出这本书。

个人的探索

本书背后的探索，远在我创建运营资产公司（**Working Assets**）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少年时，我曾帮助父亲为他所写的几本关于股市的著作演算数字，后来，作为《**新闻周刊**》（*Newsweek*）与《**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的记者，我撰写过许多经济方面的文章，但直到30多岁我才开始接受真正的经济学方面的教育。当时我刚刚度过了中年危机的阶段，我放弃了记者生涯而一头扎进了资本主义世界。

我当时的动机是多重的。一方面我已有些厌倦了写作，需要挣钱但又不想为别人打工；在另一个层面，我想看看我的很多想法到底是否行得通。我曾深受英国经济学家**E. F.舒马赫**（**E. F. Schumacher**）著作的影响，在其1973年的著作《**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中，舒马赫提出，资本主义已危险地偏离了自然与人类心灵。作为替代的方案，他展望了一个由小型企业所组成的经济体系²，这些小企业通常是由雇员所集体拥有的，并都使用清洁的科技。

怀着舒马赫的愿景，我投入了实践。我与五个朋友一道，创建了一个由雇员集体拥有的太阳能公司，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税制改变以前，公司一直都在蓬勃发展，而税制的改变压垮了尚不发达的太阳能工业。至此，我已深陷这个第二事业长达20年之久了。其间，我还创建了共同基金和一些电话公司，加入了一些银行和

制造企业的董事会，还投资了很多其他企业。所有这些我所投资投入的企业都具有一个共性，即在追求赢利的同时，还追求对世界的改善。这些企业的经理人们都有强烈的双重承诺：他们深知赢利是必须的，但同时都坚守着社会与环境的目标。

在此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运营资产公司的总裁，这个公司将毛销售收入总额的1%捐赠给致力于改善世界的非营利组织，捐赠份额是优先的而不是垫底的，无论公司是否赢利，都要捐赠。（我们有很多年都是没有赢利的。）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将其销售额的仅仅1%回报给社会，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企业从所处的大世界中**得到了**太多却从未付过费用。例如，如果没有大量免费的自然资源，我们如何能制造出任何产品？而如果没有诸如法律、道路和货币之类的大量社会基础设施，我们又将如何**销售**这些产品？我乐意这样想：我们都应该为作为有限责任企业所享有的特权而付出1%的使用费。

我还曾热衷于一个理念：以实证向其他公司证实，捐出销售额的1%，仍然是**能够**存活的，而运营资产公司可能触发一个能够改善世界的运动。我承认这是白日梦，但又不是全无逻辑的梦想。我的想法是，以1%的销售额回报社会，犹如给我们的基因（DNA）加入了一个变异基因，如果它能够市场环境中存活下来，就可能被传播开来。当对新员工宣讲时，我总是会讲，我们公司所追求的是，使社会责任的基因成为未来的商业主导基因。

当我在1995年从运营资产公司退休以后，我逐渐开始反思我曾浸淫其中的这个逐利的世界，我曾在其中花费了20年时间尽我所能来对其系统进行测试，试图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双重的底线。我与那些对于自然、雇员与社区抱有真切关心的经理人和投资者们同袍共事，到头来，所有这些抱有良好动机的人们还是丝毫不能撼动追逐利润的主导底线，即使在生意增长的时候也不能。

反思之下，我意识到，自成年起我就一直在追问的问题实质其实是：**资本主**

义是否是短缺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或者，它本身就是现代的中心问题？这是个多重层次的问题，但对于各个层次的解析都使我得到了同一个判断：尽管资本主义在其产生之初的确曾是很棒的解决方案，但今天，它已经成为了当代的中心问题。它曾经是正确的，然而，时代已经改变。

当资本主义诞生之初，自然资源丰富而资本短缺；于是，优先鼓励资本发展就是很合理的。时至今日，我们已被资本所淹没，而自然资源却在被迅速地消耗掉，同时正在丢失的，还有那些丰富我们生活的各种非物质的社会性的安排。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完全过时或一无用处，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其加以修正。我们必须使其适应 21 世纪而非 18 世纪。并且，这是可以做到的。

如何对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加以修正呢？又如何能够**从容优雅**地将痛苦和干扰降低到最低呢？答案是：像比尔·盖茨那样，升级操作系统。

本书的范畴

正如我们的宪法制定了政府的规则，我们的商业操作系统也制定了商业规则。我使用复数的所有格“我们的”，以强调商业操作系统是属于所有人的。它不是不朽的，我们有权对其升级，正如我们有权修改宪法。此书将阐述我们必须对其升级的理由，新的操作系统的样貌，以及如何安装。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中，我对现有的操作系统，我称其为**资本主义 2.0 版本**（资本主义 1.0 已于 20 世纪 50 年代左右寿终正寝，我在第 2 章中将对此加以阐释）。我描述了这个系统是如何地吞噬自然资源、加剧不平等，以及如何使我们在此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幸福。尽管许多读者或许已经对此类问题有所了解，而我是以新的视角来揭示这些问题的非偶然性——它们都是我们的商业系

统软件的必然结果。这就意味着，只靠修修补补是不可能纠正这些问题的，我们必须重新编写系统语言。

本书的第二部分集中于资本主义所应有的样貌，我将其称为**资本主义 3.0**。2.0 版与 3.0 版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新的版本中包含了一个我称之为**公共权益部门 (common sector)** 的机制。改进后的商业系统将不再由单一的引擎——即企业垄断的私有化部门——所驱动，而是拥有了双重引擎：一个为了追求私营部门的利润最大化，另一个则要保护并扩大公共财富。

这一对引擎——称为企业部门与公益部门——相辅相成而又相互制约。其中一个来满足我们的“我”之私利，另一个则会满足“我们”之共同利益。当两者之间达到平衡——这将是政府的主要任务——这对引擎就将把我们带向更加繁荣和安全的境地，远远超过现在的单引擎的能力所及。并且，它可以实现这些功能，却不会毁掉我们的世界。

在第二部分中，提出了一些新的关于财产权、生存权，以及各种形式的加强公共权益部门机制的建议。我认为，这些建议是理想与现实因素的融合。其中包括：

- 一系列为了保护空气、水、森林以及物种的生态信托系统；
- 一个将要为全体美国人派发红利的共同基金，每人一股，人人有份；
- 一个为每一个儿童提供启动资本的信托资金；
- 一个人人可以享受的分担风险的健康储备；
- 一个支持本地文化艺术的、资金来源于版权费的国家基金；
- 对广告数量的限制。

本书的最后部分，解释了我们如何能够从当下逐步到达资本主义 3.0，其模式的运作方式，以及你、我将如何发挥作用。

贯穿本书的**主要角色**是企业、政府与公共权益。情节如此展开：幕布升起，企业正在大肆侵吞压榨公共权益，它们是街区上的老大。而公共权益——自然、社区、文化，这些没有组织的散兵游勇——则是常败的一方，它自己没有财产权，全靠着政府的保护，然而，政府却是个严重偏向企业的靠不住的守护者。

万幸，企业还只是在**大多数**时间内控制着政府，缰绳总会有偶尔松开的时候。于是，有可能作此想象：当下一次企业对政府松缰时，政府——代表公众的角色——迅速地转向有利于公众权益的方向，为公共权益信托分派新的资产权，建立公共权益的基础设施，孵化出一个真正的共同拥有的新兴阶级。当企业再度收紧对政治的控制时，他们注定要这样做的，却已经无法瓦解这个新的体系了。这时，公共权益已经有了保护和权益拥有者，已经作好了长期准备。于是，企业也就只好接纳公共权益为业务伙伴了。他们会发现，他们还是能够继续赢利，能够规划未来，而且，甚至可能拥有更多的全球性竞争力。

本书中所提到的所有这些建议，都不会明天就结出果实。那也并非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点亮一个灯塔，随着机会的逐渐呈现，一点一点地显示出我们所应建立起来的系统的样貌，我预见，这个系统的建立将是跨越数代的长期过程，其间将不时被迅速突变的时段所打断。这个过程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其中包括商人和政治家，经济学家与律师，公民，以及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如果我们不想迷路，就需要一个指南，而这正是我希望本书所起到的作用。

第一部

Part 1

问题的提出

THE PROBLEM

第一章

升级之时已至

社会就是一个契约……在活着的、
死去的以及将要出生的人们之间的契约。

——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1792)

历史上首次发生了这样的情形：我们给儿孙所留下的自然世界，将比我们从先辈所继承来的要恶劣得多。我们只顾眼前地耗费这个地球的资源——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很多个世纪，而是因为，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长期累积的恶果已经达到了若干临界点。大自然有其自身的承受极限，而我们已经触犯到了很多极限，并很可能已经在有些方面超越了极限。

世界的形势

比如，想想我们的大气环境，对其造成损害的不仅是今天的污染，还包括我们在过去那么多世纪中排放到空气中的烟雾。至今，造成了冰川融化，飓风肆虐，以及湾流减弱。几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发出警告：更坏的还在后头。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是：是去主动地改变我们的经济体系，还是等着大气环境来改变我们？

再想想科学家们所说的**生物多样性**。地球是在冰冷、黑暗的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生命岛屿，人类与成千上万其他物种分享这个奇妙的小岛，其中大多数物种我们从来都不曾认识，而每个物种都在生命网络中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然而，我们一点一点地将其他物种从它们的生存空间排挤出去。其结果即如6500万年前恐龙曾遭遇的灭绝浪潮。所不同的只是，恐龙灭绝是由环境突变所触发的，而当代的灭绝浪潮则是由我们的日常行为所引起的。

我们所危及的还不只是其他物种³。人类学家杰拉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与罗纳德·莱特 (Ronald Wright) 最近提醒我们，那些已经消亡的人类文明，如苏美尔 (Sumer)、罗马 (Rome)、玛雅 (the Maya)、复活节岛 (Easter Island)，也都曾有过与我们今天的经济系统席卷全球的行为非常类似的小规模行为：他们毁掉了自己的资源基础而导致崩溃。方式之相似简直如影随形。首先，这些文明都找到了同样一个从生态系统中攫取价值的公式——农业，灌溉，渔业，资本主义。因为这个公式是如此行之有效，文明的领袖们都盲目地依附于它。逐渐，这个公式所依赖的关键资源被剧烈地消耗，缺乏灵活性的文明即如纸牌搭建的房子轰然倒塌。

我并非在预言我们将会重蹈覆辙，因为我们可以修改我们的经济操作系统，还有机会逆转厄运。但切勿轻视我们今天已经面临的危险——真切而巨大的危险。留给我们升级操作系统的时间已然不多。

我对“公共权益”的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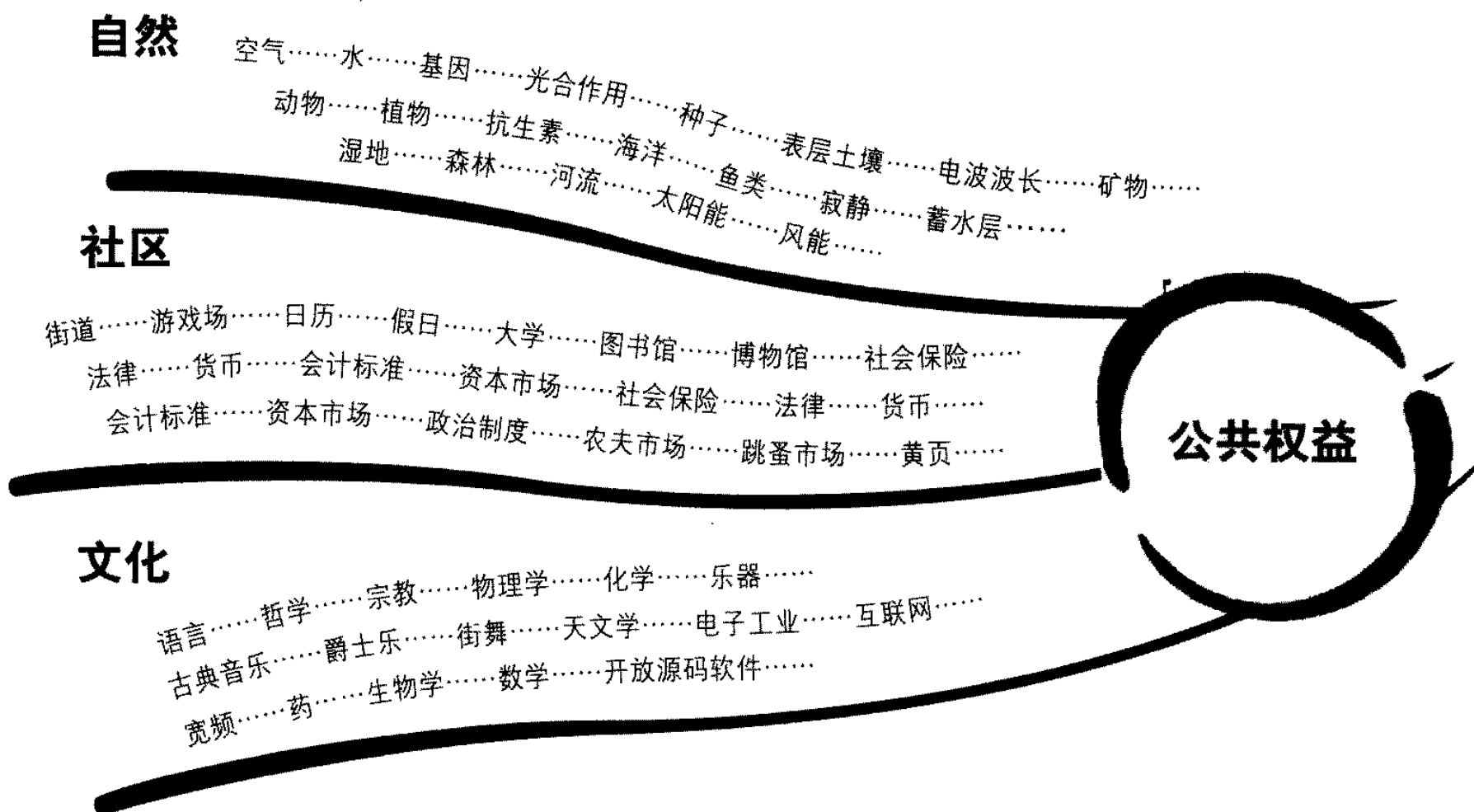
提到“公共权益” (commons)，很多人会联想到草原牧场，那个古老的寓意并不是我的解释。在本书中，我使用“公共权益”作为一般性指称，就像**市场**或**国家**，意指我们所共同继承的所有遗产或共同创造的所有财富。

在此定义范畴的公共权益所代表的资产都具有两个特性：都是赠予，并都是共享的。赠予，相对于我们所挣得的东西，是我们所接受的馈赠；共享的礼物，是我们作为社会成员所集体而不是个人所接受的馈赠。这类的例子包括空气、水、生态系统、语言、音乐、节日、货币、法律、数学、公园，还有互联网，这些都是共享的礼物，还有很多很多。

这些纷繁各异的礼物，就像具有三个支流的一条大河：**自然、社区、与文化**（见图 1.1）。这条宽阔的大河引导并环绕着资本主义，为其（也为我们）增添着巨大的价值。的确，我们不能够脱离它们而生存，也肯定不可能生存得好。

公共权的资产还具有另一个特性：我们所有人都对其负有共同的保护义务，因为人类的后代像我们一样，要靠此才能生存、才能生存得美好。我们这一代人

图 1.1 公益大河的三条分支



无权说“这些赠予到此为止”。这种共担的责任所引入的道德因素，是其他形式的经济资产所没有的：它要求我们必须将对后代的责任铭记于心。而这可不是市场的自然行为，如果某种资产能为资本赢得具有竞争力的回报，市场就会让它好好地活着；否则，就任其消亡，没别的可说。

而公共权益的资产，**无论其对资本的回报**，都必须被保护。我们既然继承了共享的礼物，我们起码有责任将其保持原有的价值，若能有所增值就更好了，至少不能使其价值受到贬损，当然，更完全无权将其毁掉。

在“公共权益”之外，我还使用了几个听起来有些相似的词汇，需要在此一并说明：

- **公共财富** (*common wealth*)：我指的是包括公共权益的所有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资产价值。相似于股东所持有的企业股权，由于公共权益的管理的好坏，其权益价值也会逐年起伏。
- **公共资产** (*common property*)：我意指那些被人为制定的、存在于私有财产与国有资产两者之间的权利。与私有资产相似的是，公共资产由于得到国家的承认而得到确定；与私有资产不同的是，它是**兼容的**而不是**排他的**——它尽可能争取最广泛的共同拥有，而不是相反。
- **公共权益部门** (*common sector*)：我指的是我们的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有组织的部门。其中包括了一些我们所共同继承的资产，但不是全部。事实上，它是我们按照公共权益的原则所精心构造起来的一个公共权益的子集。眼下它还很小，但本书的意旨正在于：我们须使它强大起来。

公共权益的悲剧并非如你所想象

如果你在拿起这本书之前就曾听说过“公共权益”(commons),你很可能已被加勒特·哈丁写于1968年的题为“公共权益的悲剧”的那篇文章所影响。在那篇文章中,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用一个无人管理的牧场作为比喻,来诠释许多全球性问题的根源。

一个理性的牧人认为,一头又一头地增加他的牧群的数量,才是唯一明智的努力方式。但这是所有分享公共权利的理性的牧人们的共同结论,于是就引发了悲剧。每个牧人都认定可以无限地扩大自己的牧群——而所处的世界却是有限的。当每一个牧人都在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时,毁灭就已经注定……公共权益中的自由放任,导致全体的毁灭⁴。

哈丁的悲剧理论来自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而怀特黑德的理论则是源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根据怀特黑德的定义,悲剧的本质是“无节制的作为”。在哈丁看来,公共权益注定会自我毁灭。对于公共权益的不可避免的命运,人类无可作为。

关于人类对于自然的持续破坏,哈丁是正确的;至于其根源以及其命运的不可避免性,他却错了。真正的破坏者从来都是来自公共权益之外的力量,而他却归咎于公共权益自身。在哈丁的假设之中,公共权益是完全没有管理的,面对外力完全不能自己保护。然而,并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证实为什么公共权益就不能按照公共权益的方式加以管理。

与哈丁的描述相对立,中世纪的欧洲公共权益(不仅包括牧场,还包括森林与河流)可远非是缺乏管理的。他们制定规矩,禁止外人进入,并限制本地人的

使用。例如，在瑞士村庄中至今还沿用着一个规矩，农民在公共牧场所放牧的牲畜数量，不得超过他们在冬天以自家牧场所能够牧养的数量。换言之，**管理状态**下的公共权益并非注定是要自行毁灭的。公共权益的真正威胁，在于它的封闭性以及外部的入侵。

我们的经济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以一系列指令使得一个大的系统之中的各种运动协调进行。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计算机操作系统，它协调键盘、屏幕、处理器等等部件。以编程语言写成的操作系统可以电子的方式存在（如在计算机中），也可以化学方式存在（如在基因中），或者以社会现象或法律的方式存在。编程语言常常是可以用来表达的方式来表达的。

正如我们的宪法为我们的民主制定了规则，我们的经济操作系统也制定了资本主义的规则。而经济操作系统不及宪法那样被广为理解，也没有被包含在一个精确的文本之中。如果你寻找它，它就会现形，但它其实是隐藏在法令和案例判决的外衣之下。然而，就像宪法一样，它确实**存在着**——并使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运行。

在思考我们的经济操作系统时，我愿意将其与名为**垄断**的棋类游戏规则类比：游戏对起始条件、游戏规则以及奖惩实施等等都一一做了规定。部分是通过法律加以规定，其他部分则经由**资产 (property)** 和**货币 (money)** 之类的虚构事物予以规定。

所有操作系统都有回路⁵设计——当发生特定情况时执行此指令，其他情况则执行其他的相应指令。回路反应可能是善意的（反应行动纠正了问题），也可能是恶意的（反应行动使得问题恶化）。一个可靠的系统具有很多善意的反应回路，并有效地清除恶意回路的芜杂丛生。

有时，在人为制造的系统里，必须特意添加善意的反应回路。例如18世纪的发明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在发明蒸汽机时，就设计了两个关键机制⁶（一个就是蒸汽驱动引擎，还有一个离心力管制机制）以保证引擎不会失控，当离心力管制机制觉察到风险（过速）时，它就会自动地加以调整。

弊病与欲求

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观察到，那些产生了辉煌财富的经济体系，也孵化出他称之为**弊病**（*illth*）的现象——贫困、污染、绝望、疾病，等等。这些经济体系使得一些人的生活很舒适，而代价则是使其他一些人很难过。

弊病的现代经济学语汇是**外部副作用**（*negative externalities*）。其含义是，经济交易的成本对于所涉及的各方都是“外部”的成本。举一个经典的例子：某个工厂将污染物排入河中，所有家庭都要付垃圾收集的费用，而工厂污染水源却不付费用，而下游的人类与其他生物却要为此付出代价，动植物受到危害甚至会死亡，还要城市为此建立昂贵的处理工厂。从工厂主的立场来看，这些都无所谓。但以自然与社会的立场，这些都是外部副作用。（有时也会有外部正作用——例如，你的邻居重新粉刷了她的房子，可能会使得你的房子也有所升值。）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向我们保证，我们的经济机器喷发出来的财富是如此伟大，而弊病是如此微不足道，我们完全不必去介意外部副作用。倘若曾经确实如此，那么现在肯定已经不是了。现代的气候改变，就是外部副作用的典型例子。我们为地下蕴藏石油的地主们付钱，为勘探者、提炼者、运输者和销售者们付钱，但就是不会有任何人因为向大气中排放致热气体而为自然或其他任何人付钱。我们将这些代价转嫁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狂欢，而他们付账。

更过分的是，许多外部副作用的产生甚至根本就不是为了人类合理需要。**欲求** (*thneed*) 这个词并未存在于任何经济学的范畴，但它的确是一个代表性的现代困境。西奥多·盖泽耳 (Theodor Geisel) ——以瑟斯博士著称——在他的童话故事《**劳莱克斯**》(音译: Lorax) 中造出了这个词。“欲求”，是指我们想要而其实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许多家长都会记得，《劳莱克斯》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家 (“一次性”，the Once-ler)，而它的对头就是那个常常唠叨着“为树木代言”的讨厌的劳莱克斯。“一次性”把特鲁夫拉 (音译: truffula) 树统统都砍倒而创造了欲求。当劳莱克斯提出反对时，“一次性”答道：

我的用处真不小啊，这用处就是造“欲求”。

“欲求”是人人想要的好东西，欲求于是变成了“需要”。

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相当于**欲求**的技术性名称，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那些经济“需求” (demand)，只要是能以金钱衡量的，全都是一回事。然而，确实有必要加以区分。可以想象一条从“需求”到“欲求”的轴线：一端是食品、住所、基本交通条件以及医疗保健，而另一端是可口可乐、苹果牌随身听 (iPods)、还有悍马。(很重要的一点是，“需求”都是通用的，而“欲求”则往往标有品牌。) 满足“需求”更多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欲求”则需要推销。然而，我们的经济体系却越来越多地将稀缺资源都给予了“欲求”。

为何我们会有如此多的弊病与欲求？因为，我们的经济体系操作系统太不平衡。一方面，是代表资本拥有者的无比强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另一方面，则代表着子孙后代、人类以外的物种以及人类中那些成千上万的生存需求未得到满足的人群——他们却无权无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个系统缺乏对于共享遗产的保护机制，既不会要求企业为损害自然环境付出代价，也不会去强化那些基

本生存需求被忽略的人们的权利。于是，这个系统持续产生出更多的弊病和垃圾，并更加扩大着穷富的差距。

升级我们的系统

我们是否能够设计、安装并升级一个系统来纠正这些问题呢？这看起来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历史上就曾有过类似梦想成真，那就是1935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律。

正如我在此所建议的改变，社会保险制度就是一个例证，它跨越了几代人的努力而最终集成到我们的经济体系操作系统之中。社保制度的设想、设计、建立始于20世纪初期，是为了应对当时的一个严重危机：成千上万失去劳动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群。其沿用至今的基本契约一直都很简单：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群集体赡养退休人群，从而也能在老年时得到后代劳动者的赡养。70多年来，这个契约一直被一个信托基金所托管，从未延误过发放保障金，也从未发生过任何丑闻或浪费。多亏操作系统的这次升级，曾经泛滥成灾的老年贫困问题，已经基本成为历史。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与此类似的系统升级，这次所要纠正的是，资本主义对于自然环境与人类后代的漠视，以及中青年人群的贫困问题。

本书的前提假设

所有思维的过程，都始于假设的前提然后终于结论。以下就是本书的主要假设于前提。

1. 我们有一个契约

每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都有一契约，要将共同继承的遗产传递下去。这些

遗产包括三个大类：自然资源、社区、与文化。第一大类中包括空气、水与生物体系。第二类包括法律、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很多将我们彼此联系起来的系统。第三类包括语言、艺术、科学，等等。所有这些遗产都具有无上的价值，如果不能将其增值，也必须得到保值。

2. 我们不能只顾自己

倘若能够更谦卑一点儿，就能使我们这些在世的人类受益匪浅。这不仅有益于我们的子孙，也有益于其他物种以及它们的繁衍，哪怕它们的生存对我们来说没有用处，它们也有生存的权利。一个经济系统，应能同时代表它们的和我们的利益。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实现方式。

3. 存在弊病

贫困、污染、绝望以及疾病——约翰·拉斯金称之为**弊病** (*illth*) 的东西——都是资本主义的阴暗面，而这些阴暗都需要被纠正。

4. 修改原码，而不是表征

如果我们想减少整个经济体系的弊病，就必须改变那些导致问题的源码。病后问症并非上策。除非纠正了源码，否则无论如何去清理擦拭，我们的经济机器还是会不断地产出更多的弊病。再说，防病总会比治病更便宜得多。

5. 聪明地进行修改

现有程序中有很多部分运行良好而不必大动挞伐。“不要修理没有坏的东西”诚乃箴言。**确实**需要纠正的部分，应该随实际需要而逐步加以纠正，应尽可能地柔和、尽可能地低成本。要注重实际效益，还要从容。

6. 金钱不是全部

金钱是我们经济体系的血液，但它不应成为我们的灵魂。人类有些需求和理想是不能以金钱交换来实现的。这些需求包括与家人与社会的联系，与自然的接触，以及生活的意义。21世纪的经济体系也必须能够对这些需求作出应答。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系要直接实现这些非金钱欲求，相反，最好的方式是为这些非金钱欲求预留实现空间，这个体系所不应该做的，就是**阻碍**这些需求的实现。

7. 有效的激励

除了以上所论述的观点，一个经济体系仍需具有对所希冀行为的激励机制才能最有效地运行。如玛丽·波宾斯（Mary Poppins）指出：“加一勺糖就能把苦药吞下去。”（我也从不会忘记，一品脱免费的本和杰瑞冰淇淋，就是运营资产公司吸引客户的最棒的绝招。）当我们寻求保护自然与后代的方法时，当然也要找到对当代人类的有效激励方法。

如果你对以上这些假设持有任何反对，你大概就不会同意我的结论。而如果你认同这些立场，欢迎继续阅读。我不会用统计数字来烦扰你，也不会喋喋于地球正在恶化之类的郁闷说教；我对这些已经烦了，你大概也早就烦了。也别指望我会说出什么拯救地球的十个简单行动，你当然知道不可能有这么简单的事。我**将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如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步一步地改造我们的经济体系，使其能够符合自然与人心，并仍能充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

或许，资本主义也不能逃脱浮士德（Faustian）的交易规律：若想得到好处，就必须接受坏处。但即使我们必须得与魔鬼作交易，我相信，我们也能够达成比现状要好得多的交易。我们必须精明、强硬、勇敢。我坚信，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达成**更好的交易，我们就**能够**达成。无论如何，我们的子孙与众多的其他生物种类，都指望着我们呢。

第二章

资本主义简史

只因偷了公共财产的鹅，
男人吊起来，女人吃鞭子；
而偷走了鹅群的公共财产的大坏蛋，
却尽可逍遥自在。

——18世纪50年代的英国民谣

在我们考虑如何升级我们的经济操作系统之前，首先值得仔细地审视其根脉缘由。有两条平行的脉络显现出来：公共权益愈行愈弱，私有企业越来越强。

公共权益的削弱

早先，处处皆是公众权益，人类与其他动物在其间狩猎共生。与其他物种相同，我们人类也都各有疆界，但那是部族的而不是个体的疆界。

大约10万年以前，人类兴起了农业以及固定的居住地，也就随之产生了私有财产，产生了按照家庭人口（通常是按照男性人口）分配土地的规则。通常是由战胜的征服者为其属民分配土地，资产权可由属民的后代继承——典型的情形

是由长子获得所有财产。在欧洲，许多做法是根据罗马律而制定的。

尽管私有财产在增加，在欧洲仍有很多土地被保留为公地。在罗马时期，水源、流域岸线、野生动物、还有空气，都被明确规定为**全体共享的资源** (*res-communes*)。在中世纪，国王与封建主们常常会攫取对河流、森林、野生动物的拥有权，但也只限于有限的期限之内。英格兰的约翰国王于1215年被迫签署了《大宪章》 (*the Magna Carta*)，将森林和鱼类也确立为**全体共享的资源**。鉴于森林是游戏、柴薪、建筑材料、草药、动物畜牧等等的资源，这一转变非同小可。

在17世纪，约翰·洛克曾探求公共权益与私有资产之间的平衡。像他同时代的人们一样，他也看到私有财产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在与公共权益的相关关系中存在着的，并且总是此长彼消。私有财产增长的理由是它促进了经济产出；而公共权益同样具有存在的理由：它为所有人提供可持续的能力。两方面都必须受到尊重。

洛克相信，地球是主赐给人类的“人类共同财产”，但他同时也相信私有财产有其存在的道理，因为它能鞭策人们去努力工作。当一个人以其劳作与自然结合时，他“投入了自有的劳力，从而使劳动成果成为他的私产”。然而洛克在此处加入了一个重要的限制语句：“因为，劳动力是劳动者的无可置疑的财产⁸”。他写道：“当为其他人在公共权益中保留了充足的以及同等质量的成果之后，唯有劳动者对其曾贡献出劳动的成果享有权利。”换言之，个人可以获取财产，但他或她所能够合理地取得财产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由两方面的考虑组成：第一，不应超过其劳力所及的范围；第二，必须首先在共享的公共权益中为他人保留“充足的、同样质量”的权益。这一点与当时的英国公共权益律法是一致的。比如，律法规定，滨河地段的地主可以汲水供自己所用，但不得影响他人用水的需求。

尽管有洛克对于平衡的寻求，英国的公共权益并未能够达到长治久安。在18世纪和19世纪，对抗公共权益的圈地运动与私有化运动加速发展。根据历史学者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的观点，正是这类圈地运动启动了时代的巨大变迁⁹。在议会的支持下，地方绅士将乡村的土地加上藩篱，使其成为私有财产，贫穷的农民则流浪到城市，并转变为工业劳动力。地主们则将其农业所得的利润投资到制造业之中。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现代经济由此而始。

这个变迁的另一位观察者是托马斯·佩因（Thomas Paine），一位美国独立的倡导者。注意到针对公共权益的圈地运动给少数人带来好处而使多数人失去了继承的权益，佩因提出了一个补偿方案——但这并不是对圈地的逆转，他认为圈地具有必要的经济作用，而只是对其作用加以补偿。

亦如洛克，佩因也相信，自然是主对所有人的赐予。“有两类财产，”他写道，“第一类是自然资产，也就是伟大的造物主所赐给我们的——如土地、空气、水。第二类是人类制造或获取的财产——人类的发明创造。”他继续说，在后者中不可能实现平等；但在前者之中，“所有个体都拥有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由于圈地运动对生存权利所造成的损害，所以须有相应的“损失补偿”。

佩因于是提出一个“国家基金”的建议，来做两件事情：

通过建立土地拥有资产体系¹⁰，[付给]每一个达到21岁的人总共15英镑（pounds sterling）作为对他或她的自然遗产损失的部分补偿；并且，所有人自55岁起，在有生之年中每年都会得到10英镑。

一个半世纪之后，美国建立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社会保险的国家基金，部分实现了佩因所建议的方案。我们尚未采纳佩因所建议的另外一部分，但其基本原则——对公共权益的侵占须得到补偿——在我们和佩因的时代，同样重要。

在欧洲平息战乱的那些年里，美国建立了其自己与公共权益的关系，其中包括从原住民与墨西哥那里所掠夺的未设防的广大地域。有些美国人将公共权益视为在其上建立起了一个由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群所组成的国家的那片土地。他们通过了一些法律，包括1785年的《土地法规》(Land Ordinance)，《宅地法》(the Homestead Act)，《莫里尔赠地学院法》(the 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还有《复垦法案》(the Reclamation Act)，其中规定了定居者的家庭占地规模，也规定了投资办校以使得定居者能得到教育。还有很多人出于对这些土地上的野生物种与美景的珍视，创建了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保护区。

而同时，另有一些人则在不断蛊惑国会以取得没完没了的让步，谋取巨大的公共权益来为自己赚大钱。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这两个事例，就生动显示了这个仍在持续的过程。

1877年，国会通过了《沙漠土地法案》(Desert Land Act)，从《宅地法》(Homestead Act)所规定的地域中减除了数百平方英里，据说这些土地毫无价值，任何人只要保证提供灌溉，就可以每英亩25分钱的代价把这些土地买到手。事实上，大部分土地绝非没有价值。詹姆斯·哈金(James Haggin)和劳埃德·蒂维斯(Lloyd Tevis)都是加州参议员阿伦·萨金特(Aaron Sargent)的密友。他们看上了一块靠近科恩河(Kern River)的地段，那块地已有一部分被别人买妥了。这两人通过雇佣无赖提出虚假诉讼，再将土地权转移到手。在加州人还没听说过《沙漠土地法案》之前，哈金和蒂维斯已经买下了150平方英里土地。随后，在这些土地下发现了石油，这为这两位土地掠夺者的继承者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1995年，国会决定，美国的电视将由模拟信号升级到数字信号。这需要一套新的广播频率，国会又一次将频率给予了——免费地——那些曾免费享用了模拟

信号频率的同样一批公司。共和党领袖，参议员鲍勃·多尔（Bob Dole）声称：“国会要制定一个巨大的企业福利项目是毫无道理的”¹¹……说到底，就像森林资源是我们的国家资源一样，波长频段也是所有美国人平等共享的国家资源。”然而，那些媒体公司还是又一次免费得到了波段资源。

如果做一项会计运算，仅在美国，被私有化侵占的公共权益就达到以万亿美元计的价值。事情总是如此地相似：每当公共权益具有了商业价值，就会有人来试图攫取，在以前是那些有政治关系的人们，而现在，则是那些拥有政治权势的企业。令人震惊的不是这些情形的发生，而是普通公民对此的懵懂不知。正如前内政部长（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沃尔特·希克尔（Walter Hickel）所指出的：“如果你从他人的钱包里偷了10块钱¹²，可能就会打起来了。而如果你从他人与其后代所共同拥有的公共权益中偷走几十亿，他可能根本毫无觉察。”

在圈地过程中，资产权的被攫取或被给予，只是公共权益削弱的部分原因。另一半原因则是所谓**外部副作用**的侵蚀——这里所指的是，将代价**转嫁**给公共权益。外部副作用与圈地运动同样地冷酷无情，却更不易引起注意，因为它并不需要政客的积极支援。当企业无偿地、未经许可地向公共权益释放着弊病的同时，也就在持续地、静悄悄地进行着对公共权益的损害。圈地运动与外部副作用交互实施着对公共权益的打击。一方面，企业从公共权益中**攫取**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私有化；另一方面，他们向公共权益倾泻坏东西而不付任何代价。结果就是，企业得到利润，而公共权益持续贬值。

企业的上升

我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企业，特指那些在股市公开交易股票的企业。它们都具有董事会成员，一系列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随时波动变化中的股东。董事与高管对

股东负有法律的责任。这些企业具有一个清晰的使命：为股东谋求最大化的利益。

当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在1776年著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时，大不列颠或美国的企业还只是寥寥可数¹³，主流的商业形式是合伙制，由一小群彼此熟知的人合伙拥有并运营的企业。在大众看来——与斯密相同——由经理人向陌生人出售股票的企业形式，从来就是靠不住的。无数丑闻都在证实这种观点。然而，随着企业的兴起，合伙制显现出其不能充足聚集资本的局限。而企业的明显优势则在于**能够**从陌生人群那里聚集到足够的资本。这一方面得助于法律关于股东责任限于其投资额的规则。

早期的美国，法律部门以一次性的颁布条例对企业实施控制。典型的做法是，针对某一项商业活动——例如，修建一条运河并收取使用费用——而得到特许经营权的某个企业只能在颁布的条例范围内运营，不许做其他事情，在特定的年限之后，条例失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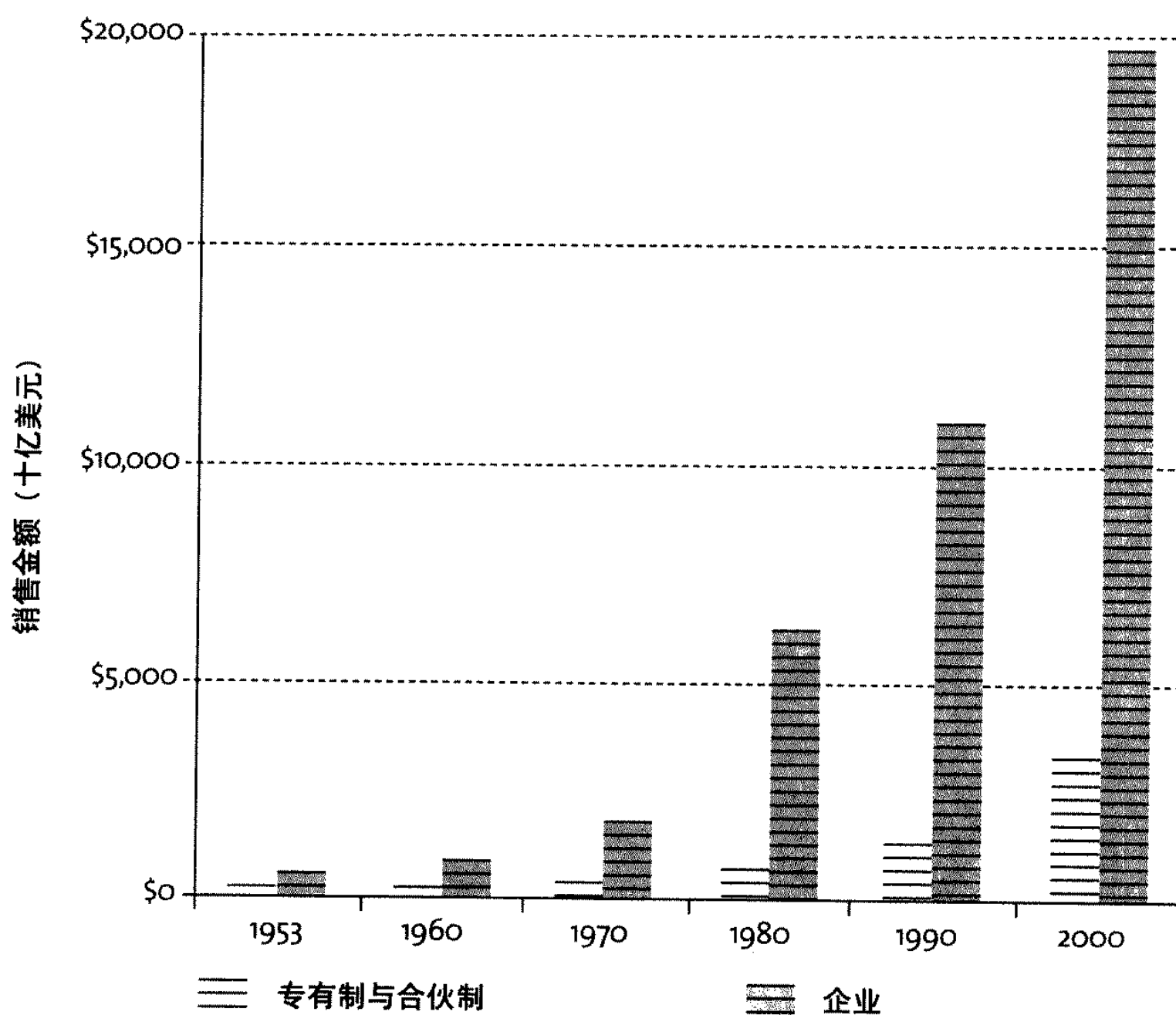
这种限制并未持续很久。19世纪中期，企业已经可以应用任何法律手段来并购其他企业，而拥有无限的寿命期限。1886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企业即是“法人”¹⁴，并享有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公民权利。实际上，一个企业连锁机构已享有了包括不变、自治以及有限责任的至高的主权权力。

这些改变使得企业不但拥有了巨大的经济能力，还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不同于普通公民，企业可以支配大量的金钱，应用这些金钱。他们可以雇用说客，影响公众意见，并对政客们慷慨捐助。只要是符合他们的需要，他们就可以起诉或是以起诉相威胁。他们唯一不能作为的就是选举。然而，以他们所拥有的丰沛能量，他们几乎不必操心选举这码子事。至20世纪末，企业的威力——经济与政治的威力——已遍及世界。以美国主导的国际条约，不仅降低了关税门槛，还延伸了企业的财产权，减弱了主权国家对企业的不同方式的约束。简而

言之，企业所希冀的主要部分都已得到实现：即他们可以在全球市场上自由无碍地调度原材料、劳力、资本、产品、纳税义务，当然，还有利润。

这些都没什么不好，只除了两点：第一，尽管有最高法院的把守，现代企业

图 2.1 华尔街 VS “大街”，1953—2000 年



源自：美国历史统计，Colonial Times to 1970（华盛顿：美国商业统计局人口普查办公室，1979）<http://www2.census.gov/prod2/statcomp/documents/>，详见 1970p2.zip

美国统计摘要（华盛顿：美国商业统计局人口普查办公室，2005）<http://www.census.gov/prod/2005pubs>，详见 06statab/business。

毕竟不是一个真人，而是一个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所设计出来的自动机制。它最大限度地将成本外部化，并非它想要这样做，而是**必须要**这样做。它从不会休息或减速，也永远不会当达到某个预设的利润指标时而作出“够了，我们就此歇了吧”的决定。

第二个困境是，这些自动机制会持续地变得更大、更强。1955年，财富500强企业的销售额¹⁵占到全美国国内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一，至2004年，这个份额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也就是说，这几百个企业不仅吞噬着公共权益，还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合作方式的小公司或专有的企业。（见图2.1）

从短缺资本主义到过剩资本主义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贫困是美国人的普遍经历。工资很低，工时很长，几乎所有家庭的门口都有失业之狼在游荡。在30年代，失业率已高达25%。

这种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变化。1958年，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撰写了《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他在书中指出，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讲，物质短缺已成为历史。“普通人都能得到舒适生活的条件、食品、娱乐、个人交通工具以及水电煤气设施，”加尔布雷斯写道，“变化是如此巨大，甚至人们对此类需求的感觉都不再明显，除非他们被广告和推销所鼓动而动心。于是，广告和推销就变成了最重要且最需要才华的职业。”¹⁶

这是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一个重大的阶段性变化。此前，人们的需要超过了经济体系的产出能力，即所谓需求超过了供给。那个阶段或许可以被称之为**短缺资本主义**。我们也可称其为资本主义1.0版。

在这个阶段性的变化之后，我们就进入了**过剩**资本主义，或是我所谓的资本主义 2.0 版。在这个版本中，企业可以无限地产出，他们的问题是要找到买家。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很大部分都花费在刺激人们对于本不需要的东西产生欲望上。为了刺激购买，还提供慷慨的赊欠。

这个历史性的转变也可以另一种方式来描述。一个世纪以前，我们最缺乏的是物质，所以牺牲其他而追求物质是有道理的，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所擅长的。今天，我们已身陷欲望而不能自拔，而我们所短缺的也不再是物质。我认为，在中产阶级中，最短缺的是时间、亲情、社区联系。(见表 2.2) 在仍存在着物质短缺的穷人阶层中，物质短缺并不是因为生产能力的局限而是由于穷人缺乏支付能力。也就是说，在这里所短缺的是收入。

相似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有充足的土地、资源、堆积垃圾的场地，而最短缺的是聚集资本的能力。因此，法规条例都将资本放在了优先的位置。然而到了 21 世纪，情形已经全然改变。如经济学家乔书亚·法利 (Joshua Farley) 所指出的：“我们若想在晚餐时享用更多的鱼，所缺的不是渔船而是鱼；我们若想要更多的木材，所缺的不是伐木场，而是树木¹⁷。”

作为商人和投资者，我个人就曾在资本的优越地位中受益，我并不想要终结资本。然而作为公民，我必须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当今世界已充斥着资本，其中大多数都专事投机。相形之下，健康的生态系统却在日益短缺。如果有任何东西应被置于优先地位，那就是自然的资本。然而，资本主义依然在奉行着金融资本的王旗而席卷横行。

表 2.2 短缺资本主义与过程资本主义

	1.0 版 短缺资本主义	2.0 版 过剩资本主义
规模	本地	全球
供给与需求	需求超过供给	供给超过需求
外部负作业	低	高
广告	最低限度	无所不在
信用消费	很少	大量
更多物质供给的边际效应	高	低
短缺	资本聚集	废物处理、时间、 物种、收入、亲情、 社区。

我须指出，我关于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¹⁸并非精确。我曾听到有些人说资本主义已然经历了三个阶段，也听过其他人说是四个阶段。这些说法各有其道理。我的要点是要指出，资本主义是在变化着的。拥有特权者，就拥有了巨大的能量来保护其特权。这一点是硬道理，但这也不是不可变化的。我们至少已有过两个版本了，还可以再有一个。

资本主义的三个病变

不论其意愿如何，驾驭资本主义的软件的根源性错码导致了三个病变：对自然的毁坏，扩大不平等，以及对提升幸福追求的失败。让我们先分别加以审视，之后再探寻其间的联系。

对自然的毁坏

远在亚当·斯密看到资本主义的问题之前很久，人类就早已开始劫掠自然资源。然而，过剩资本主义极度地扩大了劫掠的规模。

我承诺过不会使用讨厌的数字，但只有一个是一定要引用的。2005年，一个由联合国资助的研究项目报告，生物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的60%，已被不可再生地耗费殆尽。根据千年生态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报告，照此耗费速度，可能导致突发的非线性巨变，这将严重地影响到人类的福祉。可能导致的后果包括洪水、干旱、热浪、渔业崩溃、海岸线死亡带、海平面升高，以及新型疾病¹⁹。

有思想的人们会争辩，人口或科技对生态系统与物种多样性的负面影响是否更甚于资本主义。无疑，这些因素都负有其责任，但是最大的危害不是由无数穷人，而是由很少数的富人造成的。以美国为例，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到了总排放量的30%²⁰。这都是我们过度消费的结果，而不是由于穷人的微薄作用。这才是大问题之所在，而过剩资本主义正是这种过度消费的侍女。

当然，科技也放大了我们对于地球的影响，但科技自身只是知识、技术而已，对于科技的**选择**以及使用的规模，才会对地球造成影响。例如，有很多种发电的

方式，当企业进行选择时，他们的标准可不是“对自然的伤害最低”，而是“最赚钱”的。在进行选择的计算过程中，他们把自然代价计算为零。所以，我们大量地使用燃油，却很少地使用太阳能、风力以及潮汐能量。

在农业、伐木以及许多其他行业中，企业的计算法则都是如此。其后果可耻而又令人胆寒：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吞噬的怪物，它吞噬掉自然资本，并称之为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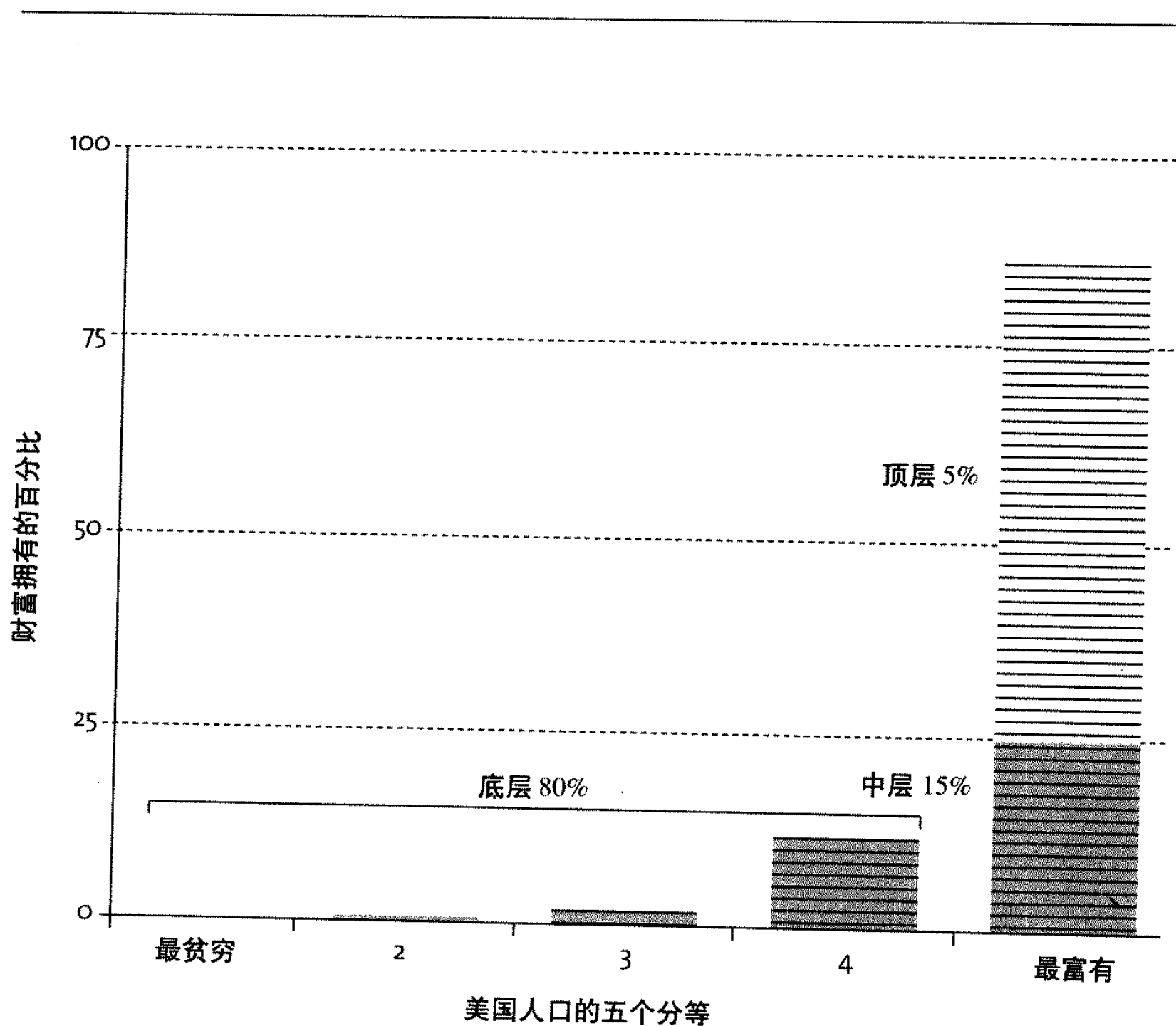
扩大不平等

大多数占领北美洲的欧洲人都希望使其远离封建制度的不平等。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富有竞争力的精英治理，而不是世袭贵族的统治。不幸，这并未得到实现。以一场内战而终结了奴隶制算是个例外，至于原始圈地和强盗爵士，我们一样也没少做。

将时钟快进到我这一代人的时代，如果真曾有过将所有的船都高高托起的潮汐，这就是了。二战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几乎没有间断的增长狂潮。1950年至20世纪末，去除经济膨胀因素后的人均经济产出翻了三番，股票市场则增长了将近40倍。共同基金与保税的退休金户口将股权蔓延到了普罗大众中间。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发动了针对贫困的全面战争，然而到了世纪末，私有财产分布的不平等却更远甚于20世纪50年代。冷酷的数字显示出，顶层5%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已超过了其下95%的人群所拥有的全部。（见图2.3）

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此有很多种解释。其一是，福利使得穷人更穷²¹，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在其1984年的著作《失地》（Losing Ground）中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认为，福利鼓励单亲母亲延续其非婚状态，增加了婚外生育，并生成了一个寄生的低等阶层。也就是说，默里（与其他人）指责受害

图 2.3 2007 年的美国财富分布



源自：爱德华·梅乐夫、阿吉特·扎长赖亚斯、阿森娜·凯纳合著，Levy Institute Measure of Economic Wellbeing: United States, 1989, 1995, 2000 and 2001 (New York: Jerom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May 2004)。http://www.levy.org/default.asp?view=publications_view&pub ID=fca3a440ee 和 http://students.washington.edu/ehirsh/documents/inequality_figures.pdf。

者或是特定的某种政策为长期贫困的成因，却并没怎么理会贫困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成因当然是其繁复的枝蔓，但我的假设基于一点：在我们赋予了私有财产标签的东西中，有许多是从公共权益中取得的，或是由公共权益而共同生成的。此

类从公共权益中的取得远非公平。直截了当地说，富人之富有，是因为（通过企业）对于公共权益的弱肉强食的吞噬；穷人之贫困，是因为他们从公共权益中只有极少极少的所得。

换一种解释方法，财富向上流动而成为资产，恰如水向下流动汇入海洋。资本主义的基本设计，就是要为现有的财富拥有者带来最大的回报。受益最大的，尤其是那些自早期即持有那些成功公司的股权的人们，随着公司成熟，他们可以得到其原始投资的成百甚至上千倍的回报。随着这些投资者的财富积累，他们可以再投资，传给后代，并对政治家施加巨大的影响从而得到更多的优势——对资本增值、分红以及遗产等的税率的持续降低，就是证据。在此基础之上，过去几十年又兴起一种所谓**全球化运动**的现象，其核心意义就是，使资本的拥有者能够找到全球最低的成本，从而增加其资本回报率。于是，伴随着顶层资本的汹涌流动，就是底层的停滞。

这个分析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企业很少发行**新的**股票。如作家马乔林·凯利 (Marjorie Kelly) 指出，大多数成熟企业的财务增长来自其保留的盈余与债务²²，(retained earnings and debt) 它们在发行新股的同时也回购自己的股票。所以，旧的财富很少会被稀释。当新钱流入股市时，其主要的影​​响是提升了已有的股东与其财富继承者的财富。于是，1983年至1998年之间在美国股市上总增值的一半，都流向了顶层的那1%的人群²³。

发行新股的都是那些年轻的企业——像微软、苹果和谷歌之类的企业。除了娱乐和体育明星，几乎所有新的亿万富翁都是这类企业的早期股东。然而，即使在此情形下，增值的分配依然是倾向于那些早期股东的利益，财富的流通渠道依然在复制着同样的模式。新财富加上旧财富，还是依附在同样的核心之上。没有任何可以将财富——甚至是新的财富——更加公平地加以分配的机制。

为什么美国人仍然不幸福？

如果欲望是通向幸福的道路，大多数美国人应该早就乐疯了。然而物质的累积仅仅是人类追求满足的众多手段之一，这一点似乎大家都知道，除了经济学家之外。经济学家认为，更多的物质消费天经地义地能使人更快乐，不仅是在贫穷时，而且是全天候的。这个假设不仅不符合逻辑，也与无数的调查结果相矛盾。按照在此处与任何地方都适用的效用递减规律的逻辑（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当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物质，每个增加的物品所带来的边缘利益就会向零点方向减弱。调研结果也都确认了这个逻辑推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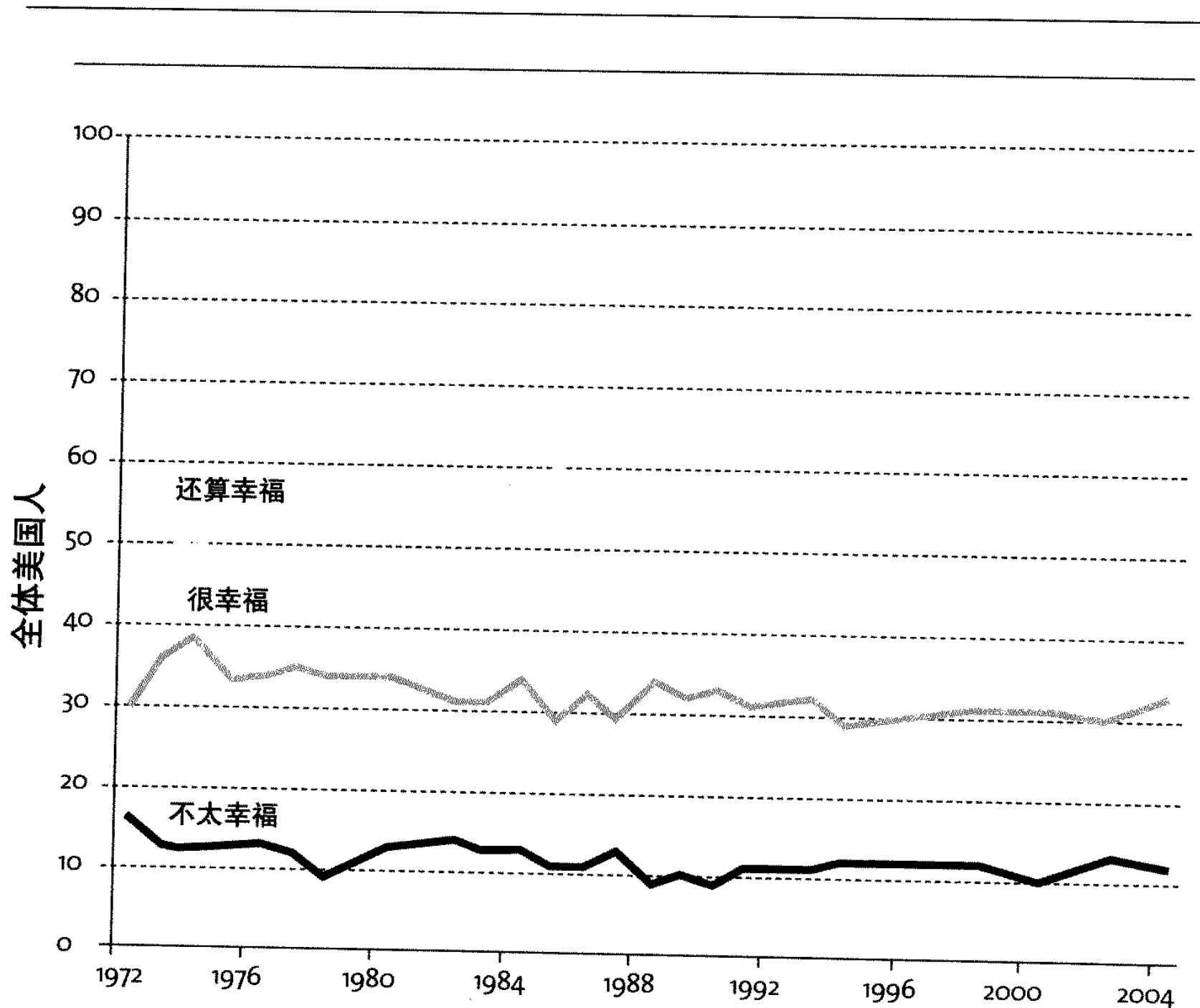
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综合社会调查²⁴（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问卷，一直在询问美国人一个同样的问题：**综合所有因素，你如何评价今天——你会说你感到很幸福，还算幸福，或者，不太幸福？**自从被初次问到这个问题，时至今日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不大会太费心去改变答案了。1972年，31%的美国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至2004年，有33%的人如此回答（见图2.4）。一个非经济学者可能就会得到结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幸福，那我们已经白白浪费了亿万美金。

为何经济增长不能使我们更幸福？有很多可能性，大多是彼此相加而不是排他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当物质需求被实现之后，幸福就是基于相对的比较，而不是基于绝对的条件。如果你邻居的房子比你的大，你的房子更小，就会削弱了你的幸福感，哪怕你的房子是符合你的需要的，也会如此。同理，如果其他人挣得更多，那么挣更多的钱也不能让你更幸福。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富足的国家可以变得更加富足，却不能使其人民变得更幸福。

第二个原因是，过剩资本主义引发焦虑。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全都凭着一份工

作，若是生了一场病，还不要提其他天灾人祸，就是大祸临头了。当灾难降临时，他们所能够依托的安全网却是薄弱的。随着资本在全球追寻廉价的劳动力，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工作机会在减少下去。

图 2.4 1972—2004 年美国的幸福程度



源自：<http://pewresearch.org/social/chart.php?ChartID=37>. (Pew Research Center 授权复制使用)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过剩资本主义使生活加速而产生巨大的压力。人类并不适合多重任务，不适合被困在车流堵塞之中，或是 7 天 × 24 小时不停不歇地工作、购物、支付账单。我们需要休息放松，需要亲情和创造力。所有这些，过剩

资本主义都不能为我们足够的提供。还有，它的无尽无休的市场信息——若没有某某品牌，你就不够好——催生出来与感恩与知足相对立的东西，而感恩与知足，正是广为认知的幸福的两个前驱因素。根据科学家联合会（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公布的数据，普通美国人每天平均要遭遇大约 3000 个这类的信息²⁵。不奇怪，我们会体验着嫉妒、贪婪，还有不幸福。

期待 3.0 版

让我们来为迄今的资本主义历史作个小结。自崛起于 18 世纪，资本主义已经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和环境。尽管已出现了全球性的风险信号，它就像一个没有制约装置的脱轨的蒸汽机，依然全速运行。它矗立起来私有财富的巍巍高山，但这些财富多半是取自于公共权益，而这些财富的大部分却都对我们的幸福极少补益。其主要成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已经基本失控，其能量的后果正以极不平等的方式发散。

过剩资本主义为何会如此行事？有可能是因为总是雇用了不合格 CEO，但我想的却是另一回事。我认为，由于**操作系统**的缘故，导致大多数 CEO 以全然不顾后代利益的方式行事，最远也就顾虑着下个季度。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资本主义 2.0 的产出，就得升级它的操作系统。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将描述新的操作系统的模式。但在以下两章中，我首先要解释为何不能依靠诸如更多法规或更多私有化之类的方式来修正我们的体系谬误。

第三章

政府的局限

政府，
因其是为了财产安全而设定的，
就注定了其天职的防卫性质……为拥有财产的一方，
而防卫一无所有的一方。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76)

加勒特·哈丁在其题为“公共权益的悲剧”的论文中预测，只有两种方式可以拯救公共权益：**国有化与私有化**²⁶。要么由一个政府来强制阻止人们没心没肺地毁灭地球，要么由那些在自由市场运作的私产拥有者来实现这个作用。在以下两章中，我将要说明何以这两者都是行不通的。

考虑到政府的确具有补救的作用，我们须加以明确，我们在此所谈论的不是暴政专制，而是一些有效的政府行为形式，如法规、税率及公共财产的权利归属。那么这些传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为我们的子孙保护公共资产吗？

美国的两种体验

政府**必须**保护公共权益，这个观点来源久远。因为这个职责是再基本不过的

了,有时就被认作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而另些时候,它被赋予了另一个名字:公共信托。事实上已有一些州对此职责作了书面确认。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的宪法规定:“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共自然资源是属于所有人民的共同财产,包括尚未出生的公民。州联邦(the Commonwealth)作为这些资源的信托,将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对此资源加以保护和保管。”请注意,在这段宪法文字中,作为自然资源的信托,不是可**选择**的、而是一项必须的职责。

然而,与其他很多情形一样,华丽辞藻与实际情形可能是不相符的。政治体制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在一个权势与财产密切联系的世界中运行。早期,由55个白种人财富拥有者起草宪法时是如此,当今依然如此。

美国经历了两个并行的事件:民主与资本主义。若两者能够分别运行就好了,可惜并没有。它们在同一个瓶子里,相互影响。历经200年后,我们可以从其相互作用之中归纳出一些结论。结论之一:资本主义对于民主的扭曲,超过了后者对前者的作用。

资本主义扭曲民主的原因很简单。民主是一个开放系统,经济力量很容易对其产生影响。相形之下,资本主义自成门户,公众很难进入其堡垒。资本的凌驾地位并非偶然,亦非乔治·W.布什的错儿。当资本主义侵占了民主,就会产生如此结果。

这并非说美国政府就不能在有些时候对企业加以管束,因为政府手中拥有一些工具,并曾经成功地加以使用。但是它可以采用的方式极不适合为后代保卫地球的任务。让我们探究其原因。

法规的局限

法规的意义在于,尽管在理想上市场应该拥有完全的自由,有时还是要为了

公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来设置一些外部的规则。

当涉及到自然资源，政府可以用许多方式来制定法规。它可以要求有时限地禁止废气排放，也可能准许、出售或拒绝对公共资源的使用权，还可以对某些污染物加以禁止，而对另一些污染物加以限制，或告诫污染者必须采取某些相应的技术，等等。政府还可以划分地域，并规定在各个区域所允许的行为。还可以应用税率而对相应的行为加以奖惩。

这么多工具——加上对违法者的制裁——看起来使得政府足以与企业抗衡。然而历史证明，政府从来不是像表面上看来那样强大的法规老虎。每当政府要行使其权力时，就会遭遇来自企业的强大抵抗。经久演变，其制定法规的机构已被其原本所要制约的产业对象所俘虏了。

很多学者对法规被俘的过程作过描述，细节有异，而场景相同。一个新的机构被建立，旨在对一个为害公众的产业加以管制。刚开始时，这个机构的行动果敢坚决，过了一些时日却热情不再了。最初组成机构的那些改革者们，被曾在产业从业的老手或是那些想在从事相关政务后能够涉足产业的人们所取代，更有由产业人士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与由产业资助的“智囊团”为逐利方案饰以合法的外衣。说客们则在不间断地游说着机构成员，而公众对于所进行的这一切则是一无所知。

这个程序在近年来已经发挥到了极点。就在我写作此书的同时，内政部 (Interior Dept) 部长就曾是采矿工业的说客，环保署 (EPA) 的头脑是前水电产业 (utility) 的说客，环保署的第二把手是前孟山都公司 (Monsanto) 的说客，环保署清洁超级基金的头儿 (Superfund cleanups, 其职责是要促使产业清洁其有害废物) 则曾为企业提供关于如何逃避清洁超级基金的顾问咨询。尽管当今支持产业的叫嚣可能已有所减弱，但这种叫嚣或是抵抗建议的减少，可能恰恰

说明产业的优先已接近于常态的大势所趋。

被俘的不仅是制定法规的机构²⁷，作为管理机构、制定法律的国会本身也已深受影响。据廉政中心（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调查，“有影响力的产业”如今每年在华盛顿的花费高达60亿美金，并雇用了超过35000名说客，其中有200多位是前参议员²⁸，他们可以轻易地联络到以前的同事。

扫视一下企业的游说游戏，就可以看清它的妙用。MBNA，全国最大的信用卡银行，在1999~2004年期间花费了1700万美金用于游说²⁹，较之从2005年通过的全行业的银行破产法的全面修订中所能获得的利益，这点小钱算不上什么。该修正法案规定，除极贫困者以外，任何人在清偿原有债务之前不得再举新债（申请破产的美国人中大多数是遭遇失业、巨额医疗费用或是家庭破裂的中产阶级）。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描述了该法案通过时的场景：“律师和说客将参议院听证会拥挤得水泄不通……休息时通常会出现这样的喜剧场景：身着细条纹套装的说客们冲到走廊上，各自从衣兜或公文包里抓出小手机向他们的客户报告。几乎任何时候所报告的消息都是客户们想要听到的。”

再试想一下如今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集团³⁰——制药工业，它为每一位议员配备了两个说客。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说过：“你若是揪着一只猫的尾巴抡起来，要想不碰到一个制药业的说客都很难。”理由很充足：制药业成百上千亿的利润就取决于国会所采取的行动或是不采取行动。例如，在2003年，制药业赢得了在医疗保险内使用处方药的权利，并且限制政府不得协议降价。于是美国人就不能使用从加拿大进口的更便宜的药品，并保护了利用公司的资金来加速药品批准程序的系统。

此类事例³¹不胜枚举，前共和党战略员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就列举了一些：“采伐业曾为了争取保留价值4.58亿美元的采伐道路补贴而花费了

800万美元，他们的投资回报是5725%。葛兰素威康制药公司³² (Glaxo Wellcome) 投资120万美元，赢得对Zantac（葛兰素生产的善胃德泡腾片）专利延长19个月，价值10亿美元——他们获得的净回报是83333%。烟草业花了3000万美元得到了价值500亿美元的减税（tax break）——回报率高达167000%。而广播业花费³³ 区区500万，就得到了免费的数字电视许可证，得到拱手相送的价值700亿美元的公共资产——不可思议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万的投资回报。”

我们的政治体系如此行事，并非是由于我们的政客们特别地贪腐，根源在于结构。从政府得到好处的产业是富有而且组织严密的，他们从游说的费用及竞选献金中得到即时的高额回报。钱未被直接用作行贿，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利益交换。政客与企业之间是共栖共生的关系。政客需要金钱，而企业需要优惠，两边都既不傻也不会脸皮薄。期望事业长久的政客们不会经常地去冒犯金主，至少会与他们保持联系。在政治上有了联系，就意味着赢了九成。

相对之下，普通公民手里没有多少钱，没有组织，信息也不完备。每10年中他们大不了可能会在每10年中填写几次民意调查，他们是政治范畴中最易受到愚弄的角色。政客们虽然也会去读读民意调查，但那些调查都与企业所寻求的秘密优惠无关。于是，纪律严明、现金充沛的企业，就轻而易举地取胜于普通的公民。

甚至有一种经济学理论对此作出解释：曼克尔·奥尔森 (Mancur Olson) 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奥尔森是哈佛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人们不会为了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采取共同行动，除非人数很少。例如，如果有五个大航空公司的CEO们决定，他们想向政府争取一项5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他们会集中资源雇佣一个说客公司，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国会，如果没有这5亿美元，他们的公司都活不下去，而他们集体破产的后果将是可怕的。

有谁会站在反面进行游说吗？没有。因为，当这五家航空公司各自得到1亿美元时，普通纳税人的人均损失只是5美元而已。对普通公民来讲，根本不值得为此费那么大劲儿去争斗。

在此之上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主对选民的反应最敏感，而对金钱反应则最差。选民与捐助者都是当代在世的人类成员，还有一些是在民主中根本没有一席之地的——那些没有组织、没有财产、没有政治选举权利的——包括人类的后代、生态系统与人类以外的物种。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与他的同道们不大可能预测到这种瑕疵。在他们的时代，政治是当代人类种群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人类与其自己的后代之间的或是我们人类与自然环境中其他物种之间的冲突。但今天的情形已经不同了。

如此看来，本章首所引用的亚当·斯密的话语的寓意，比他的思想还要更加灰暗。如果政府天然地倾向于资产拥有者，那么失败者就不只是穷人，还有人类的后代、生态体系以及非人类的物种。他们都没有任何资产权。在这儿只有一个正面的消息，但反之也可能成立：如果人类后代、生态体系以及非人类物种**确实**拥有资产，他们就可能获得一些经济与政治的权力。

税收的局限

让我们将政府是否自然倾向于拥有资产方的这个问题暂且放一放，先来关注一个纯粹体制性的问题：税收是否是一个保护自然资源的好工具呢？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经济学家们鼓吹“绿色税收”已经有80多年之久，该是从这个老掉牙的药方儿向前挪动的时候了。

以税收来保护自然资源³⁴的设想早在1920年就由当时剑桥大学的顶级经济学家阿瑟·皮古（Arthur Pigou）提出来了。乍看起来确实有些道理。如果污染

没有代价，就会有很多污染；如果征税，污染自然就会减少了。税收迫使污染者将一些向外部的释放转为内部消化。

至此，都挺好。然而，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例如，由谁来确定税率？使用什么计算方式？行动的速度有多快？他们对谁负责？还有，收上来的钱将用在哪儿？

当联邦政府制订税率时，主要是由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还有参议院财务委员会（**th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具体操作的。任何一个国会的观察员都会告诉你，从提案、听证到发布政策，起草税法的过程是令人生厌、繁杂和耗费时日的。而这些过程中比什么都更重要的，就是使华盛顿的说客们得以整日忙碌在他们的手机上。

委员会成员在制定税法时所根据的公式是什么呢？他们最经常根据的，就是什么对于再次获选连任是最有利的。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是政客。他们想要取悦捐助者和选民。至于保护自然资源或是后代人类，并不是他们心目中最紧要的事情。于是，污染税法永远不会被置于其应有的高度。

来看看一个真实的例子——碳排放税。对碳排放课税，在理论上可以减轻全球变暖。但若想真正产生效果，就需要设定极高的税率。这就是说国会必须逐年提高汽油、天然气以及电力的价格。这会影响到所有企业和消费者的账本，因此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

在大多数时候，主流经济学者会大声疾呼，“不应由政治家定价，让市场来定价！”在任何时候，都应由价格向世界明白宣示买家愿意付的价格以及卖家可以接受的程度。政府对于这个过程的干扰或延迟，就会导致短缺资源的低效供应，还有国会自身期限的宝贵时间的浪费。

那么，为何皮古及其追随者会将定价任务交付给政客们呢？在他们看来，这

是没有其他选择的。总得有**什么人**来为污染定价吧，他们认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得成这件事。然而，确实**存在着**其他选择。

以管理国家货币供应的成立于 1913 年的联邦储备委员会³⁵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为例。联储会是一个混血的实体。从技术上，它是一个由成员银行拥有股权的企业，然而，董事会的七个成员是由总统任命并由参议院批准的，任期可延续 14 年。联储会设计的天才之处在于，其董事们可以制定艰难的经济决策而不必冒落选的风险。具体来讲，他们可以提高利率，那意味着商务贷款与成千上万选民的信用卡付款的更高成本。没有政客会愿意做这事，感谢联储会的存在，政客们也无须去做这件事。当选民抱怨高利率时，议员们就会指着联储会说：“和他说去。”这个模型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几乎被当今所有的国家所采用。

可以想象一个管理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的类似的机构。其领导人都可能有很长的任期，他们肩负着未来人类的信托的责任。他们可以作出强硬的经济决策——如提高能源价格——而不会导致政治自杀。这些机构可能会得到当选在任的政治家们的喜欢，恰恰因其能够为他们转移责任和责备。

这还并非是政治性定价的唯一选择。我们从那个“碳排放权交易”(cap-and-trade) 项目中了解到，市场也是可以对污染制定价格的。在这类系统中，政治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他们制定系统以及分配初始的资产权——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就可以不必再操心价格的事了。

关于污染税的另外两个问题是：谁付税？钱给谁？关于第一个问题没有太多争议，由消费者——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人——付税，因为，任何加在污染者头上的污染税，最终都会以更高价格的形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可以通过少买那些制造污染的产品，而“避免”付出额外的税。这种“避税”是有利于自然环境的。但是，许多消费者并没有太多选择来减少或转换他们的购买，他们**必**

须驾车去上班，**必须**给房子供暖。并且，由于低收入家庭将几乎全部收入都花费在必需的消费品上，所以在实际上，他们承担了更高比例的污染税负担。

至于第二个问题——钱给了谁？——钱都进了国库。正如任何税收一样，污染税也是将钱从私人腰包里转移给了国家。然后，由政治家们去决定拿它来做什么。政治家们可能会公平、智慧的使用这些钱，但对这一点可是没有保证的。若以现代历史为鉴，他们将会把其中大部分用在扩张军工产业，以及为助选的捐助者们减税。

还有一个基本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税收并不是一个保护自然资源的有效工具。高昂的污染价格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所真正希望的是降低污染。课税最多也就是个绕道的办法。我们推测，提高污染的代价就会降低污染，但即使是最智慧的经济学家也不知道究竟要多久才能实现污染的降低或是究竟能降低多少。我们所能做的只有通过实践来摸索。制定税率者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会花费在该提多少价才能降低多少污染的争论上，而实际上我们所应该争论的是，我们应以何等速度将污染降低下来。当这个争论有了结果，我们才有可能将阀门控制在一个同意的水平之上。这并不是以污染税能够实现的。

简单地讲，污染税没有比别的方式强一点儿，也远非保护自然资源的理想方法。它会使得污染者将本来向外部转移的一些成本转移为内部消化，且只可能是以笨拙、消极并且全无效率的方式消化。我们应当考虑，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将其成本内部消化。

公共拥有权的局限

由于历史的因袭，美国具有公共土地的悠久传统。当欧洲殖民者最初到达时，北美洲是由一些原住民部族所共同拥有的。当这些部族被掠夺并驱逐后，联

邦政府又征用了欧洲人的领地。当各州加入联邦（the union）之后，有些联邦的土地又被给予了各州。尽管联邦和各州政府所拥有的大部分土地在当时都被廉价出售了，很多后来又被收回了。今天，美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是由政府所拥有的。

所谓这些土地——或任何资产——是由“政府拥有的”，并非说其管理是本着未来人类、人类以外物种或是普通公民的利益。我们来看看联邦和州政府对他们所拥有的土地都做了些什么。

在阿拉斯加以外，政府拥有的土地中大约5%被确定为野生保护地。在这些领域，人类可以步行进入，但不允许使用任何机动车辆。采矿、伐木以及狩猎也都是被禁止的。其余95%政府拥有的土地，则由不同的机构对私人以及商业使用加以规范管理。国家森林由美国国家森林服务局（the U.S. Forest Service）、放牧与矿产土地由土地管理局（the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狩猎与渔业由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局（the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来分别管理。

作为通行的规则，由政治家们——不是出于信托职责——来决定所允许的用途以及征收的价格。1872年的矿业法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据此，私营公司可以每英亩5美元的代价获取开采权，并且无须为他们所开采的矿物付任何开采使用费。所有试图修正这项陈旧法案的努力，都因矿业公司所施加的政治影响而告失败了。

一脉相承的还有，美国林业服务局在过去几十年以来，一直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木材公司出售树木。更有甚者，它还花费上百亿的税收修建通向原始森林的道路，以方便木材公司砍伐属于人民的林木。当然，这种对于私有企业的巨额补贴全然不符合经济学的原理。这种做法还使得美国人对廉价的林木产品以及毁灭性开采上了瘾。究其根源，就在于美国林业服务局并不是对于生态体系保护负有

信托责任的信托机构，而只是一个受政治影响的、专事对政府拥有的森林实现“多重用途”的中介机构。

在这种可悲局面中也存在一些例外。其中之一与由联邦政府赋予州政府的土地托管有关。此类赠予始于1785年的《土地法令》(the Land Ordinance)。法令规定每个城镇须保留1平方英里的土地专门作为公立学校用途。后来，1982年颁布的《莫利尔土地授予学院法案》(the 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赋予了各州更多的土地以支持农业与机械学院。在1954年，国会将沿海岸线富藏石油的地域授给得克萨斯，条件是，由此产生的所有销售收入都要以捐赠基金或永久性基金的形式，永久作为公立学校产生收入的用途。

如今，在22个州里，大约1.55亿英亩的土地被划为公立学校与学院的信托——这就是所谓的为了人类后代的利益。如联邦政府一样，州政府将其所拥有的土地大部分用于石油开采、伐木和放牧。信托的职责并非要保护土地的自身资源，而是要从中产生收入。这促使受益者们（教育者、学生、家长）密切关注着土地的管理者们。其后果之一，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萨莉·费尔法克斯(Sally Fairfax)教授的看法，由州政府托管土地的管理要好于联邦政府托管土地的管理。美国林业服务局“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隐藏着现金流以及投资回报的真相³⁶……而州信托土地的管理者们都熟知如何管理账目并向公众公布账目”。再说，尽管州政府信托机构并没有所谓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职责，但出于长期的考虑盘算，他们还是会有这样的倾向。

在典型的州政府土地信托之中，有一个有趣的异端，那就是创立于1976年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其创立的目的是为了缓和将州拥有的土地租赁给石油公司所带来的影响。基金的目标，是要创立一个即使在原油被开采完之后也仍能有益于阿拉斯加居民的资助。为此，永久基金投资于股

票、债券及类似的资产，并以其收入逐年为每一位居民分红。最初，分红是按照居民居住的年限计算，老居民会比新居民得到更多分红。但是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阿拉斯加州不得以此方式歧视新居民³⁷。此后，红利就按照一人一股的方式发放了。

留给未来的教训

有三点值得在此汲取。第一，拥有权与信托是不同的东西。资产的拥有者——即使是政府作为拥有者——对于想要做的事可有广泛的选取，而被信托者则没有。受信托者被与信托者之间的信托条款以及古老的信托原则所束缚，其精髓就是对受益人的“不可分割的忠诚”。

第二，在一个资本主义的民主之中，国家享有对许多宝贵资源的支配权利。只要掌握了最大的政治权利，就赢得了最多的富有价值的奖励，包括资产权、友善的法规制定者、补贴、减税优惠以及对于公共财富的无偿或廉价的使用。那种认为政府会提升“公共物品”的观点，实在是天真的可悲。

第三，当那些自由市场派热衷于鼓吹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必要前提的同时，他们忽略了一点，即资本主义同时还会销蚀民主。就像是地心引力，越是以资本为中心，其牵引力也就越大。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困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垄断了我们的经济体系，其操作系统的设计使其变得非常封闭，并毁坏着公共财富。唯一明显的与之抗衡的力量就是政府，然而政府却是被同样的一些企业所掌握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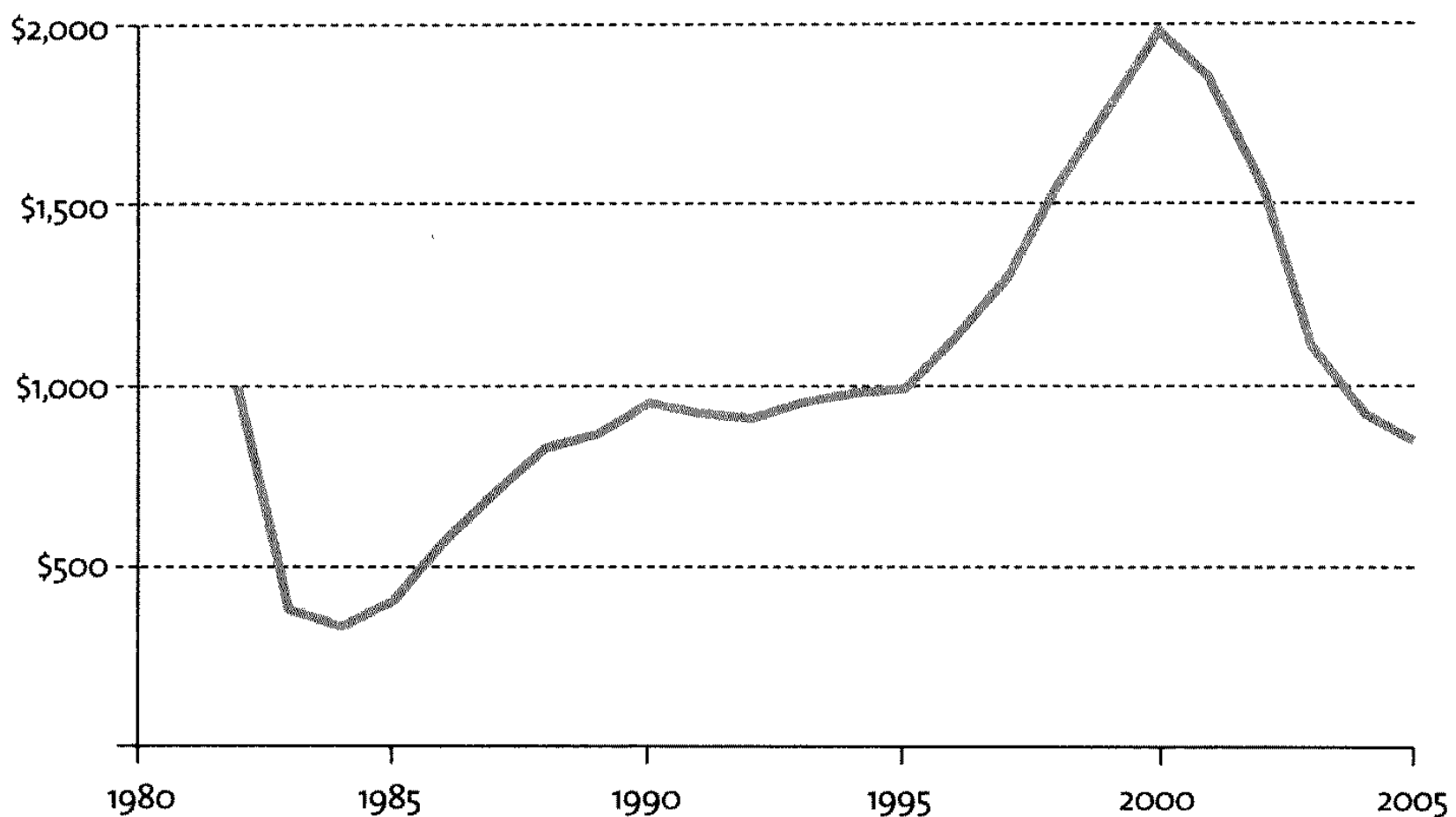
摆脱这个困境的一个可能出路是，对企业重新加以设计——使其推动力从利润转变为其他东西。然而，这无异于要大象起舞——这根本就不是它们的天赋。

阿拉斯加永久基金

根据阿拉斯加宪法，全州的自然资源属于其公民。20世纪70年代，共和党籍的阿拉斯加州长杰伊·哈蒙德(Jay Hammond)严谨地执行了这一法规。当石油开采之风从北坡(North Slope)席卷而至时，他推动实施了由阿拉斯加全体居民共享开采权使用费。经过无数战役之后，终于形成法规：本州石油开采全部收入的75%交归州政府，并以此取代税收。其余25%归入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并以此基金代表全体阿拉斯加人民的平等利益进行投资。

自1982年以来，基金的增长已经超过300亿美元，并每年向所有居民发放红利，包括儿童(见图3.1)。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代表所有现存和未来的阿拉斯加居民权益的巨型共同基金。即使当石油被开采枯竭之后，它仍将继续造福于所有居民。诺贝尔得主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³⁸(Vernon Smith)，一位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自由主义学者，将其称之为“一个全世界的政府都应效仿的好模式”。

图 3.1 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分红 (1980—2005 年)



源自：阿拉斯加永久基金企业，网址：<http://www.apfc.org/alaska/dividendprgrm.cfm>。

企业的创立就是为了赚钱。事实上，我们的社会需要它们赚钱。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对此作更多探讨。

另一个可能的出路，是将政府从企业的控制下解救出来，不只是临时的，而是长久地解救。但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啊。企业已经淘汰了其老对头劳工组织，还将媒体变成了喉舌。在竞选资助时偶尔会出现一些突破的机会——例如，现在禁止企业向政党捐助所谓的软钱——但企业的金钱总能找到其他的流通渠道。此类投资的回报实在是太高了，他们不会轻易止步。

这么说就没有希望了吗？我并不这么认为。机会之窗很狭小，但并非不存在。在美国的历史上，每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两次反企业化的浪潮。在19世纪，我们经历了杰克逊和林肯的时代；在20世纪，则是西奥多与弗兰克林·罗斯福主政期间。我肯定，21世纪还将会出现同样的经历，也许要付出一些灾难性的代价——又一场战争、萧条或是生态灾难——才能触发下一个反企业化运动的兴起，这或早或迟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当它到来前，作好一切准备。

何谓机制性的准备呢？我认为，有三件事情。第一，我们必须对于政府的角色有一个恰当的认知。这个角色不是去运行经济或是直接管理公共权益，而是将公共资产托管给可信赖的守护者。第二，我们必须对如何修正我们的经济体系做好规划，不仅是在表面症状上贴块膏药而已。第三，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反企业化的兴起都会是短暂的，我们必须能够利用这狭小的机会之窗迅速建立起能够持久持续的机制。

法律、法规以及税率的作用，都很容易因企业的厌恶而被取消或是被削弱。而相对应的，为机构所拥有的资产权则能够像该机构一样持久。所以，我们应专注于建立此类的机构并赋予它们永久的资产拥有权。

不要误会：要使资本主义与自然和人性之间达到和谐，远非几场拳脚棍棒的争斗就可以解决的。这将是长达 30~50 年的项目。在此期间，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为此，我不会对国会中的微弱而含糊的多数抱有太多希望。如我们都将看到的，我将会把希望寄托于公共权益的信托机构。它们被赋予资产权，并以人类及其后代的最大利益为天职。

第四章

私有化的局限

企业是一种外向型的机器，
正如鲨鱼是一种杀戮机器。

这与邪恶或意志无关。

在企业之中，正如在鲨鱼体内，
那些特征行为都是出于其本来的设计。

——罗伯特·蒙克斯 (Robert Monks, 1998)

人们总是愿意相信，私有资产的拥有者们在寻求私利时还是会顾及到对人类共同遗产的保护。没有人愿意在指令下行事，诸如**国有化**之类的字眼总会引起对官僚、甚至是专制的恐惧。与此相反，**私有化**却在彰显着自由。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审视加勒特·哈丁关于拯救公共权益的第二个选择：私有制，或称私有化。我认为，在没有限制的市场中运作的私有化企业，能够高效率地运用资源，却不能对其加以**保护**。对于后一个任务，需要为后代预留一些资源——凭着市场和企业的自身机制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根源在于我们现行操作系统的算式及启动条件。

资本主义 2.0 的公式

只要你曾经使用过计算机的电子表格，你就知道什么是算式。电子表格的每个格子里都包含着一组指示：从其他格子取得数据，根据算式加以计算并显示结果。每个格子里的指示集，就是**算式**。

如果你将经济体系想象为一个巨大的电子表格，其中每个格子都代表着一个厂商、消费者或是资产拥有者，你就能看清，总体的行为都是被格子里的算式所驱动的。我们现行的操作系统是被三个算式和一个启动条件所控制的。三个算式是：1) 资本回报的最大化；2) 资产的收入依据股权进行分配；3) 自然资源的价格等于零。而起始条件则是，5% 的人所拥有的财富“股权”超过了其他 95% 的人。

第一个算式是驱动企业的。它告诉它们，要尽可能多地销售而尽可能少地为劳动力、资源以及废物排放付出代价，还要让股东们每个季度都感到高兴。所有经理每天心里满满装的都是这些。如果他们是搞市场推销的，每天醒来就想着如何推销更多；如果他们的产品没有需求，他们就必须造出一些需求来；如果他们是做财务的，所担忧的就是利润边际和杠杆效益；如果他们是做劳工关系的，就会强硬地讨价还价，用临时工替换长期雇员，并将职位转移到工资低廉的地方去。而 CEO 们，就要全时地向华尔街输送甜蜜的数字。

第二、第三个算式与第一个编织在一起。复合的公式驱动着资本之轮无情吞噬着自然资源、扩大着人类之间的不平等。同时，公式中没有任何成分要求或鼓励企业单独或集体地去对任何东西加以保护。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中的人们就毫不关心保护自然、给职员加薪或是为社会作些回报之类的事情。通常，他们确实都会关心。但他们要为这些关心能够**真正**起到些作用的余地非常狭小。这也并非说就从来没有一些勇敢的先行者们曾给企业公式带来过短暂的困惑和嘲弄，他们确曾做到过。我所要说的是，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企业公式及其一系列规则都是被遵从的。**为了所有现实的目标，上市企业就是其公式的奴隶。**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为了长久生存，每个组织都需要比实际花费更多的钱。（美国政府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非营利的组织也必须要能够赢利。但这种赢利不同于利润**最大化**。在第一种情况下，赢利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对于后者，赢利则是凌驾于其他任何之上的目标。成千上万的机构挣钱是为了维持生存，从而能够去追求赢利之外的目标，那些上市公司是否也能够如此呢？它们能否持有**多重**的目标？换言之，它们能否超越其利润最大化的公式？

也许会有几种可能性：卓越的经理人们可能会选择高于利润的目标，而股东们可能也会对同样的目标而执著，政府也可能提出同样的要求。让我们对这些可能性来逐一进行考察。

开明的经理人

经理人也是人，他们不仅关心钱，同时也关心着更大的世界。但问题在于，他们都深陷于冰冷无情的体系之中。经理人被付以薪酬，就只为了一件事并要将这一件事做好。至多，他们可以在不有损工作目标的底线之下保持自己的公益之心，这只能使他们有**一点点**运作的余地——例如，如果使用循环纸张只是稍微地增加了成本而并未有损质量，他们就可能使用循环纸张。但是，如果这会造成明显的成本增加，他们就不可以——更确切地说，**不允许**——为了拯救几棵树而牺牲利润。最终起作用的不是经理人的个人价值，而是环保纸张的价格与使用新被砍伐的树木所制造的纸张之间的价格比较。

不能依赖企业高管的自发善行，还存在着其他的原因。如《经济学人》(Economist) 中写道，“单一目标底线的好处在于，它使得经理人们有所依照。而三重底线就起不到这个作用，那与其说是行事的许可证，倒不如说是会造成混乱³⁹。”

作为商人，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每个大的机构，为了妥善运营都需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必须尽可能地清晰。要管理单一目标已经是很困难的事，而若要追求三重目标，其难度则远远在三倍以上。且不论如何去量化的问题，经理人如何能够得知其作为所产生的外部结果？即使真的知道，当目标之间发生矛盾时，他们又当如何处理？任利润凌驾于自然或是反而行之？如果经理人们要以基于利润的业绩对股东们负责，那么他们基于公共利益的操作又是对谁负责呢？

对此类假设问题的答案当然都可以被编撰出来，但我猜想在真实的世界里，答案即如《经济学人》所总结的：伴随着其他一些目标的困扰，利润最大化仍将会处于垄断地位。企业的公关部门会努力以最低的实际成本来最大限度地夸大社会责任的**形象**。我们会看到美丽的广告和报告，但很少会有核心行为的改变。

有一个要点需要被牢记，利润最大化的公式并不只是受到法律的要求，还有各种各样的胡萝卜加大棒。举例来说，典型的 CEO 的薪酬方案都是基于董事会所规定的一系列指标，其中也会包括一些非财务的指标，但其中权重最高、极少误会的指标，就是利润。况且，CEO 与高层经理通常都有股票期权，由于股票价格是由每季度的收益所驱动的，拥有股票或期权的经理人们自然会努力地去追求收益的最大化。

当胡萝卜未能达到其激励效果，大棒就会抡上来——那会是很严酷的。一个“业绩不佳”的企业就会被股市贬值，就可能被并购。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经营原生多年红木木材的私营公司，加州的太平洋木材公司 (the Pacific

Lumber Company of California)。1985年以前，太平洋木材是一个具有长期发展眼光的家族企业，当进行采伐时，它总会保留一半树木，以便形成自然的遮蔽并保持足够的土壤稳定。它对员工也很慷慨，为员工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廉租住房，即使在萧条时也会限制裁员。

然而可悲的是，太平洋木材公司富有责任感的作为使得它沦为一个极易被并购的猎物。它对于自然环境及其员工的关切，影响到了它的利润和股价。由于它的采伐政策，无数可以迅速变钱的原始红木都被留在了原地，而且养老福利计划也占用了太多的资金。恶意并购手（corporate raider）查尔斯·赫维茨⁴⁰（Charles Hurwitz）观察到这些迹象。于是，1985年一个叫做马科萨姆（Maxxam）的控股公司提出收购。董事会最初拒绝了此项收购，但当赫维茨威胁要起诉他们违背了对股东的信托职责时，董事们只得屈服了。

赫维茨以发行垃圾债券为收购融资，所付的利息超过了公司有史以来利润所得的总和。为了偿还这笔债务，他终止了员工养老计划，并开始实行两倍于前的采伐数量。先前经理人们的善行就得到了如此下场。

当一个公司拥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股东时，公司对多重目标的追求就**确有可能**——我先前的公司，运营资产公司（Work Assets）⁴¹，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是，企业一旦上市——即，向陌生人销售股份——就注定要完结了。陌生人花钱买股就是想着股票升值，而利润就是唯一的保证。于是，被利润最大化的公式接管就是迟早的事。

我此生花了很多时间与人们交流，他们**希望**上市公司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不仅是付诸言辞，而是真正地付诸有意义的行动。他们认为那些曾经致力于公共目标的企业，可以超越其局限而重返对公共目标的追求。他们追忆着那些曾经根植于社区的公司、曾终身雇用员工的公司，以及曾对地方慈善事业作出贡献的公

司。而麻烦在于，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财富拥有者们生活在远离雇员的地方，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都是必须被最小化的成本，很难预见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利润最大化而成为上市公司的组织原则。

对社会负责的股东

经理人的天职是向股东负责，所以，如果股东要求承担社会责任，也许经理人们就会有所关注。这是具有社会责任的投资思路。用**这种方法**有可能驯服企业吗？

这种方式的推崇者们有两个技巧：对投资（把钱投向“好”公司，而不对“坏”公司投资）进行过滤筛选，以及股东的干预。当我在1983年共同创建运营货币基金的时候，投资筛选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从无到有，已经达到两万亿美元的资产规模，即大约相当于美国全部专业管理的资金的10%。这些基金对企业购买何种股票加以审查，不只关注于财务绩效，同时也关注对社会与生态体系的行为。在其审查过程中，通常都会排除那些销售烟酒的企业，触犯环境法规、歧视少数族群、苛待雇员或生产武器的企业。在理论上，如果有充足的人群都会照此行事，就会诱使企业做得相对更好一些。

然而，在现实中并非如此，看起来也不大会有这种可能性。原因之一是进行社会利益筛选的投资基金（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并不愿意接受较低的财务回报率。“做好事，还要做得好”是他们的口号，他们要的是赢过那些不做筛选的基金的效益，至少也要打个平手。他们打赢了（他们常常能做到）就“证实”了承担社会责任在商业上也很行得通。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基金可以要求企业只采取那些能够强化目标的“好”行为。在此意义上，他们与那些经理人们乘坐的是同一条狭窄的小舟，有良好的意愿，但决不能有损利润。

这些基金缺乏影响力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也许可以从以下所述的这个矛盾中找到：随着基金规模增长，其筛选过程就会松弛。如果你有几百万美元要用来投资，你可以对那些非金融的指标斤斤计较，如果当你在拥有上百亿时还是要过分挑剔，就会没有足够的地方去投钱了。所以，正如保罗·霍肯（Paul Hawken）指出的，当今财富 500 强中 90% 的企业，都会以其投资组合来显示自己是具有所谓的社会责任感的，这些投资组合的管理人当然是不会去反噬给他们喂食的手的⁴²。这种所谓的成功，只是其自身的无作为而已。

第二种技巧——股东干预⁴³——近年来也颇为热门。其做法是，由表示关切的股东约见高层管理人员，并促使其改变公司的行为方式。如果高管人员拒绝，股东就会作出提案。若提案能在年度股东大会上通过，公司就必须作出相应的政策改变。在 2003 年一年之中提交了三百多个提案，其中涵盖了包括 CEO 薪酬、劳工以及环境等各个方面。由于经理人们通过代理控制了大多数股权。这些提案没有一个得到通过，尽管某些案例确因其公众影响而导致了一些改变。

股东干预的一个更广泛的视角则与养老基金相关。养老基金在许多美国公司中拥有半数的权益。那么，美国的雇员就能够通过其退休基金来要求上市公司将雇员、社区与自然资源等置于与短期利润相匹配的位置。在现实中，养老基金**确实**在资本市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所起到的作用，通常是在当买家要收购绩效不佳的公司时，给买家加上一些秋千票数（swing vote）。在此类情形中，养老基金常为了增强股东的利益而将票投向买家。

近期，养老基金也在推动企业治理的改进。然而，养老基金的受信机构就像穿上了紧巴巴的紧身衣，他们被紧紧地束缚于对退休人群的受信职责之中，必须去寻求最高的投资回报，否则就要被面对被其管理部门——美国劳工部（U.S. Labor Department）修理的厄运。

假若资本市场能够对资本主义的奔放无羁有所制约，那才真是太讽刺了。但资本市场本身也罹患着企业的同样病症——无药可医的利润最大化的顽症。这并不是说任何想要改进企业责任的努力都是白费劲，这些努力逐渐提升了认知而有所补益，当然是正当的方式。但是其中真的存在着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弊病的系统解决方案吗？我对此深表怀疑。

强制责任

尽管我不认为这个景象会发生，但请试想一下，假如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的企业——取代其有限的责任——都要具有三重目标，法律并且规定，企业董事之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一要代表雇员、自然和其所运营的社区。当董事们偏向于自然而非利润时，法律会保护董事们免于诉讼。假如你就是 **Acme** 公司的 **CEO**，当这个法律生效时，你会作何改变？

好了，你可能首先就要增加会计预算。从今往后，你不仅要保持银钱往来的户头，还要有一个有关社会和自然的非财务性账户。尽管有可能找到捷径，这到底是很不容易的。下一步，你要派人去找到方法，来削减 **Acme** 公司对于自然和社会所产生的那些副作用，然后将方案分门别类，再逐年分派成本。你要将很有限的预算分派到成本效率最佳的项目上去，要优先考虑的是公关效果。你发布广告和报告，表扬自己做到了法律的要求。你要提醒董事们，如果他们愿意，尽可以冷落查尔斯·赫维茨之类的收购案，并尽可对股东资本大量增值这码子事就此放手。

所有这些都可能是“既做好事，又能做得好”。然而，考虑到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的公式，这些又究竟能带来什么区别呢？即使确能带来一些变化，那又能够向正确的方向带来足够的改变吗？结果却可能是，你在某件事上罄尽了你有限的绿色预算，而自然所最需要的却是其他。

那么，来设想一下另一个选择，如果自然资源的价格不再是零，突然，污染或有损生态体系就必须付出巨大代价。一夜之间，你的经理们立即就开始努力削减污染和浪费了，代价越高，他们就会越迅速地改变其行为，其改变与短缺的自然资源相对应，以相应的价格为指征。

问题是，这些做法中哪些会更有效——强制的社会责任，或是提升自然资源的价格？毫无疑问，答案是，后者。

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论

私有化的另一个版本也值得考虑。其核心是，通过扩张私有财产权，可以使自然得到保护，使污染得到控制。这一理论被称为**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论**，得到了如卡托研究院等自由主义智囊团的认同。

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论⁴⁴的开端，起始于由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于1960年所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科斯向当时所盛行的关于政府法规是保护自然资源的唯一方法的正统理论提出挑战。他说，只要定义清晰，并且执行成本低廉，自然资源是可以通过财产权而得到保护的。

在科斯的模型中，污染是污染者与被污染者双方的问题⁴⁵。如果有一方拥有清晰的财产权（举例，如果污染者拥有排污的权利，或者，被污染者拥有不被污染的权利），并且交易成本不高，双方就能达成交易从而降低污染。

究竟如何发生？让我们假设，被污染者拥有享用清洁空气的权利，根据法律，他可以对污染者所造成的损害提出诉讼。为避免可能遭遇的败诉，污染者愿意预先付给被污染者一定数量的钱以避免诉讼。而被污染者也愿意接受因污染所造成的不便与不适所得到的赔偿。于是，他们达成了双方满意的对污染程度与赔偿的协议。

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如果污染者拥有污染的权利，被污染者就要掏钱来求得减轻污染，同样，也达成了交易。这个污染水平——是零点以上的正排放，但低于污染者原本要排放的水平——以经济学家的词汇就是，**最佳的 (optimal)**。（至于对于自然环境来讲是否是“最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之所以能够达成这个水平，是因为污染者的外部负效应被内部消化了。

对于私有化的粉丝们（拥戴者），科斯理论是一个智慧的突破，对于市场——而非政府——才能解决污染问题这一论点，提供了理论依据。不必再以长篇累牍的法律法规去折磨企业了，政府只要签发了私有财产权，其他的就都可以留给市场去解决了。

自由市场环境保护论确实具有很多吸引力。在我看来，任何能使得商业经理人的生活变得简单的事，都是好的——不仅对商业好，对于自然和社会整体而言亦是如此。因为，简单的事，经理人们就能做到，还常常能够迅速地做到。而复杂的事情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现在，我们需要使我们的经济行为与自然达到和谐，就须以尽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来实现。对经理人们来说，明码标价的事情做起来更容易，那么我们就给他们价格吧，而不是法规与训诫。

但同时，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论中存在着一一些关键的缺失。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它缺乏对于如何对自然资源的资产权加以分配的严谨推理。科斯认为，不论以何种方式分派自然资源的资产权，反正污染都是同样的水平。尽管这在理论世界中可能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世界中，是否要求被污染者付钱给污染者，或是反向而为，对于人们的钱包来说可都是大不相同的事。

看起来，大多数自由市场主义者都认为应该给予污染者以免费污染的权利。在他们眼中，公民免于污染的权利，应当服从于污染者污染的权利。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的律师小罗伯特·F.肯尼迪 (Robert

F.Kennedy Jr.) 对此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污染者对公共资产的长期侵占,实际上就是一种补贴,早就该结束了。

我的问题是,当我们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人人平等的生存权利时,究竟以何种方式来分配资产权才是最好的呢?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我们需要加以探求,并没有关于如何将自然资源“资产化”的教科书。(当我使用“资产化”这个词时,意思是,将自然的某一方面视为资产,从而可以使其被加以归属。私有化则走得更远一步,它将资产划归企业主所属。)实际上,对自然资源的“资产化”有不同的方式,并会因之产生迥然不同的后果。既然我们将要与这些新的资产权利长久地共生共存——还要向其拥有者付租金——我们理应将其理顺。

关于由谁来代表被污染者。科斯以最简形式呈现了他的模型:个体的污染者与个体的被污染者。而在真实的世界中,通常都是少数大型的污染者与成千上万被污染人群之间的对峙。对于个体的被污染者而言,若想对大型的污染者提起诉讼,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昂贵代价,而巨人污染者若想同众多被污染的个体进行协商,也是同样不可能的。

为使得科斯模型能够成立,被污染者阶级作为整体,就需要由一个中介机构来代表,更重要的还有,这个中介机构该向谁负责、该按照什么原则行事。如果责任或是原则没有搞对头,中介机构迟早都会做错事。但如果责任和原则都是**正确**的,我们也许就真的能够纠正资本主义的污染禀性。关键在于,要使每一个中介都成为未来后代和所有当代公民的公平的信托。

接下来,是关于由谁来承接最初的资产权的问题,姑且不论他们是否要为此付费。考虑到迄今为止付诸实施的污染物贸易,都是由政府来发放向公共资源排放特定污染物的许可证。它将许可证——免费的——根据其过去的污染排放量发放给那些大污染者。过去的污染者,可以通过减少污染从而把那些富余出来的许

可证转卖而获益。

这类污染物贸易同时牵涉到了资产化与私有化。首先是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资产权——向公众权益排放一种特定化学物质的权利。其次，这种资产权被发放给私有化的企业。我对于前半个资产化的过程没有异议，但却对后半个私有化的过程存疑。

免费发放污染许可证，而不是以最高价来拍卖，就好像把一个商业办公大楼免费出租。比那还要更糟的是，免费承租之后，还任由免费住客做二房东再分租去挣租金。我们所谈的可不是换口袋的戏法，当涉及到二氧化碳排放时，资产权的分配就意味着上万亿美元的价值，是消费者们无可避免地要为更高的能源价格所付出的真金白银。付给**谁**，全在于谁能得到对天空的资产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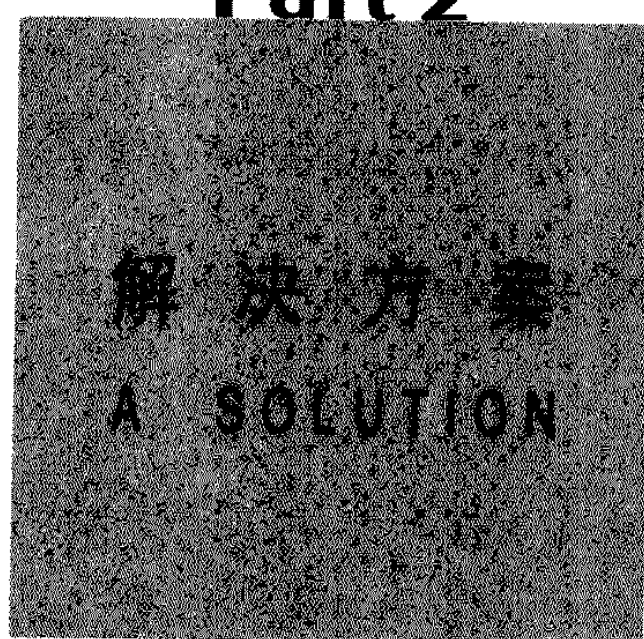
资产化，而不要私有化

将公共权益简单地交给企业，而没有任何补偿或后续的干预，就好像让狐狸看管鸡舍。企业是否能保护财产，根本就没有任何保证，更甭提想要企业慷慨地分享其利益。我们被告知，应该**相信**企业的所有者们会正当行事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或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具有社会责任感。然而，历史的证据以及企业的内在逻辑却指向了另外的结论。

无论如何，要想将一项共同继承的自然遗产**资产化**而并不同时被私有化，是有可能做到的。在下一章里，我将说明具体的做法。基本的思路是，将一些分散的公共权益改变为**公共资产**，而不是公司资产。当企业使用公共权益时，我们就可以向企业收取更高（并且是更真实）的费用，并可以分享因更高价格所得到的益处。并且可以确保销售的使用权的**数量**——既指对污染的允许程度——是以未来后代的利益为最优先考虑的。

第二部

Part 2



解決方案
A SOLUTION

第五章

再造公共权益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ret Einstein, 1929)

至此，我讨论了资本主义2.0版——或称过剩资本主义——的三个悲剧性的弊病：吞噬自然资源，扩大不平等，而且，最终并不能提升我们的幸福。其行为是由其驱动程序所注定的，它**必须**制造欲求，给资产拥有者们以最大的回报，并使我们偏离幸福的正确路径，其所作所为，都是由于其自身程式的驱使。富有良知的经理人或是偶然一现的另类的法规制定者，都不能将其奈何。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将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其核心是，通过增添一个能与企业部门相抗衡的公共权益部门，来纠正资本主义操作系统的偏差。这个新的部门将为那些被忽略的利益相关者们提供必要的反馈回路与代理服务，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人类的后代，被污染者，还有人类以外的生物。这个部门将以能量匹敌的**正面的**外部作用去抵消**负面的**外部作用。企业部门若要损害自然资源，公共权益部门就要起而保护之；企业部门若要扩大不平等，公共权益部门就要将其缩小之；企业部门若要将我们转变为自私封闭的消费者，公共权益部门就要在我们与自然、社区和文化之间重建联系。当公共权益部门建立起来之后，所有这些

就都会自动地发生。结果就将会是一个平衡的经济体系，我们能够从两个部门都得到最佳的效果，而避免两者中最坏的东西。

要从头建立一个经济部门无疑是一项巨大的任务。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建立公共权益部门，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只等着被发掘出来积累基础。这个财富的基础，就是公共权益自身，是我们所共同继承的自然资源和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财富比所有私有财产总和的价值都要高得多。公共权益部门的使命，就是要将这些遗产和财富加以组织和保护，并且以此使得资本主义自身也得到拯救。

我们的公共财富

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私有财富⁴⁶，即便有些人并未拥有许多。私有财富是我们所继承或个体积累的财富，其中包括从企业以及共同基金断续得来的收入。2005年，美国的私有财富（减除贷款的分期付款和其他债务）总和是48.5万亿美元。如前面所提到过，上层的5%人口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底层95%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总和。

但是，还有另一种并非广为认知的财富有待发现：我们的公共财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财产的共同继承者。这个共享的遗产包括空气、水、栖息之地，还有生态系统、语言和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和政治体系，以及更多，更多。

公共财富好似是经济宇宙之中的暗物质——它无所不在，但我们却看不到，因为它的大部分真的是不可见的。谁能够捕捉定位像空气、地下水，或是作为金融市场基础的社会信托系统等等的这些东西呢？更直接相关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自身的盲点：我们只能注意到那些闪烁着货币符号的经济现象，我们之所以忽略了

公共财富，是因为它没有贴着价签，也不具备资产权。

当运营资产启动其社会筛选货币市场基金时，我初次对公共财富有所体察。我的工作负责编写广告宣传，以期吸引人们向我们投入大量的钱。我们承诺要使基金增长，并承诺不向那些很坏的公司投资，任何时候当投资者提出要求时就会返还——包括增长的部分，但要扣除管理费用。当那些并不了解我们、从未从墙洞张望过我们一眼的人们真的将其积蓄的很大部分交给我们的时候，我感到相当的震撼。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会信任我们呢？

当然，答案并不是他们信任**我们**，而是他们信任我们运营的**系统**。他们信任我们将会精明审慎地管理他们的储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作为**个人**赢得了他们的信心，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或其他检察官就会介入来对我们加以管束。加之，他们相信我们所投资的企业都会诚实地发布收入数字，并诚信地遵守义务。这种信任及其所基于的大的体系，是历经年代所积累起来的，与我们个人无关。简而言之，虽然运营资产公司提供了人们愿意为之付出的服务，但我们也从所共同继承的大系统中受益匪浅。

当运营资产公司考虑要上市时，我又尝到了公共财富的另一种味道——那就是通过公众提案向陌生人销售股票。我们的投资银行家告诉我们，为了上市，我们得将我们的股票价值提高**30%**，他将此魔法称为**流动性溢价**（*a liquidity premium*）。他的意思是，能在拥有百万商家的市场上出售的股权，就比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更高。这个附加的价值与我们的作为无关，而是社会对流通性所制定的奖励，他人播种，而我们可以收割。（最终我们还是没有上市，因为我们不想屈从于华尔街的规矩）

我逐渐认识到，信托和流通，只不过是那条包含着自然馈赠、社区与文化的

无比辽阔的公共财富大河流域中的两个小小分支而已。自然的馈赠，包括我们从造物主那里所继承的生存的以及非生存的所有奇妙事物；社区，包括无限广大的、有形的与无形的根脉联系，将我们与所有人类有效地联系起来。文化，则包含着我们所有的科学、发明，还有艺术。

尽管公共财富具有着不可见性，但其价值是巨大的。但究竟大概价值几何呢？对于私有财产估价是很容易的，因为私有财产可以有规律地进行交易，也就有了交易的价值——如果不提其内在的固有价值——于是就很容易了解。而公共财富就不同了。很多人类所共享继承遗产的价值都无法衡量。虽然其中有些是可能被量化的，但却又没有一个相应的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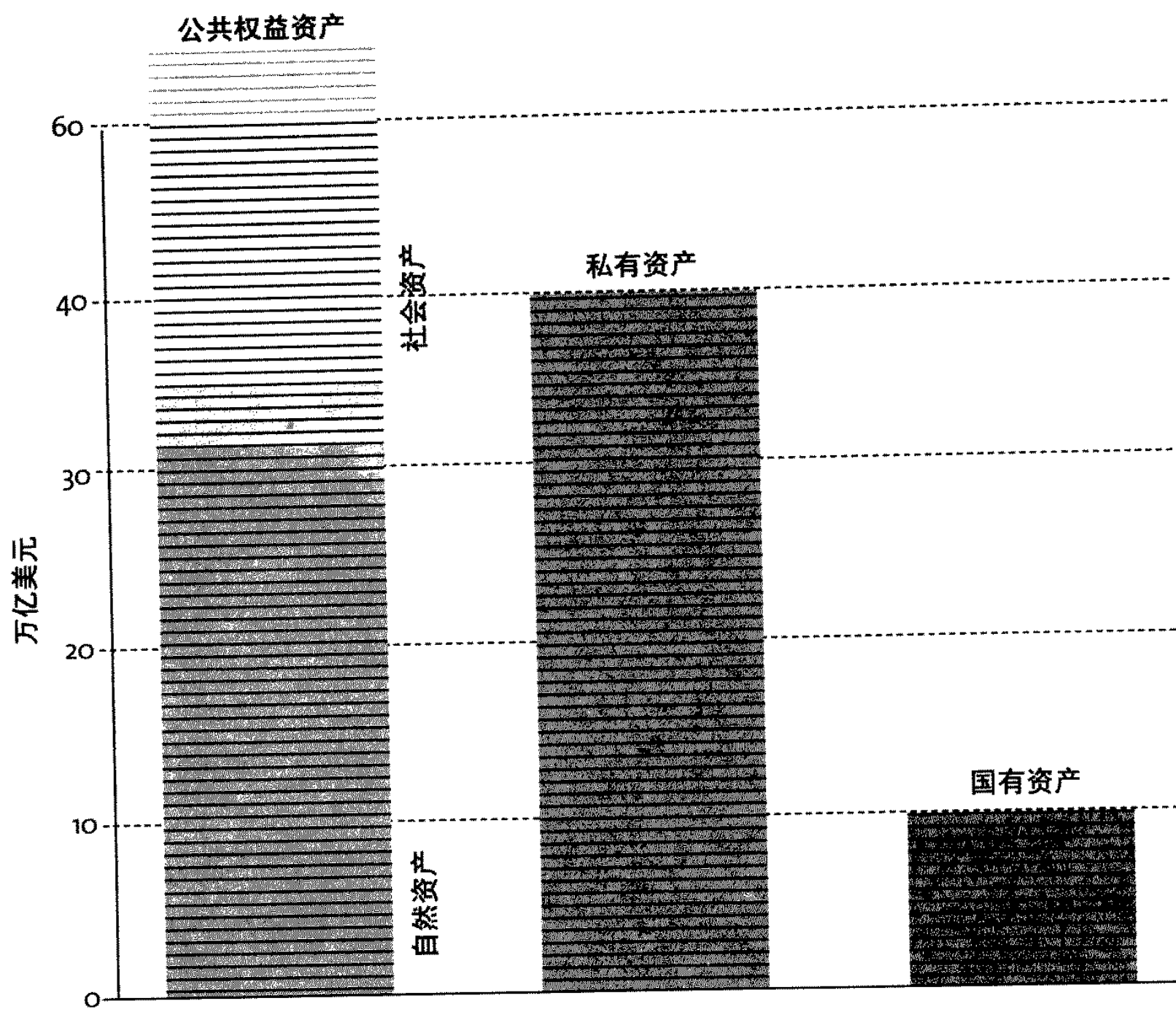
幸运的是，经济学家们都是聪明人，他们发明了对未作交易的事物加以估值的方法，这便为公共财富的价值设置一个量值秩序成为可能。从无数个案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公共财富的很大部分都不能以货币形式估值，但仅那些可能进行估值的部分的价值，就已经超过了私有财富的总和。（见图 5.1）

图 5.1 低估了公共财富和私有财富之间的差距，因此它没有什么价值。部分原因在于它忽视了公共财富的大部分是不能被量化的这一事实，另外的部分原因是，在私有财富上所反映出来的部分价值，其实是属于公共财富的，若是把贴错了标签的这一部分财富从私有财富中减去，再增加到公共财富中去，那么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

有一个例子或许能有助于对此的解释。假设，你购买了一所价格为 30 万美元的房子，并未作过什么改进，过了几年又以 40 万美元的价格卖出去了。你在已付的分期付款之外，又得到了一大叠现金。你的私有财富增加了。但是想一想，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房价的升值。不是因为你自己做了任何事，其实是因为你的小区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了，而吸引力增加可能是由于人口的迁移，或许是因为新建

了一条高速公路，改进了一所学校，或是因为邻居的美化，也就是说，你的财富增值，是取之于社会性的增值。它以私有财富形式所显示的，其实是来自于社会的馈赠。

图 5.1 2007 年美国公益资产、私有资产、国有资产估值 (万亿美元)



只反映了可量化资产

源自：公益之友 (Friends of the Commons), State of the Commons 2003-2004.

<http://friendsofthecommons.org/understanding/worth.html>。

我们拥有多少财富？

■ 自然资源资产

2002年，经济学家罗伯特·科斯坦萨（Robert Costanza）与保罗·萨顿（Paul Sutton）估计，生态系统服务对于美国经济的贡献大约是2万亿美元。所谓生态系统服务⁴⁷，即指人类从自然生态系统中所获取的收益，包括从野生动植物所获得的食物、气候规律、废气、废物的消化吸收、新鲜水资源的补充、土壤形成、营养循环、洪水控制、授粉繁殖、矿藏，以及更多。科斯坦萨和萨顿引用了许多以前的研究，也参考了卫星图像，他们对生态系统的每一生态单位（biome：例如，一英亩雨林，或草地、沙漠）进行估值，然后再乘以各种生态单位的总和，再对全部生态服务与生态单位的价值加总。

如果两万亿美元代表了自然资源对美国经济的每一年的贡献，美国自然资源的基础价值又是多少呢？计算方法之一是将每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视为自然资源“股权”所产生的“收入”。那么，以此收入乘以平均价格再除以过去15年股票交易的平均收益率（16.5/1），得出的自然资源估值就是33万亿美元。如果此图具有任何价值，其价值就在于它的确是低估了自然的价值，因为它忽略了自然所具有的一个单一性质：其不可替代性。如果企业破产了，它对于社会的用处和贡献将迅速地被其他企业所提供。然而，如果自然生态系统消亡了，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替代的。因此，在33万亿之上，需要加上未可定量的不可替代性的附加价值。

■ 社会财产

较之自然资源，社区与文化资产的价值就更少得到估值了。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审视一些例子而对其量值找到一些感觉。

自1990年以来，互联网（Internet）对于美国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⁴⁸，它孵化出了很多新的公司（仅举其中几例：美国在线、亚马逊、Ebay），推动了原有公司的销售和效率，推进了教育、文化与信息交换。所有这些又究竟价值多少呢？

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正确的答案。但是，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与

得克萨斯州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的一项共同研究发现, 2000 年互联网产出的收入是 8300 亿美元。假设, 互联网的资产价值是其年收入的 16.5 倍, 那大概就价值 13 万亿了。

另一项富有价值的社会资产是股票交易的复杂系统、法律以及使美国人得以容易地出售股票的通讯媒体系统。假想这个社会创造的“流通性溢价”占到了股票市场资本价值的 30%, 那么在 2006 年其价值大概是 5 万亿美元。如果这些权益都被置于一个属于全体美国人的共同基金之中, 平均每个家庭就会增加 4.5 万美元的财富。

非营利性的文化活动也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成百上千亿美元的价值⁴⁹。2002 年的一项美国艺术调查发现, 非营利性的艺术与文化行为每年都会产生 1340 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其中包括 890 亿的家庭收入支出与 240 亿的税收。若再乘以 16.5 的指数, 也就是说, 美国的文化资产价值超过了 2 万亿美元。仅以上这三个例子的价值就超过了 20 万亿美元。社会资产很长的清单——包括科学和技术知识、我们的法律和政治系统、我们的大学、图书馆、会计程序、还有交通基本设施等等——意味着我们的社会资产的总价值是与我们的自然资产的总价值等量齐观的。

这些冷酷的数字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尽管我们都偏好于私有财富, 其实我们所珍视的大多数东西, 都是被共享的。若不相信, 就请想象一下: 花儿的美丽, 完全不靠土壤的滋润、太阳的照耀以及蜜蜂的勤劳。

是时候了, 我们需要对所共享的馈赠有所认知。不只如此。是时候了, 我们要为这些馈赠正名, 要对其加以保护, 要对其加以组织整理。现实的问题是: **如何**来做呢?

公共资产也是资产

瑟斯博士的“劳莱克斯”(Lorex), 那个为树木讲话的反面角色, 还有它的对手“一次性”(Once-ler), 那个工业、职位与增长的代言人。尽管两个角色讲

话都很机灵，但并非对手。“一次性”拥有资产权，而“劳莱克斯”只有语言。在故事的结尾，“一次性”砍伐了所有的“特鲁弗拉树”(trufflula)，劳莱克斯的抗议尽管雄辩，却于事无补。其中的寓意很明显：树木也需要权利。

为什么不可以呢？财产权是人类卓有成效的发明，它们是由法律协议所规定的。据此，社会对财产者的拥有者赋予了相应的特权，其中包括使用、排他、销售、出租、租赁、贸易或遗赠特定财产的权利。这些特权可以被集成使用，也可以任何其他方式而分别使用。

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产权利所组成的。封建经济基于由封建主向其长子的赠与，以及由平民共享持有的公共财产。平民们被要求以某种形式为封建主效力，而封建主则享有所拥有的土地和劳力。整个构建的基础则是所谓的神圣王权。

以相似的形式，资本主义则是由我们在当代所创立并尊崇的财产权利所构架的，其中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我们称之为**股权合作制企业** (*joint stock corporation*) 的财产权网络。这个虚构的实体拥有永续时限、有限责任以及——正如过去的封建制——几乎是完整的主权。其享益的权益被分割为可供交易的股权，并使其自身也成为资产的组成部分。

资产权本身并无关碍，有关碍的是将资产权集中在利润最大化之手的掌握之中。比如说，你可以代表后代利益建立一个对森林或某些树木的拥有权的信托，这些资产权也会如同太平洋木材的股权一样响亮发言，但它们的目标却很不相同：是为了保护森林，而非开采森林。如果“劳莱克斯”拥有一些这样的权利，瑟斯博士的童话（以及太平洋木材公司）就都会有一个更快乐的结局。

想象一下，一系列此类的资产权利，且让我们将其统称为**公共资产权** (*common property rights*)。如果还不存在这样的权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须将其创造出来。幸运的是，它确实已经以某些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例如，由信托所

永久持有的土地或地役权 (land or easements held in perpetual trust)，例如自然保护区，再如代表广大社区所管理的企业财产，还有，如阿拉斯加永久基金。

有些公共资产的形式也包括了个人股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又是例证。然而这些个人股份与私营企业的股份不同。它们不是那些你可以在市场交易的证券，它们凭借的是你的社区成员身份。如果你移民或亡故了，也就失去了你的股份；相对的，如果你在社区中出生，你的股份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认识到，在某些情形下，将公共财富转变为**任何一种**资产形式，确实都是对天理的冒渎。正如苏夸美什部落 (Suquamish tribe) 的西雅图酋长 (Chief Seattle) 所指出的，“你怎能买卖天空，以及土地的温暖？”我对此抱有深深地同感。然而，我也相信无限制、无代价地污染天空，要比将天空转变为公共资产并将其置于对未来后代的信托之中，是**更加**地大不敬。所以，我同意将其**资产化**，但不是私有化。

公共权益部门的组织原则

资产权利，尤其是公共资产，需要由胜任的机构来管理。随着更多的公共资产的确立，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一系列与企业 and 政府都迥然不同的机构，其独特而清晰的使命，就是管理公共资产。

我提到一**系列**机构，因为确实有多样性的需要及必要。公共部门的文化不能像企业部门那样的单一，每个机构的行为方式须顺应其所对应的资产。

多样性，部分取决于所相应的资产是否是有限的或是不可过度开发的。一般来讲，自然资源的赠与都有其限量，只有当其所吸收的二氧化碳是限于一定量时空气才是安全的，只有当有限地进行渔业时海洋才是丰富的。因此，管理自然资产的机构就必须能够对其使用加以限制。对照之下，思想和文化创造就具有无限的开发和再应用的潜力，在这类公共资源的领域，管理机构须尽量扩大公众的取

得，而尽量缩小私有性的霸占。

尽管具有其多样性，公共部门机构将需要遵守一些共同的组织原则，以下就是其中一些重要原则。

为公共权益保留充足的、良好的资产

如洛克的论点，要将**部分**公共利益私有化是可以的，前提是只要为所有人永远保留了“充足的，与良好的⁵⁰”公共利益。对于生态系统来说，**充足的**，意味着足以使其能够继续生存并保持健康状态，**充足的**或更多的，都须是属于公共权益的，即使生态系统中有某些部分是私有化的，也是如此。至于文化和科学，**充足的**，就意味着确保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区间。像专利和版权之类的排他性许可，都应被限制在最低。

先考虑未来后代

企业将股东的利益放在首位，政府则优先考虑竞选捐助者的利益以及在世的选民。而当今却没有人来为未来后代做优先考虑。而这，将是公共部门的首要任务。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公共资产信托将要对未来后代的利益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将在第六章中讨论如何使这一点得到实现。）他们还将受到**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制约：当有疑惑时，则本着安全原则行事（*when in doubt, err on the side of safety*）。当面临短期收益与长期保护之间的矛盾时，就要求他们必须选择后者。

越多越好

私有资产的继承是**排他的**，而公共资产则是**包容的**。它总是希望有**更多的**共同拥有者或是参与者，来共同一致地对资产加以保护。

对于文化和互联网之类的公共资产来说——没有物理边界、应用越多就越好。这个组织原则的适用性最为清晰。它还适用于像社会保险和医疗这类需要全员参与的社会性契约。这些契约以财务机制表达了我们对于同胞的一致承诺，这些契约是有效而公平的，因为它们包含了所有人。倘若它们是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之下运行，就势必要排除那些穷人（穷人也参与不起）和任何对私有利益保障有风险的人。

一人一股，同股同权

现代民主政府建立在一人一票的原则之上。同样地，现代公共部门也需建立在一人一股的原则之上。

在短缺的自然资产的情况下，有必要对使用权与收入权加以区别。要使所有人都拥有对于有限公共资源的公平的**使用权**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出售有限资源使用权而获得的**收入**，每个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权益。

包含一些流动性

当前，私有资产拥有者对于资产收益享有近似垄断的权益。但是，如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所彰显的，公共资产的共同拥有者也有可能获得收入。

收入共享不仅会终结私有资产对于流动性的垄断，还会终结其对关注焦点的垄断。如果人们从公共资产获得收入，他们就会对其报以**关注**，就会去关心、思考、并谈论。对于不可见的公共资产的关切也就会随之剧增。

对公共资产流动性的设计须非常小心。很难。由于公共资产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就不得像企业股票那样被交易。也就是说，公共资产拥有者们不能只顾攫取资本收益，而是在其有生之年通过权益、租金分益、版税、利息、分红等形式来获取自己的那份权益。

未来展望

与计算机操作系统不同，资本主义 3.0 不是在磁盘上预装好了的，也不能被下载。它必须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起来，按照各类公共权益中的各种资产，逐一而行。图 5.2 显示了这个过程，更详尽的描述则在第九章之中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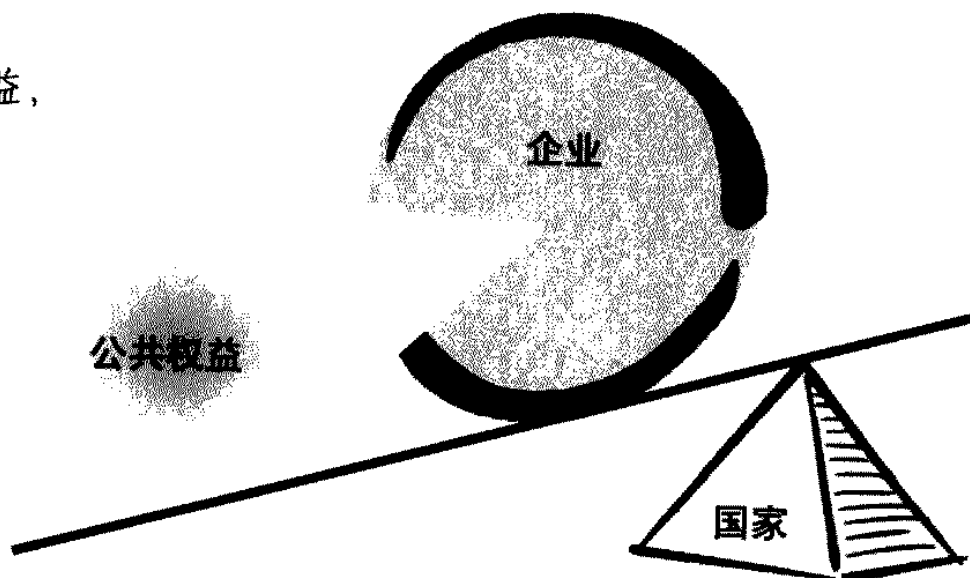
在资本主义 2.0 版本中，私有企业在国家的帮助之下吞噬着毫无组织的公共权益。竞技场中的景象是严重地一边倒。在转变阶段，国家向公共部门机构颁布权力，正如其曾向企业所做的一样。于是竞技场开始趋向平衡，最终，在资本主义 3.0 版本之中，私有企业与组织起来的公共部门都得到加强，并彼此制约，国家机器则保持着竞技场的平衡。

下一章，将对公共权益信托及其经济因素作更具体的考察，之后的两章则将对文化和社区进行考量。

图 5.2 由此通向资本主义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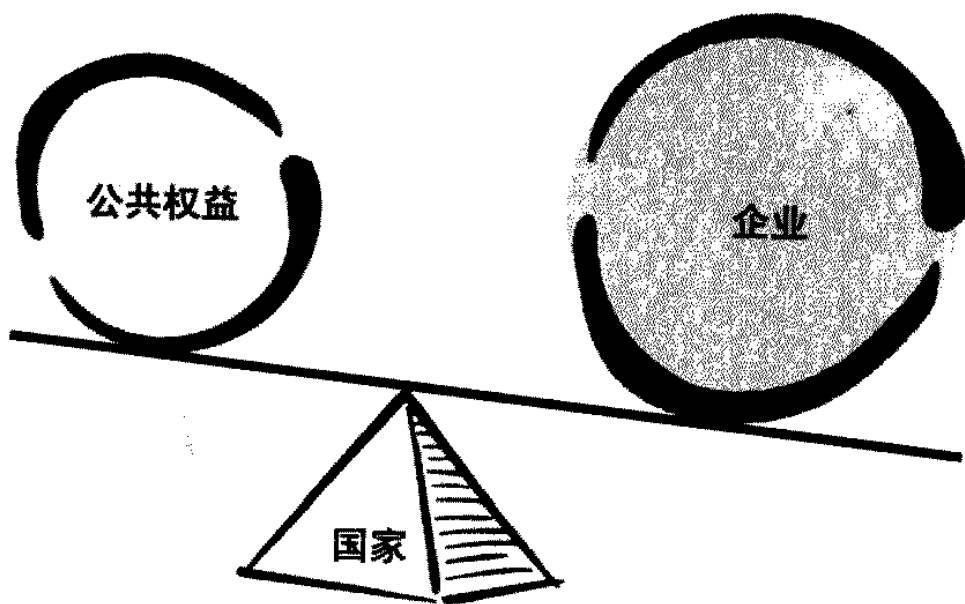
1. 资本主义 2.0 版

私有化企业
在国家的帮助下吞噬公共权益，
游戏场地严重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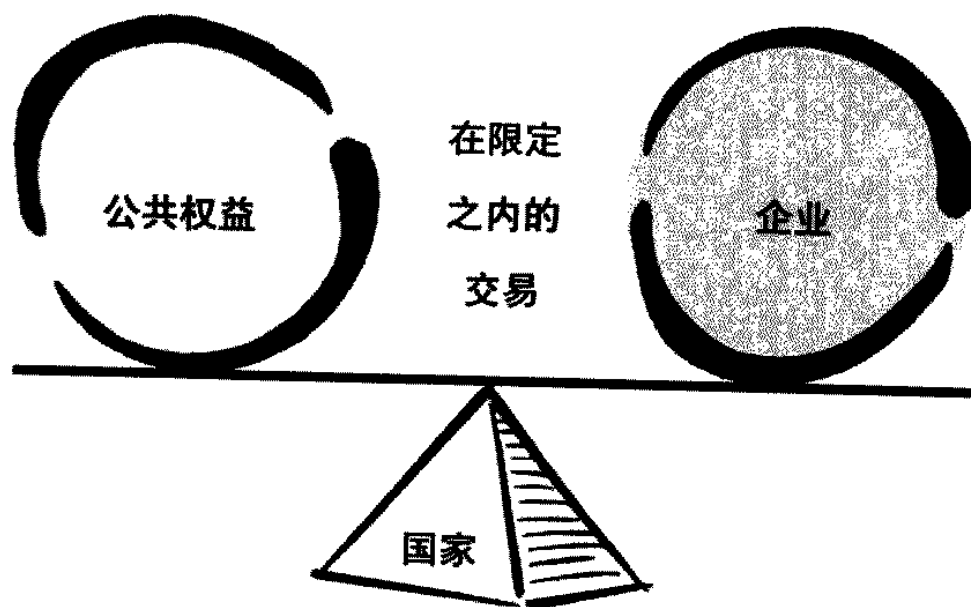
2. 公共权益的再造过程中

国家将权利授予公共权益，
正如曾将权益授予企业。



3. 资本主义 3.0 版

私有化企业与组织起来的
公共权益彼此增进
并互相制约，
国家则保持着
游戏场地的平衡。



第六章

造物之信托

主将其土地与生命物种交付给我们的第一代先祖，
那责任又传递到我们手中。⁵¹

——全国福音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2004)

造物主的赐予唯有一次，并不可代替。相形对照之下，市场上交易的产品都是大量生产和高度消费的。很难想象一位神祉会将这类短暂的产品与她或她的旷日持久的手工制造相提并论。问题在于，造物主不可替代的赐予究竟是否具有足够的特殊性，从而理应受到我们的经济体系操作系统的特殊优待？对此完全可以有雄辩的论点作为支持。

这个案例既有其道德性也有其经济性。道德的论点是：我们有义务对不可替代的来自造物主的赐予加以保护，而对于过渡性的商业性产品，我们就没有类似的义务。经济性的论点是：任何肆意吞噬其自然资本的社会，都必将走向贫困。我认为两个论点都极具说服力。

但是今天的现实又是如何呢？我们遭遇到两种困惑的现实。其一是，只存在极少的对自然馈赠加以保护的资产权，有限的几个例外就是那些被划拨为公园和野生保护区的区域，我们须以类似于沃尔玛 (Wal-Mart) 连锁店的规则来对待大

自然的馈赠。其二是，企业的赢利权凌驾于所有其他权利之上。

该是要对造物主的赐予区别对待的时候了，在它们身上贴上不同的“标签”，以使得市场能够加以识别并对其实施不同的规则。在本章中将要讲述如何才能做到。

资本的神圣权利

加利福尼亚州司机手册上说：“在路口，对先行到达路口的车辆，以及同时到达然而在你右侧的车辆，要让行。⁵²”（我十几岁的儿子要考驾照时，我从他的驾驶考试题中发现了这一条交通规则。）

为什么在右侧的车辆就比左侧的车辆更优先呢？不清楚。很可能这条规则根本就是主观裁定。但是总得某一方拥有道路的优先权，否则车辆就会搅成一锅粥。对于海洋中的航船，以及任何复杂系统中的运动事物，此理皆然。

在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中也是如此。当两种资产权到达同一个路口时，总要有一个人超越另一个。或是资本解雇雇员，或是雇员解雇资本；或者是我的污染权超越你的不被污染的权利，或者是反过来。正如他们在好莱坞的说法：总要有一个人挣到最多的钱。

但那会是谁呢？马乔林·凯利写了一本很棒的书，名为《**资本的神圣权利**》（*The Divine Right of Capital*）。她用**神圣**而并不说神授，说的是在我们现行的操作系统之下，资本的权利凌驾于所有其他之上⁵³，工人、社区、文化和未来后代的权利——在资本的短期收益最大化的特权之下，都统统只能退居次席。这种层级不是来自神的意志或自然定律，而是一种政治选择的结果。

关于在任何社会中由谁拥有巅峰权利，一直是个有趣的问题。任何时代的权势者都会一成不变地断言：没有其他选择。300年前，国王如此断言；今天，资

本的拥有者也同样地断言。他们雇佣神父或经济学家，为其主张筑造道德的或伪科学的祭台。然而事实上，是各种社会选择了它们的掌权者⁵⁴，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改变我们的意愿。

凯利指出，在我们的编程之中有很多处都写明了资本的优越。以企业董事为例，他们受到法律的约束，而必须将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置于优先地位，如果有买家提出比当前市场价值更高的价格，除了出售，董事们就没有其他太多选择，也就不能顾及对于工人、社区或是对于自然的影响。相似的，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以及其他投资机构的受信职责，都是要为其股东或受益人追求最高的回报。这种责任包含在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尽管其中的语言听起来足够无辜——养老基金经理，如任何其他信托机构一样，“将行使其职责……纯粹为了参与者与受益者的利益”——而其讽刺性的结果却是，以广大工人的退休金投资了许多公司，而这些公司却将其他工人的职位转移到了海外。当世界贸易组织 (**WTO**) 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出台之后，资本权利就更可以舒舒服服地凌驾于所有其他之上了。

究竟是哪里出错了呢？商业追求利润并没有错，它们就是这样被设计的，它们做的正是我们所希望它们做的事。问题是私有资本霸占了公车的前座，而所有其他人都被挤在了后厢。

当今，确有一种法律对造物主的赐予给以优先待遇：《濒危物种法规》 (**the Endangered Species Act**)。它规定，某些物种的权利优先于资本短期回报的权利。但麻烦在于，只有当某个物种濒于灭亡之际，这个法律才会生效。即使在此时刻，法律也不一定总是会被强制执行。不久前，有一年非常干旱，政府减少了对加利福尼亚州农民的补充供水，因为鱼类已受到威胁，需要这些水才能生存。有些农

夫提出了诉讼，指控政府“拿走”他们的资产是违反宪法的。联邦法院判农夫胜诉，布什政府拒绝上诉，农夫们得到了 1300 万美元的集体赔偿。⁵⁵

在我看来，如果真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那就应当是造物主的赐予。从道德上，它们是我们共同继承并必须再共同传承下去的；从经济上，它们是不可替代的无价的资本。对这些共享资产的保护，必须超越短暂的私有收益。广义的收益须超越狭义的收益，公共权益须超越资本利益，这些都应被写入我们的经济体系操作系统的程序，并得到法庭的强制执行。

从花园到生态系统

特里巴 (Trebah) 花园⁵⁶ 是英格兰康沃尔 (Cornwall) 天堂景色中的一个异常美丽的景观。一条巨大的峡谷，布满行色各异的树木和灌木，绵延直泻至赫尔福德 (Helford) 河边。几年前我曾造访这个花园去欣赏它的美丽。我迅速地认识到，它的历史和治理就像它的花木那样，同样引人入胜。

这块地产原属埃克斯特大主教 (the Bishop of Exeter) 的财产，最早见录于 1086 年的《英国土地志》(Domesday Book)。在乡绅和农民之间多次转手之后，它于 1931 年归于一个富有的桂格教徒家庭，并被开发为一个不同凡响的花园。这块资产在 20 世纪又被多次易手，花园逐渐荒芜。最后，有一个私人拥有者投入了一小部分钱财对花园做了些修葺，之后就将其捐献给特里巴花园信托基金，从此，它可以向公众开放，并为后代保留下来。

现在，任何人只要捐献 250 英镑，就可以成为这个信托基金的终身会员。会员们可以免费进入花园（其他访客需要付门票）并参与对资产管理委员会的选举。他们会收到年度报告，会计审计，还有会议通知，在会议上他们可以投票并提交议案。如今，信托基金有大约 1000 个有选举权的会员。

当我漫步在长满羊齿类和杜鹃属植物的广袤之地上，突然被一个念头所撞击：**Trebah**就是本书的一个微缩模型。它从私有权属逐渐演变为公有权属，从而才能够得到共享和保护。如果我们将世界设想为各种各类花园之集大成——就是说，人类所积极作用的生态系统——特里巴模式就变得极为有趣。它同时阐明了两个过程，自然的馈赠可以从私有权属转变为公共权属的过程，以及一个机构化的模型——信托——将此类自然馈赠作为公共的永久资产加以管理的机构模型。

作为为受益者管理资产的机构，信托基金⁵⁷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被设计出来。信托的精髓在于信托的关系。信托和受信托方，均不能为了私利而作为，他们的法定义务都只是为了受益者而作为。

以下是信托的一些原则

- 经理的作为必须是基于对受益者的不可分割的忠诚。
- 除非被另外授权，经理人必须坚持信托的原始定义。将收入作为费用是允许的，但不得有损资本。
- 经理人必须为受益方提供及时的财务信息以保证信息透明。

这些规则是可被强制执行的。基本的强制机制是：感到不公而愤怒的受益者或是州检察官，可以对信托机构提出诉讼。当诉讼提出时，信托机构必须证实其行为的审慎，如果存在任何疑虑，受信托者就会受到处罚或被开除。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萨（**Benjamin Cardozo**）曾经说：“一个信托人所需信守的⁵⁸，是比市场上的道德更为严格的东西，其行为的守则不仅是诚实，还有最最敏感的关乎荣誉的细节。”

信托与管理员不是一回事，管理员关心的是一种资产，但他们的职责是靠自

觉的，也是模糊的。相对而言，信托的职责则是必须的，而且相当具体。所以说，信托是比管理工作更加正式，更加严格的责任。

信托可以对金融的或是物质的资产负责。在这一章中，我将集中在自然资源——我们从造物主所承受的赐予。我的基本理论之一是：每个年代的人都有一个将此类遗产向下传递的契约，向尚未出生的未来后代传递，不得损耗。如果我们要遵守这个契约，就必须要有**什么人**来作为自然馈赠的信托，或至少是要承担那些最濒危的馈赠遗产的信托。那么，会是谁呢？

公共资产信托

Trebak花园信托并不是稀有的例子。在英国，全国信托⁵⁹(the National Trust)——一个创建于1895年的非政府慈善机构——在英国各地乡村拥有60多万英亩土地，600多英里海岸线，还有200多个历史建筑和花园，其52人管理委员会的半数委员，是由300多万会员所选举产生的（另一半则由一些与信托基金目标一致的其他非营利组织指派）。在美国，现在已有大约1500多个类似Trebah的信托基金，保护着900多万英亩的地区。在此之上，更有着具有55年历史的自然保护区（Nature Conservancy）保护着5500多万英亩的区域。

那么让我们假设，一个叫做**公共资产信托**（*common property trust*）的一般性机构，它专门管理那些来自公共权益并需被**视为**公共权益加以保护的资产。公共资产信托首先并最大程度地代表未来人类的利益来管理这些财产。它们也可能有第二受益者，比如公共教育或某一个特定地区的居民，但是这些在世的受益者的位置肯定是在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类之后。这些信托掌握并管理各种财产权，并以此执行其使命。这儿有两个来自我自家后院的例子：马林农业土地信托（Marin Agricultural Land Trust, MALT）和太平洋森林信托（Pacific Forest Trust, PFT）。

家庭农场的消亡与城市周边空地的减少,看起来是不可阻遏的趋势。然而在旧金山北边的马林县,家庭式的乳业、羊群和畜牧地都存活下来了。主要原因是那里的牧场主有一个选择:将保护地役权(**conservation easements**)出售给马林农业土地信托。

保护地役权,是土地拥有者和信托之间的自愿性的永久性限制土地使用的协议。牧场主可以继续使用或出售所拥有的土地,或是遗赠给其继承人。但是,牧场主放弃了某些与土地相关的权利——例如修建更多房屋或是砍光树木。取得地役权的信托要确保其条款得到现在和将来的土地拥有者的遵守。

在马林县,马林农业土地信托通过向牧场主购买保护地役权,已持有将近4万英亩农地的保护权,约相当于现有农地的三分之一。牧场主则得到商业开发土地与经营农场之间的差价。事实上,他们因作为土地的管理员以及对未来资本收益的放弃,而得到这些报酬。

马林农业土地信托的大部分资金是来自公众。公众所得到的不是旧式的共享公共牧场,而是永续的田园风光,以及多样化的农业经济。这对于郊区周边的地区,是个不坏的选择。

以十分相似的方式,太平洋森林信托从林区的私营拥有者那里买下的也是所谓的**服役森林保护地役权**(*working forest conservation easements*),有些保护地役权是购买的,另一些是林场主捐献的,而林场主们则会因此得到一些相应的税务优惠。仍以类似的方式,林场主继续拥有地产,但承诺放弃有损森林的开发以及过量砍伐。

太平洋森林信托的目标不仅是要保护森林,还要保护生存在森林之中的很多物种,以及森林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如清洁的水源、二氧化碳吸收。与马林农业土地信托一样,太平洋森林信托的部分资金来自公众。作为回报,公众得

到了健康的森林，而成本远比购买和直接管理要低得多。

阀门，及其看管人

公共资产信托的一项任务是要保护生物和自然环境，但这类信托也能够扮演另一个角色——控制流向生态体系的污染。在此情形下，它们所管理的不是生态体系自身，而是**围绕着**生态体系的人类经济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更像是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而不是自然保护区（**Nature Conservancy**）。

请允许我在此稍作闪回。当我上大学时，我的经济学教授讲授物理的和货币的“杠杆”，那些聪明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杠杆来调整经济。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仍是凯恩斯主义盛行之时。在我的想象中，那儿有一个经济总控室，其中充满着各种仪表和阀门，干活的是那些穿着粗花呢外套的学者们。英俊精明的男士们（那时候还是男人的世界）在那儿扫描读数，一边用烟斗吞云吐雾，一边调整几个刻度。其他人都随声附和。于是一切都平安无事。

长大后，我了解到世界可是比那种想象要远远混乱得多。在现实中，没有什么经济中心控制室。只有一个巨大的阀门——钱币供应——和一个转动阀门的人——联邦储备局的主席（再加上几个帮手）。这个阀门对于经济活动有一些作用：当阀门松开时，利率降低，经济活动蹿升；当阀门拧紧时，利率上升，经济活动衰退。但是联邦阀门不能控制我们的经济机器的所有行为。尤其是，对于我们向周围的生态体系所排放污染的污染率，它就一点作用也没有。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阀门来纠正这个问题。

以碳排放为例⁶⁰，试想，当前，我们的经济引擎向大气层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使气候变得不稳定。我们急切需要一个能减慢碳排放的阀门。让我们假设可以设计并安装一个这样的阀门（我在前一本著作《**谁拥有天空？**》（*Who Owns*

the Sky?) 中解释过如何能够实现这项任务, 它涉及到向那些将燃油带入经济体系的公司销售有限量的“上游”(upstream) 许可证), 于是要面对的下一个问题是: 由谁来控制这个阀门?

这个责任当然不能交给狂放无羁的市场, 我们已经看到了, 它们没有能力限制污染。那么留给我们的还有两个选择: 政府或信托。政府是一个政治动物, 它的时限是短暂的, 其中没有未来后代的地位。与之相反的是, 公共资产信托是受信托的机构, 具有长久的时限, 并对未来后代承担着法律义务。基于经过同行审阅 (peer-reviewed) 的科学家们的建议, 我会选择公共资产信托来看管阀门, 信托能够作出艰难的决策, 而不会因此导致政治自杀。他们可能是由总统所指派的, 就像联邦储备局长一样, 但他们不会像内阁成员那样屈从于总统。得到任命之后, 他们就承担起了为未来后代的法律义务。

现在来想象, 在地方、区域和国家的各个水平上都安装了适当数量的阀门, 不只是为了碳排放 (碳排放只需要一个国家水平的阀门就行了), 还要对付不同种类的污染物。设想控制阀门的是那些对未来后代负责的信托机构。它们将拥有减少某些由企业转移到公共权益的负面外部影响——弊病——的权力, 还将拥有拍卖有限的污染权的权力, 拍卖给最高出价者, 再将收入分给公共权益的拥有者。这些都不是联邦储备局或是环境保护署 (EPA) 所能起到的作用。

这些信托机构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经济操作系统。现在的那些没有代价的外部副作用, 将会转变为在可靠管理之下的财产权。如果一个企业想要排放污染, 它不能为所欲为, 而是必须向公共信托购买权利。污染的价格会升高, 而企业造成的弊病会减少。后代的生态体系将得到保护。更多的收入将流向普通公民。人类以外的生物得以繁盛, 人类的不平等将会消除, 而且政府不会膨胀——我们的经济引擎会自行完成这些工作。

关于阀门，还有最后一点，在何处进行最初安装并不是太关键，而将其安装在正确的地方、用正确的人负责则是至为重要的。然后就可以由**他们**去调试这些装置了。

第二套账本

思考的模型都始于假设。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假设是，只有两种类型的资产：私有的（即企业或个人的）与国家的。没有共享的财产，在同一代人或几代人之间不存在义务，而人类以外的生物，则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吃的。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这里缺失了很多东西。最明显的缺失，就是人类企业在其中运作的那个伟大的自然的经济。我们从那个经济中大肆地借用，却从不会记录这些借贷。同样缺失的还有未来后代，我们也从他们那里放肆而又偷偷摸摸的借贷。

在一个正当的记账系统中，每一笔借贷都会出现在借方和贷方各自的资产负债表中，一方的债务，就是另一方的资产。但在当代经济中并非如此。当人类经济增长时，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都显示了增长，却没有在任何地方显示债务。事实上，没有任何账目**可以用来**显示债务。总账上只有一边倒的良好增长，弊病与债务的累计则是空白，不被记录，不被注意。

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在这个被削减的模型上作了一些添加。例如，他们现在认识到，**公共物品** (*public goods*) 和**生态体系服务** (*ecosystem services*) 对经济的贡献价值。像国家防务、教育、洪水控制这类属于公共物品的服务，对于所有人都是有益的，却无法容易地出售而取得利润，因为市场不能充分地提供这些物品，于是就要由政府接手。经济学家们有时会就这些公共物品的价值，与其加给纳税人的“负担”相比较的孰轻孰重而进行争论，至于这些花费并没

有在任何账目上被作为增加的价值或是作为属于任何人的财产而被显示出来，他们就不去管了。

相似地，很多经济学家现在也都认识到了**生态体系服务**对于经济的价值。然而，产出价值的这个生态体系既没有归属，也没有资产负债表。它们只是就那样在空间中**存在着**而已，与人类之间没有联系。我的建议是，经济学家要将它们看待为**由信托掌管的公共资产**。这个简单的假设，不仅能将生态体系纳入总账，使我们能更好地对其进行跟踪，而且，这个假设还会为在现实世界中能够真正保护这些生态系统的资产权铺平道路。

超越科斯的设想

“让我们假设⁶¹，”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1960年写道，“有一个农夫和一个牧民在相邻的地界上经营。”他接着假设，牧民的牲畜游逛到农夫的地里糟蹋了粮食作物。从这个假设出发，科斯检讨了外部作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要创立污染及不被污染的权利。今天，全世界到处都在使用着污染的权利。实际上，科斯引入了一个以前不曾存在的资产权利类别，而且，他的想象跳跃正在使得污染逐渐地减少。

“让我们来假设”，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开始思考的奇妙方式，包括经济学家。它帮助我们调整旧有的设想，而看到可能发生的情形，它使我们设想那些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时候，因为有了我们的想象，真的**就会**发生。

科斯认为，一个个体的污染者，或是其相邻的被污染者；各自都拥有污染或不被污染的权利。他还提出，两个邻居之间的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他作出这些假设的时间是在半个世纪以前，那时，**污染的综合累积**尚未演变为当今全球性的威胁。基于今天已经变化了的现实，也许值得对科斯的假设作一

些更新，以使其更加适用于这个加剧中的问题。在我看来，以下就是一些适当的新的假设：

- 不仅有单一的，而是有很多污染者；不仅有单一的，而是有很多被污染者，有成千上万——包括许多尚未出生的后代。
- 被污染者（包括未来的后代）集体由信托机构所代表。
- 由政府将初始的污染权利签发给这些信托机构。
- 在决定出售污染许可证的数量时，信托的职责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为未来后代保护生态体系。所以，信托要确定一个安全的污染水平，并逐渐减少所出售的许可，直至抵达安全水平。
- 出售污染许可证的收入的 50% 作为根据股权的分红（如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另 50% 用于公共物品，如教育和生态系统修复。

如果我们作出以上假设，随后将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我们有了第二套账本的经济模型，尽管不是全部，但许多的外部作用都会在这套新账本中显示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想象另一个世界，在其中，自然与人类的未来后代都会有以真实交易形式的存在形式。企业的原先外部化的成本——弊病的价格——需被内部消化，于是会造成产品价格提高，但同时，所有人都会得到一些资产收入。

世界看起来就会是这样的：

- 由于信托者本着对未来后代的责任，而不是为了在世的股东或选民，而确定了公共权益的使用水平，使得关键的生态系统成分的损毁程度逐渐降低至可持续的水平。当他们不能有效地保护受益

者的利益时，他们就会遭到诉讼。

- 由于分红，收入从那些关键生态体系的过度耗费者那里，转入到低消耗人群的手中，在产生激励与保护的同时，也使资本得到增值。
- 由于燃油和农业化学的价格都被相应地提高，清洁能源和有机种植就具有了竞争力。
- 由于更高的燃料价格和废物处理成本，对清洁能源和废物处理系统的需求增加，使得新科技的投资大大增加，并带来新的国内工作机会。
- 公共物品由于许可证的销售收入而得到加强。

这里都发生了什么呢？从有关世界**现实**的一系列现实的假设——复数的污染者和被污染者、污染的零成本、可怕的累积污染水平——我们已经得出了一系列合理的期望——如果具有了某些特定的财产权，这个世界就将**可能呈现**的状态。这些财产权超越了科斯的假设，但与市场原则完全兼容。这个思考实验的结果表明，引入公共财产权，可以极大地、长久地改变经济结果，而并不需要政府的更多干预。

公共权益租金

不应将公共权益想象为或认为是一个与钱无关的领域。实际上，对于经济学家（还有我们所有人）而言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要理解公共权益的租金。

我所指的可不是你付给房东的月租支票。经济学对于租金有一个更精确的定义：即为**短缺所付的钱**。如果你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困惑。但

想象一下，一个城市，有一百万套公寓，在绝对意义上，公寓并无短缺，但该城市由于地域的关系而造成对于公寓需求的紧张。在这个经济学的意义上，公寓**就是短缺的**。再来回想一下你付给房东的支票，或是你付给银行的分期付款，其中部分代表着房东的运营成本，或是银行的货币成本，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纯粹的租金——也就是说，为短缺所付的钱。这就是为什么《纽约客》(New Yorkers)和《旧金山人报》(San Franciscans)要向地主和银行开出那么大量的支票，而内布拉斯加州的人就不用付这么多。

当对于有限供给的需求增加时，租金就会上涨。因此而产生的租金上涨无所谓好坏，只是**现实**而已。我们可以（并应该）就租金的**分配**而争论，但租金本身的上涨是自动发生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宏观经济有效地处置短缺资源。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处置方法，我们可以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短缺物品，或用抽签、按照政治权势、资历、种族等等的方式。然而经验显示，在开放的市场上销售短缺物品通常是最好的方法，而这种销售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租金。

早期的经济学家对于租金有着巨大的兴趣——亚当·斯密(Adam Smith)，戴维·里卡多(David Ricardo)，还有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以及其他众多的经济学家——因为它构成了土地拥有者的大部分收入，而土地是当时生产的主要成本。这些经济学家指出，土地的供应是有限的，但对土地的需求却持续增长，所以土地的租金也随之增长。于是，土地拥有者从米尔称之为**自然增值(uneared increment)**中受益——土地价值的提升并非出于拥有者的任何努力，而纯粹是由于社会所产生的对于有限供给的好地段的需求的增长。

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对此作过更多阐述。看到镀金时代(Gilded Age)中的富人、穷人与各种悲剧，他提出了一个富有逻辑性的问题：为什么即使在经济增长时期还总会存在贫困？他相信

答案在于由土地所有者所收取的租金份额。即使当经济增长时，资产权利体系与短缺的土地资源，将几乎所有收益都归于拥有土地的少数阶层。而市场竞争则限制了劳动人民的收入，根本不能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相提并论。正如米尔曾指出的：他们的土地价格持续攀升。为了想纠正这个问题，乔治所提出的方案是对土地课以重税，而免除其他税种。他在19世纪80年代出版的畅销书《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给他带来声誉，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从未对他正眼看待⁶²。

进入20世纪，经济学家们对租金失去了兴趣，与资本和劳工相比，它似乎只是财富生产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但到了21世纪，生态危机又将租金带回舞台的中心。现在不仅是土地短缺，还有清洁的水源、物种存留、生物多样化、废弃物处理能力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统统都已变为短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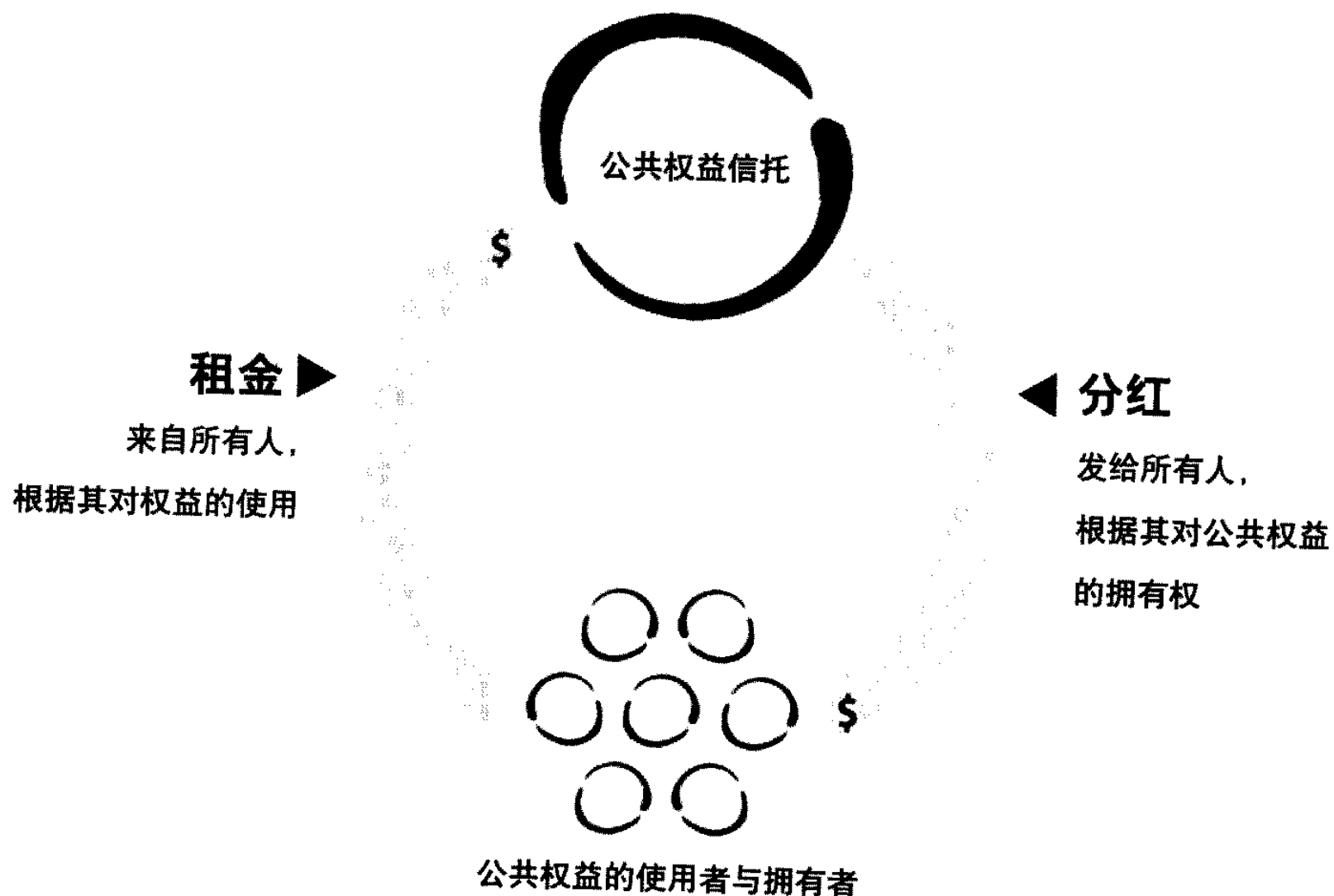
这又将我们带回到公共产权的题目。产权的定义与处置，是为了决定谁要为了什么来付给谁钱的主要因素。若具体到污染的问题，在过去，污染者免费得到污染权，被污染的生态体系的租金也都被他们得到了。这是因为当限制污染时，造成污染的产品价格就将会增长（记得，如果需求持续存在，对于供给的削减就会造成价格上升），而这些价格提高所带来的收入都将流向生产厂商（也就是那些污染者）。相反，如果将污染权交给代表着被污染者和未来后代利益的信托机构来处置，而且，如果由这些信托机构来向污染者**出售**污染许可证，那就将会是由信托而非污染者来收取公共权益的租金。如果信托机构将收取的租金分别用于分红和公共物品，那么所有人都能受益了。

眼下，污染权利的配置，使得污染企业得到了绝大部分的公共权益租金。但同时，由信托机构收取租金的前景十分引人注目，如果得以实现，消费者所付出的公共权益租金就不会是付给企业或政府，而是付给他们自己——作为公共信托

的受益人。每个公民将享有相同的红利，但实际分配所得会根据各人所购买的致污产品而异，污染越多，就要付出越多的租金。高污染者所得回的收益将会少于其所付出的，而低污染者就会得到更多回报。换言之，微观经济激励将是完美的措施。（见图 6.1）

同样重大而并非同样明显的还有，宏观经济激励也会是完美的手段。就是说，降低污染的整体水平，将与每个人的利益相关。回忆一下短缺物品租金的工作方式：供给越少，租金更高。现在再来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生态体系的受信托人，暂且不提（留待争论）你所承担的为未来后代保护财产的责任，你想要增加分红，那么你会去增加还是减少所销售的污染许可证呢？正确的然而可能是违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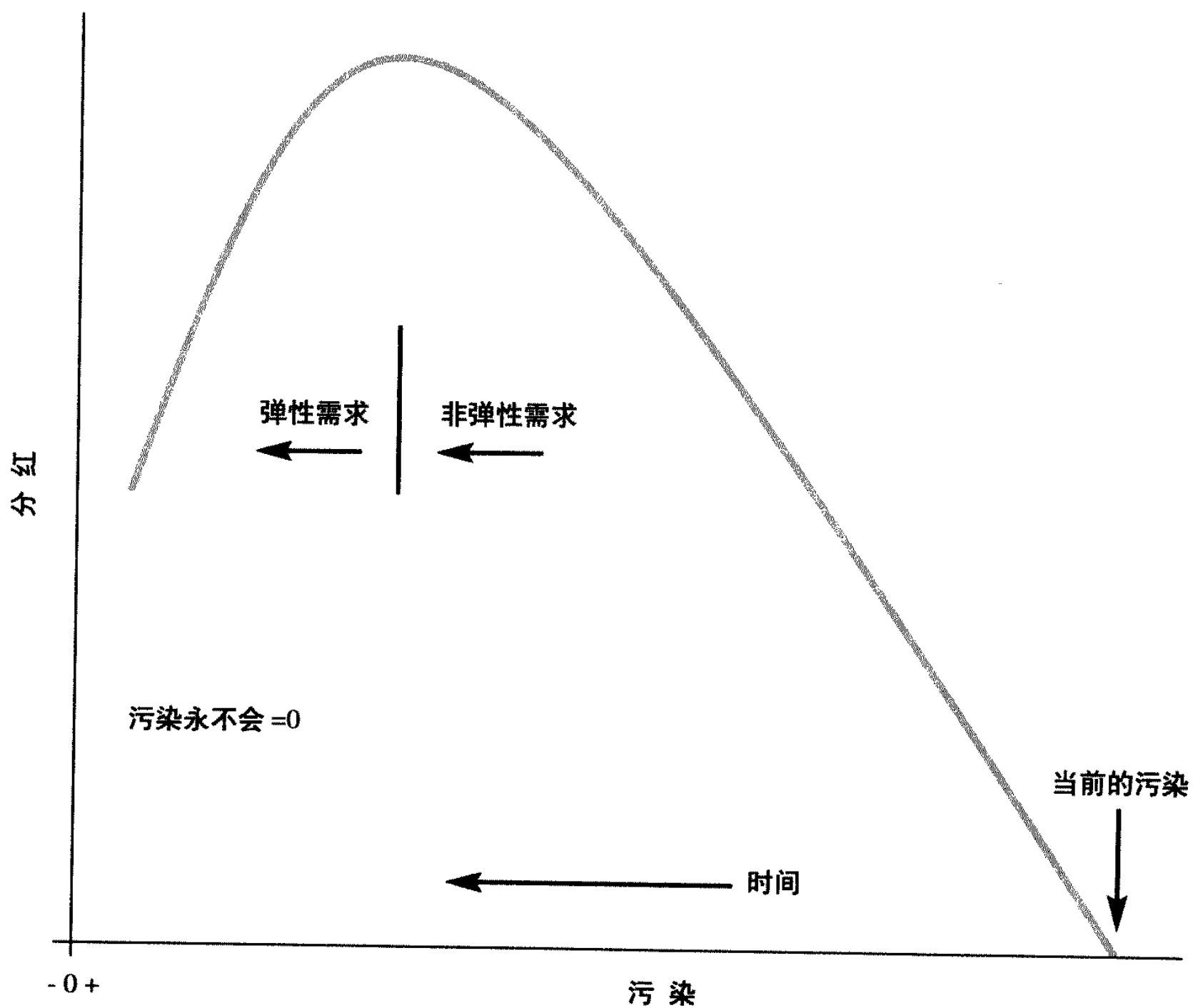
图 6.1 公共权益租金经由信托的循环



直觉的答案是：减少许可证的数量。你降低了污染，还奇妙地提升了租金，而且，每个人的分红也都增加了。（见图 6.2）

这个宏观经济现象——减少污染而为公民产出更多收入——正是公共信托最关键的致胜拳。它使得未来后代的利益与当代公民的利益达到了一致，而不是两相对立。这样一来，它使我们转向了可持续的方向，政治压力将会**加速**污染的降低，而不是相反。

图 6.2 减少污染 = 更多分红



关于公共租金经由信托的循环还有一种论点。因为租金的再度循环是从公共权益的过度耗费者流向了低耗费者，于是，收入也就从富人转向了穷人，原因是富人比穷人对公共权益的使用率要多得多⁶³。他们开SUV车，驾驶喷气式飞机，需要为巨大的豪宅保持恒定的冷热温度——于是他们向生态系统排放着更多的废气垃圾。国会和独立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也显示，只有像以上所描述的类似租金再循环的体系才能够保护穷人。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穷人就得付出更多的公共权益租金，而一无所得。也就是说，他们会变得更穷。

如常，为避免误会，需提出几个提醒。第一，因部分的公共权益租金将会用于公共物品而不是用于直接分红，收入再循环的效果就会有所减弱。然而公共物品对于所有人的益处，实际上也从正面冲消了这种减弱。第二，减少污染等于更多红利，这个公式并非无限地有效。当减少污染的科技被广泛采用之后，在某一点上，对吸收污染的需求就变得更有弹性，到那时，减少出售污染许可证就可能降低了公民的收入。但是，这将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当它真的到来时，世界将已会成为一个更健康的地方。即使在那时，信托若想要增加污染许可的数量，也仍是对其所承担的对未来后代的责任的违背。

对贫困的影响

我要作一个大胆的断言：**以股权分红形式分享公共权益租金，不仅是使我们的经济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的最佳手段，也是减少贫困的最佳途径。**因为，再也没有另一个相等规模的钱库，能使穷人从中合法地获取收入。

关于阶梯最底层的既无资本也无财产的人们终将可以摆脱贫困的自由市场理论，已不再成立。我们的经济操作系统从未对穷人投以青睐，全球化也并没有能使之有任何缓解。用税收救济穷人脱贫也不是多好的主意。可以论证，这类政策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约翰逊时代就达到了顶点，却从来没有收到效用。

公共租金分享之可以成立，因为其驱动力不只是——甚至不是主要的——出于对于穷人的同情。它的驱动力主要是来自对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的保护需要。当触及这个问题时，由谁得到公共租金的问题就必然会被提出，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不能不兼顾后者。我们需要决定，是否再一次从穷人那里索取公共权益，或是让他们也能分享我们所共同继承的财产。

当然，穷人所得到的公共权益租金，与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公共权益租金理应属于所有人。但是，如果将公共权益租金得到充足地付给，那么穷人就会得到比其他人更大得多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并且，不同于其他的扶贫形式，公共权益租金不能被说成是福利。在技术上，它其实是非挣得的收入，是资产收入，并且须是通行的资产**权利**。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取胜的政治战略，也是一个同样出色的经济政策。

责任与民主

我最常被问到的一个关于公共权益信托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确保信托机构不会像政客们那样屈从于企业的影响？**我的回答是：尽管没有保证，但比起竞选的官员来，信托摆脱企业掌握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关键的原因在于责任。在企业的世界里，责任非常清楚：董事们必须忠实于股东。而政府中的责任就不那么清晰。竞选的官员们必须忠实于宪法，大概也就是这些了。在员工和雇主、污染者和被污染者、选民和捐助者或是后代与当代人之间的种种矛盾对立的情形下，政治家们会站在哪一边呢？甚至连个要求或指南之类的东西都没有。竞选官员，作为国家的政治演员，可以随其意愿而为。

其实政治家们的行为并不意外，建国者们就是这样设计的。民主政府的工作

不是要坚持站在某一方面的立场，而是要和平地解决争端，并且不要对少数民族造成伤害。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早已表述清楚。如果出于多数的意愿，选民就可以在常规选举中“罢免”已胜选在任的官员⁶⁴，但他们不能指望在选期之间的任何特定的竞选人选的忠诚。正是这种预制忠诚的阙如，为企业的影响打开了门户，这是建国者们所没有能也不可能预见到的。

应当指出的是，法官的裁断并不像立法者和政府高官们那么松弛，他们的职责不仅是要遵守宪法的骨架，还要凭借成千上万页的法律文本和解释来保持法律的全部肌体和血液。他们有时也可能会作出新的解释，但除非他们是最高法院中的多数，任何新的解释都须通过审核。

信托与法官的地位相似，他们都在船里，而不是在政客们肆意畅游的开放水域之中。他们的双手被法律和对其受益者的信托责任所双重束缚。并非他们就没有摇摆的余地：同样是忠诚的信托，对于何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也会持有不同的意见。然而，法院可以对他们进行审查，他们不能对其受益人的利益作出太无耻的背叛。

我们要求受信托者所忠于一的受益人方面倒是有一些微妙：人类后代、非人类生物以及生态系统都没有话语权或权势，因此我们必须在创立公共权益信托时要格外地谨慎。例如，我们须要求对信托与经理人建立严格的利益冲突规则，我们须要求一切有关信托的相关信息——包括财务审计报告——都要在互联网上免费公布，我们须确保，如果公共权益信托失败，其财产将转移到一个类似的信托机构而不是被私有化。我们要设立内部监察与巡视官，我们还须向外部的倡导者授权，如非营利组织，由他们来代表那些无生命的、不能对信托提出诉讼的受益者的本质需要。大多数州都将这个功能指派给被他们的总检察官，但是考虑到总检

察官所承受的政治压力，这种指派是不足取的。

关于选择信托的形式，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受信托者可以被选举，或是为外部人所指派，或是如许多非营利机构理事会那样的自我持续。这就是它应有的样子，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本来就不是一种单一模式所能容纳的。重要的是，一旦选择了，应保证受信托者有足够长的时间，并且——像法官那样——有很长的任期。确实，受信托者在其他方面也应像法官那样：专业、毫无瑕疵的诚实、报酬优惠，并且富有荣誉感。作为一个公共利益的受信托者，应该是备受尊敬而且富有吸引力的。

也许会有一种争论：若要使信托摆脱直接的政治影响，我们就会使它们——泛指公共权益信托——脱离民主的体制。然而，这种情形也与我们的法庭相似。事实上，经济和法律上都有一些决策必须要摆脱政治和市场的影響。再说了，政府或企业都不能代表未来后代、生态系统以及人类以外的物种，而公共权益信托能够做到。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应该被**扩展**而不是囿于民主的疆界。

第七章

共同的生存权利

我们信奉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

人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存、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

—— (U.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776)

资本主义与人类社会并非天生的盟友。资本主义所强调的个人获取和消费通常是与人的社区需要相对立的。资本主义追求的是个体利益，而社区则需要联系——有时是协助——其他人，它不是被财富获益所驱动，而是由关爱、给与和分享驱动。

追求个人利益的机会对于幸福而言确实是很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社区关系。没有任何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可以与其他人类没有任何联系而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这就引起了如何促进社区的问题。有一种观点是，社区是不能被促进的，或是本来就有，或是从来没有。而另一种看法是，社区关系可以通过公立学校、农夫市场、慈善捐赠，以及类似的事物和行为而得到加强。很少有人设想过，社区是可以建立在我们的经济操作系统之中的。在这一章里，我就以这为何是可能

实现的来加以说明——**如果**我们的操作系统能包括一个健康的公共权益部门。

游戏规则

永久的经典棋类游戏**垄断** (*Monopoly*) 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的恰当模拟，游戏开始时，玩家们围绕着一公共权益而移动，尽量多地要将其私有化，实现私有化最多的，就获胜。

但是**垄断**中有两个特点是当今美国资本主义中所不具备的：所有玩家在开始时所拥有的资本都相等；每盘终了时，每个玩家都得到 200 美元。若没有这些设定，游戏就会缺少公平性和刺激性，也就没几个人愿意去玩了。

试想：在可容纳 20 个玩家的**垄断**游戏的版本中，其中的一个玩家从一开始就占有了一半资产，他几乎每次必赢，于是几乎所有其他玩家都会立即收手不玩了。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今天美国资本主义的情形：人口的 5% 所占有的资产超过了其余 95% 人口的资产总和。

你若是愿意，可以继续去琢磨与**垄断**的游戏规则十分接近的一系列资本主义的规则，在这个版本中，虽然玩家们并没有都得到相等的起始资本，但都能得到足以在若干体面的事业中进行选择的资本，并且，所有的玩家每年都能得到分红，还有简单而可以承受得起的健康保险。与当前的版本相比较，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版本，将为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幸福，却不会给游戏带来任何损害。真的，通过减少起始条件的悬殊，减轻雇员们健康保险的负担，就能使我们的经济体系**更加**有竞争力和有效率。

如果你对以上的假设持有怀疑，就请再联想一下在职业棒球、足球和篮球这些职业体育比赛中的经济操作系统。各个联赛都会将钱从最富有的队转移至最穷的队，并让输家拥有首先挑选新队员的权利。甚至连保守的专栏作家乔治·威尔

都认同其中的逻辑：“目的并不是要保证每个队都能有平等的收入，而是使得每个队都有足够的收入，从而只要它们能够聪明地使用这些收入，就都可能有阶段性的取胜机会⁶⁵。”威尔解释说，若缺少这样的收入分享，30个主要城市中的20支队伍就都没有赢的机会，球迷们就会离开，那些富有的队伍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换言之，过度的不平等会对人人有害。

生存权利的理想

约翰·洛克对于版权自称为神圣权利所作出的反应，其实是关于所有人的**生存、自由与资产权利**的天赋权利的理想。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起草美国独立宣言时，将洛克的三位一体修改为生存、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杰弗逊与其伙伴们认为，这些都是来自造物主的赐予，是不可剥夺的。用另一种稍加变化的方式来表达：它们都是**共同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宪法及其后续的修订案在这些优美的骨架之上增添了血肉，将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具体为言论自由、正当法律程序、人身保护权、从速公开审判以及家庭与财产安全等等。在第九号修正案中精明地确认：“本宪法对于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有损于人民所拥有的其他权利。”其后的修正和添加，也都是本着同样的精神。

如果我们对美国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扩展过程加以分析，我们会看到几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针对国家的一系列权利，第二个浪潮包括了对于基于人种、国籍、性别、或性取向歧视的反对，第三个浪潮——就历史而言，才刚刚兴起——不是**针对或反对**什么，而是**争取**——包括免费的公共教育、集体争取更高工资以及老年安全保证等等。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争取幸福的必要权力。

在最后这一波浪潮中，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共通性加强了人类的社区关系。如

果某些美国人可以享受免费公共教育而另一些不能,其不公平的后果就可能会造成分裂,而不是使我们团结为一个共同的国家。这些人类通行的生存权利将所有人置于同一条船上,使所有的人种、性别、经济阶层和不同年代的人,都共同地分担风险、责任、机会以及报酬。它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相互隔绝的孤立个体的集群。

通用性,也是公共权益部门与企业部门的区别之所在。我们已经看到企业部门的起始条件是:5%的人所拥有的超过了其他所有人的。对照之下,公共利益部门的起始条件是一人一股,人人相同。

关于第三波的普遍通用的生存权利的典型争论是:它在理论上也许挺好,但在实践中就太昂贵了。它们给“经济”——即指在无羁的市场经济中的优胜者——添加了不可承受的负担,因此,若任由所有人——包括贫穷的儿童和病人——去各自谋生,倒可能更好得多。实际情况则常常相反: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通用的生存权利,会比个体争取要更便宜并更加有效得多。更重要的是,那肯定会是更加公平的。

我们究竟能够沿着扩展共同生存权利的路径走多远呢?人们有着各自的猜想。但从经济意义上讲,我们已经可以承受继续前行。不用费太大力气,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经济操作系统中添加上三项生存权利:第一,每个人都得到按期分红;第二,每个儿童都得到一个启动权益;第三,降低并分担医疗费用。我们是否能够添加这些生存权利,与经济能力无关,而是与态度和政治相关。

为什么说态度问题呢?美国人一直被一些疑惑所困扰。尽管企业一直在从公共财富中免费索取,我们还是会认为给一些人“免费的东西”是“错”的。我们相信,穷人之贫穷与富人之富有其必然的原因。但不要忘记,成千上万美国人都在做着两三份工,却还不能挣够基本生活所需。而且,尽管我们当今的收入分

布远非“自然”，而是任由谬误的方式分配着资产，我们还会将收入的“自然”分配混同为“社会主义”或“大政府”，或是什么其他罪恶的现身。

已逝的约翰·罗尔（John Rawls），一位卓越的美国哲学家，对资产的**预流通**与收入的**再流通**⁶⁶作了区分。收入的**再流通**，即把钱从“赢家”那里转移到“输家”。可以理解，力图控制政府和媒体的赢家们当然对此不感冒。相对照之下，资产的**预流通**，是在其产生任何收入**之前**，游戏场上的水平就已经被资产权的分布所决定了。在此之后，无须再对收入进行再流通，资产自身早已对收入进行了分配。根据罗尔所说的，收入的**再流通**所依据的条件，就来自于资产的**预流通**。

但我们如何能够扩展资产权的分布，而并不是剥夺某些人的资产而给予另一些人呢？答案存在于公共权益之中——那些原本就属于所有人的财富。通过将此类财富的部分资产化（而非私有化），我们能够使得所有人都成为资产的拥有者。

有趣的是，出于纯粹自然生态的原因，我们现在就**需要**将有些自然财富资产化（而非私有化），这个21世纪的必需，意味着我们将得到一个拯救地球的机会，同时还将得到的奖励是，添加共同的生存权利。

公共资产所产生的红利

能有可靠收入的缓冲是件美好的事情，可以将其存储起来用作坏天气的储备，也可用于在好天气里追求快乐。它能鼓励人们去承担风险、关爱亲朋，或是为社区义务服务。对低收入家庭来说，它可以负担其基本的生活所需。

相反，没有可靠的收入实在是很可怕的，它加剧了焦虑和恐惧，使得我们应付危机和转变的能力减弱，它使得很多家庭在贫困的刀锋上挣扎，使得穷人们更难以摆脱贫困。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垄断**游戏那样，付给每个人一些规律的收入呢？不

是通过收入的再流通，而是通过公共资产的预流通。有一个州——阿拉斯加已经这样做了。如前面讲到过，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用本州石油开采权的租赁收入，投资到股票、证券以及类似的资产，并以这些投资收益每年为每个居民发放红利。阿拉斯加的模式可以扩展到任何州或国家，不论它们是否有石油。比如，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美国**永久基金，为所有**50**个州的所有长期居民平等地发放红利，理由是我们集体拥有着众多宝贵的资产。

回想一下我们关于公共资产信托的讨论。这些信托机构可以通过销售越来越短缺的污染许可证⁶⁷来减少污染并挣到钱，许可证越是短缺，其价格就会越高，减少污染就将等于更多的收入。假以时日，就会有成千上万亿美元流入这个美国永久基金。

我们能够用这个公共权益的收入来做些什么呢？在阿拉斯加，石油开采的收入**75%**归政府，**25%**给了市民。对于一个美国永久基金来说，我更倾向于**50/50**的分配，因为给公民派发红利是太重要了。而且，当生态体系从免费变为付费，生活费用也会随之升高，所以人们需要得到补偿，这与阿拉斯加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形都不相同。我还希望政府对特定的公共物品投入资金，而不是将其统统丢到国库预算（**general treasury**）之中，这不仅能确保清晰可见的公众受益，还可以催生出捍卫收入分享系统的竞选人。

废弃物吸收并非是美国永久基金所要关切的唯一的公共权益资源，还需要考虑到社会对于股市价值的重大贡献。如前面谈到，私有企业可以通过规范的股票交易而使其价值实现戏剧性的膨胀。从扩大的投资者市场所产生的更多价值，使得投资者们可以收购企业的股票。股票市场的总价值大约是**15**万亿美元（**\$15 trillion**），其中社会所产生的流动性溢价大约是**5**万亿美元。

如今，这**5**万亿美元的奖金中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拥有占总财富一半以上的那

5%的人口。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将其另作处置。我们可以对企业使用公众贸易体系而向他们征收费用，就像投资银行家们所做的一样。（对有些可能未曾参与过公开招股过程的人们来说，投资银行家们就像是一个免费宫殿的奇装异服的守门人，使用资本市场的公共费用几乎是零，而投资银行家却要收取昂贵的费用。）

这项公共收费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股权。我们权且说，要那些公开上市的公司每年将其股权的1%存入美国永久基金，连续10年——达到其股权的10%。我们的这项收费不仅是为了规范的股票交易服务的使用权，还为了所有其他特权（有限责任、永久年限、版权和专利，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目前一直免费奉送给私有企业的礼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永久基金将会拥有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多元化资产，如其同类的阿拉斯加基金一样，每年它都会为所有人派发红利。股市会有升降，每个人的红利支票也是如此，水涨则船高，美国将成为一个真正的“所有权的社會”。

儿童机会信托

不久以前，我为写此书而对一些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时，注意到1787年颁布的《邦联议会西北地域法令》（the Northwest Ordinance of 1787），其中写道：“无论其业主是否在该物业居住，当其业主亡故时，该物业的继承将在其子女中及其已亡故子女子女之间平均分配⁶⁸。”我很纳闷，这说的都是些什么呀？

很快，我理解了，这说的就是**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或更确切地说，是在美国终结长子继承制。杰弗逊，麦迪逊，还有其他那些早期的建国者们都相信，封建制的那种将全部或大部分资产由父及长子所有的传承，不得在新大

陆存在。这与后来才兴起的妇女平等权利无关，它是为了平衡的经济运行以及避免贵族制的永续。

一个人都拥有资产的国家——在当时，意味着土地——是杰弗逊与其他先行者伙伴的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努力工作和道德将得到奖励，而特权继承会受到约束。这个美国版本并非极端的浪漫主义，以当时有待开发的广袤西部来看，是相当可行的。后来对它形成阻碍的，是向投机者和铁路开发的土地奉送、垄断的兴起以及攫财大亨们（the robber barons）的从不赋税的巨大财富。

将时钟快进至 21 世纪，土地已不再是谋求最大财富的基本条件，取而代之的是股权。但杰弗逊关于一个拥有权的社会理想依然是可以实现的。实现的手段，并非像乔治·W. 布什的错误论点那样存在于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私有化之中，而是要保证每个儿童都得到一份赠予。在我们这样一个超级富足的国家，绝无理由不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大不列颠已经这样做了。所有 2002 年以后出生的不列颠儿童都会从政府得到 440 英镑的种子信托基金——40% 最贫困家庭的儿童将得到 880 英镑，信托基金的全部所得统统免税⁶⁹。）

请允许我稍微谈谈个人的感受。我的父母并不富有，他们都是身无分文的移民的后代。他们勤奋工作，努力积攒，并进行投资——为我付了哈佛的全额学费。后来，他们帮我买了房子，帮我创业。如果没有他们的财务援助，我就不可能实现现有的成就。而我也已为我的两个儿子建立了信托基金，像我一样，他们也会有接受大学教育的经费，可以买他们自己的房子，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创建自己的事业——也就是说，拥有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由于我对儿子们的期望，我极为感谢自己良好的经济状况。同时，我痛苦地意识到，我的良好的家庭财政状况远远不是普遍的情况。许许多多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七代的美国人只有很少或是根本没有任何储蓄能够留给他们的后

代，他们的孩子可能会得到父母的爱和监护，但却得不到当今一流教育所需要的经费、房子的首付款或是创业资金。也许有少数能够因其非凡的才能和运气而崛起，但大多数都将终其一生做着乏味的工作，支付账单，或许还能为老年有少许的积攒。他们的子女，也将要面对相似的前景。

并不一定只有这一条出路。尽可以去设想各种各样可以帮助人们改善生活的政府项目——免费大学和研究生教育，退伍军人法，房屋补贴，等等——但我们都知，这类项目都是来去不定的。我当然希望这类项目能够更多而不是更少。但是最简单的帮助人们进步的方式，就是我的父母曾给予我以及我给予我的儿子们的方式：现金。而最保险的方式就是，以十分相似于社会保险的方式，将这种赠予嵌入我们的经济操作系统。

当杰弗逊将洛克的**财产权**替换为**追求幸福**的权利时，他并非在否认财产权的重要性，我不是在装作曾经研读过他的心灵，但我猜测他之所以替换了洛克的词汇，是要说明，资产不应终结于资产自身，而仅仅是追求更高幸福的一个工具。事实上，通过宪法和其早期的修正案，可以充分看到他与其他建国者对于财产权的重视。他们无疑认为，幸福应该是终极的目标，而资产对于追求这个目标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在18世纪是如此，在21世纪更是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没有一笔启动资本，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是废话一句。社会保险为生命的尽头提供了缓冲，对于生命的起始却没有任何用处。我们须在此处有所新的建树。

对处于生命起始的孩子们的财务资助与社会保险不同，因为儿童不能为其所承继的东西预先有所贡献。但是，各个年代的人类之间的关联原则（**same principle of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在此同样适用。设想一个后代基金，通过它，那些已逝的灵魂将钱财不仅留给了自己的子女，而且留给了**所有的**孩子们，这个

形式将取代现行的遗产税，反正现行的遗产税也正在广受抨击。（写到此处时，国会已临时通过要取消遗产税至2010年，离永久性的取消还只有一步之遥。）告诉你，我认为取消遗产税是一个很糟糕的主意，遗产税是坏处最少（在对于经济行为的消极作用的意义上）且最进步的税种。具有可悲讽刺意义的是，一个首先取消了长子继承制的国家，现在却走进了建立财富的永久贵族制的路径。若遗产税真的被取消了，在人类各代之间的基金转移就将是一个适当的替代方案。

基本的设想与职业体育的收入再循环系统相似，赢家——即那些百万、千万富翁——将把钱付给孩子们（且称其为儿童机会信托），在所有儿童之间平均分配，于是，下一轮的经济游戏就将更加富有竞争性。在此安排之下，赢家们可以终生享受其财富，而不只是一季而已。当他们过世后，其财产的一半，可能由其子女继承，而另一半可被分配给所有其他儿童。他们自己的子女仍将优先占有第三垒的优势，但至少其他孩子也能有参加比赛的机会。

按照这个规划，钱不会流向政府，每一分钱都会通过银行户口或新生儿童的代理户口（由父母管理）回到市场。我将这些新的户口称为个人继承户口（Individual Inheritance Accounts），与个人退休户口（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相对应，是为生命前期所设立的户口。当儿童们成长到18岁，他们可以从他们的户口中提取现金来支付教育的费用、购买第一栋房子或是创业。

是的，对儿童机会信托的贡献将是必须的，至少对拥有一定财富规模（比方说，100万美元或200万美元）的人而言。但是这种在生命终结时对社会的回馈，其实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实际上，那么多百万富翁的资产都是来自于社会的馈赠。对于这一点，任何人的表达都比不上老比尔·盖茨，世界首富的父亲：“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市场因有了法律基础结构而有效运作，人们可以拥有并保护自己的资产。在我们的国家里，拥有了财富、技能与致富的运气，就意

意味着对于机会的源泉的负债⁷⁰。”

我很喜欢在生命末期的再循环与生命初始的继承这两者之间的纽带，它将一个将逝的年代与另一个新生的年代如此美妙地连接起来。它还将那些从社会得到很多的人们与那些得到很少的人们之间联系起来，既公正，又对称。

作为总结，我认为，那些贡献者——所有那些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向社会作出回报时将钱直接付给儿童们，远不会像付给美国国税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那么郁闷。他们或许可以将儿童机会信托想象为一种为美国儿童的创投基金，创投基金都会假设十个投资有九个是得不到回报的，但第十个的回报就足够补偿所有赔钱的案子了。儿童机会信托基金也是如此，如果十个儿童之间有一个，能够在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足以“偿还”初始投资的财富，那么信托就赢得了存在的意义。谁知道呢？也许有些人是真心乐意地想要作出回报呢。

健康风险分担

风险分担储备，或社会保险，较之个体化的风险有几个优越之处。第一是普遍性：每个人都有保险，以保证一种有尊严的生存。另一个是公平性：当风险是个体化时，有些人能过得挺好，但另一些人就不能。总会有赢家和输家，其间的区别会是巨大的。

在美国，社会保险已经实施于老年贫困、暂时失业以及残疾人群等风险领域。在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不但都有类似的实施，**并且**还适用于疾病和健康问题。美国的普适性健康保险⁷¹，只适用于65岁及以上的人群。将此扩展到所有美国人，将会成为公共权益部门的另一个支柱，并将使我们成为更加全国性的社区。

为了美国读者的阅读便利，值得对于普遍性的健康保险的运作方式稍加描

述。就以我们北方的邻居为参照点，1984年，加拿大国会不记名通过了《加拿大健康法案》(the Canada Health Act)，法案确认：所有加拿大公民都有在预付费的基础上享有必要的医院和医生服务的权利。现在，每个省都根据五项联邦准则而运行着本省的保障项目。五项联邦原则是：

- **普适性**。适用于所有居民。
- **完整性**。适用于所有必要的医疗服务。
- **非营利性**。各省计划均为非营利性。
- **易使用性**。费用是担负得起的，或被补贴的。
- **可移动性**。旅行时仍继续适用。

该法案还取消了医疗从业者的附加收费。结果使得系统变得非常简便。对例行的医生约见，加拿大人只需要带上他们的健康卡，无须填写任何表格或付任何费用。这个系统的资金来自联邦和省财政的共同资助。其中部分是来自于各省按月收取的医疗保险金。

我曾在2005年对加利福尼亚州（通过Aetna安泰公司，美国五大团体保险公司之一）与英属哥伦比亚省（通过省健康计划）的四口之家每月的医疗保险费作过比较，家长年龄为45岁的加州家庭的每月费率是1045美元，而加拿大家庭的费率是88美元，无论其家长的年龄多大，低收入家庭还会有折扣（见表7.1）。

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不同于英国，加拿大并没有国家卫生部(National Health Service)。医疗人员都是自己开业，或是为私人诊所和医院工作。客户可以自由地选择医生、医院以及其他医疗从业者。在公共权益中所添加的，只是风险分担的系统。

明摆着的就是，所有加拿大人都能以比我们大约低45%的代价，享有医疗保障以及心灵的平安。在为医疗支付的每1美元中，加拿大人要为行政管理支付不到10美分，而我们则要支付将近30美分（这还不算病人为文牍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更糟的是，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甚至都不能使我们保有健康。我们的新生儿死亡率要高于加拿大，平均寿命则更低，而且，我们的肥胖、癌症、糖尿病以及忧郁症等等的比率都更高。而最后一点是，我们之中还有4500万人根本就没有健康保险。

从这个比较之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较之私人保险，社会保险使得社会成员能够更便宜而且更有效地降低公共风险，因此，它是社会基础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当我们想要实现普及时，尤其如此。规模经济和降低市场与行政成本可以带来部分的节省，而其他结果则来自免除利润与简单化的程序。

表 7.1 美国与加拿大的医疗保健数字比较

	美国	加拿大
估计人均花费 ⁷² (2004; 美元)	\$6040	\$3326
用于行政消费的百分比 ⁷³ (1999)	26%	10%
四口之家每月需要的保险费	\$1045	\$88
男性平均寿命 ⁷⁴ (岁)	75	77
女性平均寿命 (岁)	81	84
新生儿死亡率 (每出生 1000 个婴儿)	6.4	4.7

关于普遍红利的辩论

辩方：给所有人派发红利会有损劳动伦理。

反方：如果红利数额很高，也许会存在这种可能。但红利若是在较低的水平就不太可能产生这样的影响。这样的红利将会是补充、而不是取代劳动收入。同时，它可以使得人们在选择无薪休假，或做一些没有报酬的家务或社区的工作时增加一些自由。实际上，对于劳动伦理的轻微影响倒是有些道理的，随着更多的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根本无法保证所有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如果有些人愿意选择少做些工作，倒可能是很不错的。

辩方：“白白”付给人们钱会给经济带来伤害。

反方：我们的经济已经为很多根本不做事，或是做的事根本一无用处的人白白地付钱，也为有些做着有用的事的人付了太多的钱，而这些都并没给经济带来伤害。只要人们将这些所得用来花费或是用来进行投资，就不会对经济造成伤害。事实上，“白白”地付钱给人们其实是可以有助于我们的经济的，只要我们能认识到，它对经济的价值实际是高于国内生产总值所显示的数字的。如果人们有一点非劳动收入的钱来作为缓冲，很多人就可能再去上学，创办小企业或是在孩子们身上花更多时间，追求艺术兴趣或参与社区生活，所有这些行为都将为我们国家增加福祉。

辩方：自然资源产品的更高价格将会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

反方：的确，包括汽油、电力在内的很多东西都会涨价，这会迫使很多人——尤其是穷人——减少对这些产品的消费。然而，很多人都可以通过红利而达到应对涨价的平衡，很多人可以继续前行。还可以有困难拨款，以帮助人们的生活必需。逐渐，对自然友善的新的科技将会取代当前的科技，假使生活水平不能够得到改善，也会得到保持。

第八章

文化共享

从我这里得到思想的人，
是他自己接受了指引，而于我无损，
即如他用我的蜡烛点燃了他的蜡烛而得到光明，
却不会使我陷于黑暗。

——托马斯·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1813)

至此，我一直集中在公共权益的自然与社区方面，在本章中，我将探讨公共权益大河的第三条支流——文化。我所指的是语言、艺术与科学之类的我们所继承的馈赠，其中也包括我们在有生之年所作出的贡献。

文化是一项联合事业——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创造。莫扎特的交响乐与列农和麦克卡尼的歌曲一样，都是天才的作品，但它们也都是天才所生活的时代文化的产物。乐器——记谱法以及先前的音乐形式，就是作曲家烘烤自己的蛋糕所使用的面团。思想也是如此。所有的思想家和作家，都是从无数前辈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和发现中找到自己创作的源泉。每一代人对于艾萨克·牛顿 (Isaac Newton) 的解释都会更远一点，那是因为每一代人都站在其先辈的肩膀之上。就这样，所有新的创造都是来自于公共财富，并使之得到丰富。要保持艺术和科学的繁荣，

我们必须关切文化的公共权益。

再有，文化公共财富与其他大多数自然的公共权益不同，它是不会枯竭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被反复地“使用”而没有丝毫减损。牛顿的理论，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以及万维网，也都是如此。其实，我们越多地使用这些财产，它们就能产生出更多的价值。还要感谢科技——从古登堡活字印刷（Gutenberg's press），到马科尼的无线电广播，再到覆盖全球的互联网——使得分享这些财富变得越来越容易。

为我们的享用付费

艺术家和科学家都需要吃饭。在过去有富人来赞助他们。今天的政府和大学也在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但这些资助是不足够的。那么从哪里可以得到更多的钱呢？答案不仅影响到艺术与科学的数量，也影响到其质量。

先来考虑文化。在古登堡之前，书籍都是由手工印刷的，多半是由和尚来印刷，那时的数量也不多（指的是书）。当印刷术得到普遍应用后，作者将其手稿交给印刷者，得到一次性的报酬，印刷者能卖多少就卖多少，多出来的收入都归印刷者。

1710年英国议院通过的《安娜女皇版权法》（Statute of Queen Anne），将著作权授予作者，而不是印刷者，作者享有14年的独享权并可再延续14年。在此之后，著作就将进入我们称之为的**公共领域**⁷⁵（public domain），任何人都可以重新印刷而不必再付给作者报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地鼓励作者写作，当他们得到适当的报酬之后，还能够使文学得以尽量广泛并且便宜的传播。

这种新式安排的首要倡导者之一是约翰·洛克。如其对于土地资源的态度，洛克所寻求的是，那些增加了价值的劳动者，与存续并共享价值的公共权益之间

的利益平衡。在一份提交议院的备忘录中，他指出将著作权交给内容印刷者是“不合理的，对知识有伤害的”，“对于任何人而言，将文学印刷出来，只是为使其更加便宜和更佳的方式”而已。至于“在世并从事写作的作者”，他建议“将他们的权利限制在第一次印刷之后的一定的年限之内……”。

本着这个精神，美国宪法授予国会权力，“通过保障作者和发明者的著作权与发明权在有限时限内的独享权利的形式，推进科学与有用的艺术的进步”。之后不久，在1790年，美国的第一个版权法赋予作者与英国同样的权利：14年的独享权利，加上再延续14年的选择，之后，其版权归属于公共领域⁷⁶。这种对于知识产权设立疆界的做法，并未对知识产权的权利本身起到相似的扩展作用。确实，我们今天所称之为**智慧产权**的东西，在当时被认为是由政府所认可的垄断特权，而并不是属于创造者的权利。

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安排非常行之有效，在大西洋两岸都没有出现创造力的匮乏。但是大概从30年以前开始，大型娱乐媒体公司开始从公共领域向私有化倾斜，以沃尔特·迪斯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为首，企业们向国会施压，要求延长版权条款，先是要求75年，接着又提出要95年（每当米老鼠临近进入公共领域的时候，就会被延长）。其后果之一就是公共领域被边缘化了，而企业从公共权益中攫取却不作任何回报；另一后果则是文化的经验被改变了，我们变成了文化的消费者，而不是参与者。

这并不是说商业艺术就都是坏的，好莱坞的很多产品都棒极了。问题是，以其巨大的广告和发行费用，它会压倒本地化的和生活化的艺术。在后者之中具有更多亲切、自然和实验性的内容，本地化艺术也有助于社区建设，不仅在于艺术家之间，也在于观众成员之间。我们的挑战在于：要使得这类艺术与商业艺术**共存**。

可以想象一下共存的文化景象：

在商业娱乐的同时，还存在着那些在公园举行的免费音乐会，在校园和图书馆举行的诗会，独立话剧和制片人，还有由本地艺术家在公共区域展出的壁画和雕塑。我们并不缺乏参与这些文化活动的艺术家，也不缺乏并非艺术家的欣赏。问题是，如何为此付费。

我们需要一个为了非商业性艺术的并行经济。幸运的是，这样的经济模型是存在的。例如，有一个旧金山艺术资助项目，资金来源于酒店住房的税收。自1961年起，这个项目已经向成百上千个非营利的文化组织资助了1.45亿美元。它成为免费音乐会、壁画展、电影节以及公园剧场等等这些城市脉动的主要支撑。

还有，建立于1948年的音乐演出信托基金(the Music Performance Trust

Fund)。为了解决与音乐家工会之间的纠纷，录制产业同意，将录音产品销售的一小部分版权收入投入一个基金会，用以支持在公园、校园及其他公共场地举行的音乐会演出。这个基金从当时到现在，一直被一个独立的信托机构管理着。在

取之于公共领域的迪斯尼故事

Aladdin 阿拉丁

Atlantis 阿特兰蒂斯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

Cinderella 灰姑娘

Davy Crockett 原野奇侠—大卫克罗传

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睡谷传说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 (大力神)

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巴黎圣母院 (钟楼怪人)

The Jungle Book 森林王子

Oliver Twist 远大前程

Pinocchio 匹诺曹

Robin Hood 罗宾汉

Snow White 白雪公主

Sleeping Beauty 睡美人

The Three Musketeers 三剑客

Treasure Island 金银岛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柳林风声 (杨柳风)

归属于公共领域的迪斯尼故事

无

2004年，它赞助了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举行的千万个免费音乐会。多谢这个系统，借助企业拥有的音乐产品销售收入，而支持了鲜活的民间音乐，而后者正是录制产业所依托的基础。

这些模式可以得到扩展。其收入来源，则可以参考迪斯尼公司的企业版权收入的形式。他们为其电影版权争得了95年的保护，他们在我们的DVD上放上那些联邦调查局的警告，还让警察在街上扫荡那些出售“盗版”DVD的店铺。这些保护都是要花大钱的，而这些企业的价签上为这些费用显示的可全都是零。（他们确实纳税，但是人人都在纳税呀。）

与其提供免费的版权保护，我们何不就对音乐、电影、和游戏等电子录制产品收取版税呢？还可以对播放者的独家许可以及广告厂商对我们大脑的侵犯（见下一节）另外收费。收取的上百亿美元可以通过一个国家艺术信托基金，流入到本地的艺术协会中去，而那些协会则将对社区艺术团体和艺术家们提供支持。

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之中，企业就须将他们现在从公共权益中的免费收益，回馈给公共权益。将会有更多的生活艺术与本地艺术涌现出来，将会有更多的艺术家被雇用。我们将**同时**拥有商业的和现实的艺术。

如何处置广告

心灵时间对于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当那些试图推销欲求的外人任意侵入我的脑海时，会令我很反感，我更反感他们侵入我孩子们的脑海。他们的主张是言论自由，而我的体验则是精神的入侵，成千上万人也都对此有着同样的切肤痛感。正如凯利·拉森（Kalle Lasn）所写到的：“我们的精神环境就像空气或水，同样是公共权益，我们需要保护它不受任何不被欢迎的入侵”。

广告——我指的是一切寻求注意力的商业形式——是过剩资本主义的一个黑

暗面。(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我个人的事业中,也曾经或多或少地制造过这类喧嚣。)在必要的或至少是可接受的、适度的情形下,这是现代化的一种边界行为,但当它失控时就会变得危险。麻烦在于广告已经在无情地升级。每个新产品都需要自我发布,周遭的噪音愈大,各个广告为了被听到就必须愈加吵闹。如果存在着“公共权益的悲剧”这类的东西,这就是了(然而,要再次提醒,公共权益是受害方,而不是根源)。

这里有几个统计,可以确认人所共知的事实。在美国,当儿童长到5岁时,平均已经看过10万个电视广告,而在其有生之年,他们还要再看上200万个。在2002年,推销人员发出了870亿份垃圾邮件,做了510亿个电话推销,还有840亿封垃圾电子邮件。在2004年,杨基洛维奇(Yankelovich)的民调显示,65%的美国人“感觉不间断地经受着广告和营销的狂轰滥炸⁷⁸”。

广告不只是某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偶尔冒犯,它是由相对较少的一些企业(绝大部分的广告都是来自一百来个企业)。对于我们所有其他人的持续侵犯。这些公司想要——其实是**必须要**——提高他们的销售,为此他们要占据我们的心灵。但心灵时间是一个短缺的资源,每天之中只有若干小时,一生之中只有若干天。由于如此短缺,被广告占据的每一神经分钟,就意味着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中减掉了一个神经分钟。所以,每个广告都有一个机会成本,对于我们所承受的成本,而广告商却没有付费。

广告还有其他的副作用:它们使我们偏信高价的品牌产品,偏好于垃圾食品而不是健康食品,习惯于消费而不是储蓄。它们暗示我们所拥有的永远都是不够的,或是永远都是看上去不够好的,从而降低了我们的自尊自信。最终,由于它们所造成的污染增加与资源耗竭,而销蚀了我们的公共财富。

作为个人,我们要想实施针对广告的自我保护,实在没有太多可为。我们可

以关掉电视，销毁垃圾电子邮件，把垃圾信件丢入可再生垃圾桶。但这些都不能减轻整体的噪音，也不能稍许降低广告的外部成本。要做到这些，我们需要有能够对整个经济范围有效的音量控制。

现在还不存在这样的控制能力。尽管电波波段是属于人民的，但没有一个公共机构对电视广告的时间加以限制⁷⁹。直到1982年，主要的广播网络都自觉遵守将黄金时间的每小时的广告限于9.5分钟之内的规矩。后来，利润最大化的规则占了上风，各个网络都放弃了它们的守则。今天，在典型的“一小时”黄金时间的播出时间中，大约有42分钟是内容播放，而另外18分钟都是在播出广告和推销，几近二十年前的广告密度的两倍。

如果我们按照管理污染的方式，或者说是以对于物理污染可能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广告，会怎样呢？如果企业要想污染我们的心灵，它们就得为此权利付钱。就像应对物理污染一样，交易可以经由一个信托机构进行。对于我们内在的公共权益的这种保护，将对整体的侵犯设定限制，并且要向企业出售可以交易的广告许可。我们的精神成本将会以广告商的金钱成本的形式显示出来，广告会减少，心灵会得到更多安宁，而且，如果我们能为此得到收入，就会有更多的钱用来资助那些没有广告的播放和艺术。

一个广告限制-交易的系统还可以产生其他的益处。当前，只有一个对经济活动加以规律的宏观阀门：联邦储备局的那一揽子货币。如果经济过热，联储局提高利率；如果过缓，就降低利率。这个阀门的问题在于它有个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当利率升高时，信用卡账单和房贷分期付款也都随之升高，成千上万家庭都会受到影响。但如果我们以降低广告噪音的方式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我们就可以没有痛苦地享益于更高的利率。事实上，家庭还可能通过减少购买而有所**储蓄**。

波段

波段，即是通常所认知的广播频率波长，是由现代科技将自然馈赠转变而来的宝贵资源。作为共享信息和思想的媒介，电波比纸张和有线网络都更拥有巨大的优势。早期的问题是信号常常互相干扰，如果两个邻近的交换机使用相同的或相连的波长，收听收音机的人就会同时听到两套声音。美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不同于英国或加拿大的方法），将独占频率免费给予私营广播公司，只是需要阶段性地进行听证和更新。

根据 1934 年的通讯法案，作为对这项赠予的补偿，广播公司要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便利以及必需”——无论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在理论上，波长自身将会持续作为公共财产，而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仍是在理论上）则扮演信托的角色。

在此安排之下，私营广播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长性和高赢利性。但随着时间迁移，随着它们的广告收入高扬窜升，它们对于公共权益职责的兴趣日渐衰微。在 20 世纪 80 年代，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解除了公平规则（Fairness Doctrine），而公平规则指令所要求的是，要广播公司在播出矛盾话题时须播出对立双方的观点，还要求播出教育性的节目。

20 世纪 90 年代，移动电话的普及对电波波段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一次国会没有将波长免费赠予手机公司，而是明智地选择了拍卖波长，并以此为联邦储备收入了成百上千亿美元。然而，广播公司则努力地为更多的免费波长进行游说，在 1996 年，国会又以数字电视的名义而再次将免费波长给予了它们。如我在前面讲到过的，这可是价值 700 亿美元的免费礼物！

现在，数字技术已能做到使“聪明的”接收者直接收到想要的信号。信号干

扰就会或是很快将会成为历史了，也就不再需要独占许可证了。电波将成为一种可以被虚拟地、无限制地开放存取的公共资源，这种可能性使得广播公司、电话公司和有线公司们陷入极度的焦虑。

有些广播公司则另有打算，它们想将波段私有化⁸⁰并取得波段的拥有权。在这个计划之下，它们就可以永久享用所得到的数字电视的免费许可证，并将其用作任何用途。它们还可以将许可证转卖给手机公司而大捞一票。大赢家将会是通用电气（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迪斯尼（美国广播公司，ABC）和罗伯特·默多克（福克斯，Fox）们。其他受益者还会包括帕特·罗伯逊（基督教广播网，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与洛厄尔·巴德·帕克森（帕克森电视，Pax TV）。曾有一位记者问帕克森，为什么他可以通过出售公共波段而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收入私囊。他答道：“我是个农民，现在有人想在我的农场里修建商场，我就走运了。上帝保佑美国。”

如果国会将波段视为公共资产，就应按照市场的价率将有限的时限租赁给那些出价最高的拍价者。而由此得来的上百亿美元的收入，就可用来为政治候选人购买免费时段、资助非商业性的广播和电视、乃至帮助艺术的延续。

国会还有另一个选择，将波段转变为像公路和街道那样的可以开放存取的公共物品。应用无线高保真技术 wi-fi (wireless fidelity)，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地享用高速互联网。至 2006 年初，在美国有将近 150 个城市已经或正在准备实施公共 wi-fi 网络，分配给 wi-fi 网络的频率的运行距离不够远，或是对建筑物的覆盖不如配给广播公司的频率那样好，使得这些实施的努力受到阻碍。一些参议员已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将尚未被使用的电视波段开放给 wi-fi，但该提案面临着来自广播公司、电话公司和有线广播公司的激烈反对。

互联网

互联网是一个由人类制造的公共权益，可以被无限地使用于任何用途。由于它为商业、社区和文化同时带来了突发的变革，而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科技。正如其他宝贵的公共权益，它也受到了私营企业的觊觎。未来年代的战争，将会在那些想要将互联网的主干私有化的企业与那些（包括许多企业）想要尽可能地保持互联网的免费、普及以及开放的同盟之间展开。很不同寻常的是，公共权益一方在战场中占有了先机，这可是很少见的战场形势。

这场隐约显现的战争与接入相关——具体而言，就是将互联网与成千上万（在世界范围内则是数十亿人）**可能**应用而尚未应用的人联系起来的那“最后一英里”。当互联网兴起之初，最后一英里通常是经过电话来连接。用户需要拨打到一个互联网服务器才能登陆。然而，电话线是为语音信号所设定的，它们不能高速地运载大量数据。

与此同时，有线公司开始为互联网用户提供更粗的电缆。电话公司也提出 DSL 系统的方案——可以使更多的压缩数据通过其提供的细小线路。于是就有了两种高速接入互联网的方法——**如果你**可以承受大约每月 30 美元，或是每年 360 美元的费用。这并非是人人都能承担得起的。于是，就出现了被有些人所称之的**数据鸿沟**——普遍介入的财务壁垒。

这就说到了电波波段。现在，通过公共的自有波长，应用数字化信号而实现最后一英里的接入，已成为可能。不仅如此，使用 wi-fi 之类的技术，还使得这种应用变得非常便宜。同时，另一个技术突破也正在逼近：互联网——包括最后一公里的无线接入——将变得足够“粗大”而足以运载数据、电话与电视图像。在理论上，不大的公共投资就足以将所有这些服务送达每个人的家门口。私营电

视网络、电话和有线网络公司就都不再被需要了。所谓信息高速公路，将会像公共街道一样，完全开放并免费。

这种可能性的意义非同小可。现在美国每年为电话和有线网络的服务所付出的3000亿美元的费用，也许有一半都可以被节省下来，这大约相当于给每个雇员每年增加1000美元的收入。实在值得庆祝。

还有呢，互联网的全球免费接入的普及也将惠及企业经济——又是一个公共权益的积极外部作用的例子。想象一下：一个城市的商业街或一个小镇上的主要街道，街上的商家都依靠着行人流量，越多行人，就可以做成更多的买卖。如果有人在这些街道上设立检查站或是收费站，商家们就都会喊叫起来，对于互联网也是如此。所有在互联网上做生意的人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流量，免费的互联网，对于商家而言是最好的事情。

当然，对于电话与有线的双重接入而言就并非如此了。在一些州内，那些实力强大的公司已经在推动通过立法来禁止在城市中提供无线互联网服务，它们还资助在国会推动相似的禁令。这些公司的意思是，它们的利润超越了消费者省钱的权利，也超越了城市为其市民提供服务的权利。然而，还是有很多政客接受了这种说法，故事的结尾还有待书写。

另一场类似的战争将会是关于所谓的“网络中性”。现在的互联网——相似于电话系统——对所有的内容平等对待。没有什么人的数据会受到歧视，也没有什么人会得到优惠待遇——你的个人主页和Google的待遇是同样的。然而，有线和电话公司想要建立一个两级互联网，有些内容提供商得到的速度较慢，而另一些——那些付费给电话和有线公司的人——就会得到更高的速率。这意味着公司能从中得到更多的收入，与此同时，就会在企业内容提供商与所有其他人之间，造成永久性的鸿沟。国会正在同时考虑允许和禁止分级的两个法案，结果仍在未定之日。

专利的不科学性

公共权益的封闭现象也存在于科学世界之中。在此领域中，建国者的意图也是同样清晰的。本·弗兰克林可不是对有关钱的事情漫不经意的人，但他从没有为其著名的发明弗兰克林炉子申请过专利。“当我们在享受着其他人的发明的巨大好处时⁸¹，”他写道，“我们应为能以自己的发明服务于他人而感到高兴。”托马斯·杰弗逊，曾作为美国专利局的第一任首脑，他相信专利局的目标是**传播**发明，而不是去保护它们。在他的任期中，他拒绝了将近一半被提交的申请（伊莱·惠特尼的轧棉机被通过了）。

至于版权，这个严格的专利方式在很长时间内都行之有效。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美国并不缺乏发明（请记住，我们早期的很多技术都是从英国偷来的）。但是从20世纪中期到现在，专利已成为国家的昨日风光。1980年通过的《贝-多法案》（The Bayh-Dole Act），规定大学可以凭借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取得专利，并可以将这些专利归属于企业，由此打开了泄洪闸门。企业的钱涌入学术实验室，企业也从此变得心安理得。曾经公开分享其发现的科学家们，有许多现在都三缄其口不敢谈论，否则就会受到专利办公室的责罚。有些人说，如今资产权是如此的密集，保密是如此的严密，研究的进步已经明显地被放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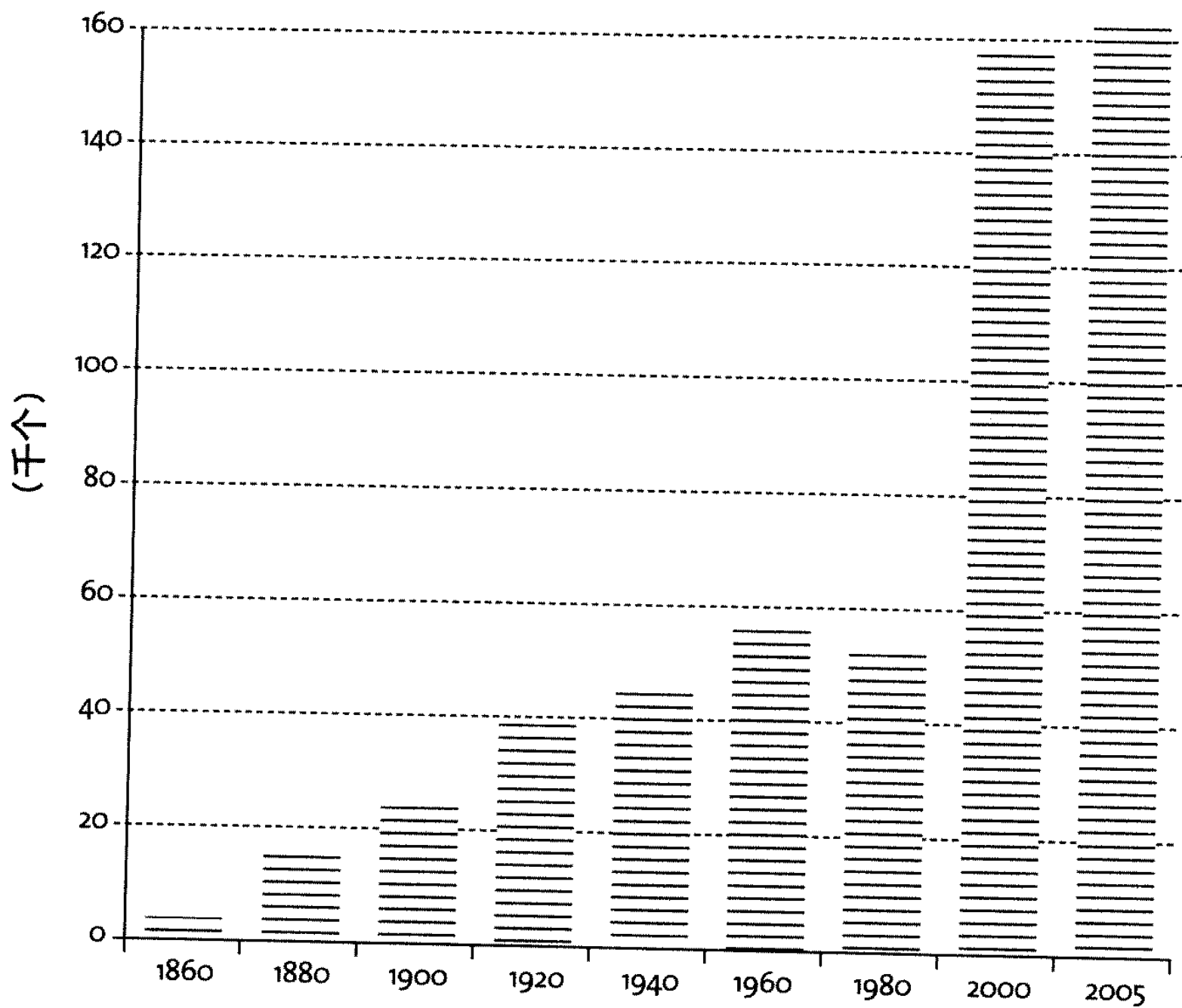
美国专利局一直都能应付，从互联网一键式购物到99%自然构成的基因，统统可以发给专利。经常，公司获得专利并不是为了开发，而是为了可能对某些人起诉（所谓的**专利巨魔**，*patent trolling*）。图8.1显示了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内专利发放的数量。

消费者和纳税人也都承担了重负。感谢专利制度，医药公司在新药上市之后，可以一直收取垄断价格达20年之久。这就是所谓的为了社会公益而对研究

的奖励。但根据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成本远远超过了益处。医药公司每年在研究上花费大约 250 亿美元, 其中大约 70% 花费在仿制竞争者品牌的药品, 而并无明显的有益健康的效果⁸²。

联邦政府应该为非仿制性的研究提供 100% 的资助——并将研究出来的药品置于公共领域——完全来自医疗和医疗辅助费用的节省。由此, 消费者因药物的低成本的节省每年可以达到成百上千亿美元。

图 8.1 1860 年至 2005 年间批准的专利数量 (千个)



源自：美国专利与商标办公室。

要将科学从企业的控制下解脱出来，我们需要采取双重步骤：对发放专利采取更严格的标准，并为研究提供更多公共资金（前提是，由公共资助的研究结果将属于公共领域）。事实上，由公共资助所产生的研究成果是巨大的。整个计算机工业都是由美国陆军兵器部（U.S. Army Ordnance Corps）所孵化出来的，1945年诞生的第一台数字计算机就由此产生。相似的，互联网则是由20世纪80年代的国防先进研究项目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与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催生出来的。简直无法想象，若是没有这两项突破，现代世界将会怎样，或者假若互联网被比如说 Verizon 或是时代华纳（Time Warner）所拥有了，也同样是无法想象的。

保护，然后加强

本章的最大教训在于，公共权益的所有三个分支——自然、社区和文化——都已处于来自企业的类似的侵略之下，都需要加以防御和保护。特定的公共权益所需要的保护手段有所不同。当公共权益是短缺的或是正在受到威胁时，我们需要限制使用的累加，将资产权交付给信托机构，并向用户收取市场化的价格；当公共权益是无限的（如文化，互联网，还可能包括电波波段），我们的挑战则是相反的：要使最广大的用户以最低的成本享受最大的益处，非必要地制造短缺会降低而不是增加我们的利益。

对于有限的和无限的公共权益，企业与公共权益的公式都是互相冲突的。对于有限的公共权益，企业的公式说：你尽快更多地用吧，因为你不用，就会被别人用掉了。而公共权益的公式的说法则是：要为未来后代保留资产，并要尽可能地加以改善，可以使用收入但不要耗费原始资本。对于无限的公共资产，企业的公式说：限制使用，按照市场的承受力尽可能地多收费。而公共权益的

公式则说：越多的用户越好，越便宜越好。在两种情形下，公共权益的公式与企业的公式的冲突都是针锋相对的。这都不要紧，其实，这恰恰是关键所在。

公共权益的公式需要被运用到实际的市场上，在那里它可以与企业对手争锋。双方部门的经理人都能清楚地了解所要做的事情，公众则可以了解所期待的是什么。如果企业持续胜出，那么就要在公共部门中增加更多的资产。逐渐，我们将从两个世界中都能得到最佳的效果。当产生矛盾时，也能够得到比现在更加平衡的结果。我们还能由此更清楚地了解到现在这种实践方式的真实成本。

在实施了保护之后，我们还要予以加强，正如我们从公共权益中所获取的，我们还必须要回报回去。艺术和音乐可以被企业再生产出来，但它们并不是源自企业，它们的源泉在于公共权益的领域。民歌、乡村音乐、爵士乐、蓝调、车库乐队——这些都是我们的音乐遗产的根脉。我们为这些根脉赖以生长的土壤施肥，这才是丰富文化之道，而不是延长版权。

第三部

Part 3

付诸实施

MAKING IT HAPPEN

第九章

建立公共权益部门

如果你不知道向何方去。

你大概就不会到达那里。

——贝拉 (Yogi Berra)

我儿子爱玩的一个计算机游戏叫做**西姆城** (*Sim City*, *虚拟城市*)，那真是
个天才的发明。在游戏中，你可以设计、增长并治理自己的虚拟城市，你
可以布置街道、下水道、电力系统还有地铁等等，你划分商业、工业和居住等各
个区域，建立学校、医院、救火站。很快，一个城市就诞生了，它足以使孩子们
全神贯注地玩上几个小时。

现在来设想一个成人的**西姆公益**游戏，你可以设计自己的虚拟经济部门，并
使其得到增长。这个游戏的目标是以对自然资源的最低程度的破坏为代价来产出
最大程度的幸福。你布置了公共权益信托机构，通过简单的菜单，你向机构分配
了资产权、资产管辖权力以及管理的公式。随着游戏的进程，计算机显示着你的
幸福与自然资源的分数。经过试运行和纠错，你了解到哪些动作的组合可以产生
最佳的效果。

要在现实世界中建立一个新的公共权益部门，也要经过类似的过程。当我们

等待一个全国性的历史性转机的同时,我们可以先在较低水平上进行实验与建立工作。我们可以测试不同类别的信托机构、非营利机构与非正式的团体,观察它们与公共权益原则的契合程度。然后,当更大的历史转变时机到来之时,我们也将准备就绪了。

在这一章里,我将对一些我们需要复制并精炼的模型进行描述。我将从国内开始,并把全球性的思考留在本章的结论部分。我的目标是双重的:第一,颂扬那些已经破土而出的萌芽;第二,对如何将这些种子集合起来并加以繁殖,而使其成长为一个足以制衡企业部门的强有力的公共权益部门,提出建议。图9.1中所显示的是在地方、区域以及国家等各个水平上的公共权益部门的可能形态。

地方的创举

“行动在哪里?”这是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中的赌客的问题。当涉及到建立地方的公共权益机构时,所需要的行动几乎遍及所有领域。这里就有一些样板。

土地信托

我已经提到过马林农业土地信托⁸³和太平洋森林信托。这类信托的目的是要将部分土地保护起来,使其免于开发或凋敝。其做法是直接拥有土地,或是拥有限制土地使用方式的地役权。

土地信托不仅是限于农村,波士顿达德利街的居民们在1988年也成立了一个土地信托。它购买空闲土地,并根据对社区的最佳服务来决定其用途。现在,已有六百多所新房子重新住进了人——都以高于零售价格的价位售出——还有花

图 9.1 新的公共权益部门



园、公共区域、公园和游戏场。这些努力使得社区重焕活力，而无须像资产私有化以及乡绅化的方式那样移置本地的居民。

建立于1993年的俄勒冈水源信托取得了地表水源的权利⁸⁴，以保护三文鱼和其他鱼类。至今，它已与300多个地主协作，将水放归溪流，其中有些溪流曾经完全枯竭了。有时，水权的卖家会以改换农作物，或只在春季灌溉的方式——春

季的水流对于农夫和鱼类来说都很充裕。另一些时候，就会与其他供水来源达成交易，以保证溪流中有鱼类所需的足够的水。最近，在蒙大拿、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得克萨斯、华盛顿和内华达，都涌现出类似的信托。

地下水信托

地下水，是全美国饮用水一半的来源，其被抽取的速度要快于自然补充的速度。在高原地区，这个问题已变得十分尖锐，以至于那里的农夫正在使奥加拉拉蓄水层走向枯竭，西南部的许多城市都面临着供水短缺。圣安东尼奥 99% 的供水都是来自爱德华蓄水层，爱德华蓄水层管理当局现在已经通过发放许可证来限制地下水的抽取。类似的奥加拉拉蓄水层信托机构，也是一个有待发生的解决方案。

社区花园

转过曼哈顿的街角，你会发现在一个空场的碎石堆中出现了一个绿洲。其间有豆类的藤蔓和番茄植物造型的雕塑、神龛，还有工具架，那都是园丁们从拆毁的建筑物的场地上捡回来的。纽约市装点着 700 多个社区花园，其中约有 150 多个逐渐会被住房所取代，但其他的都会被保留下来。

不仅是纽约，美国社区花园协会（The American Community Gardening Association）对 70 多个拥有社区花园的主要城市作了统计。在西雅图，1900 多个家庭在这些邻近的地块上种植食物；在费城，园丁每年能节省大约 700 美元的食品费用；在波士顿，一个食品项目（Food Project）在 21 英亩土地上每年出产超过 12 万磅的蔬菜，大部分都分发给了有需要的人们。同样重要的是，这些花园使得陌生的人们成为邻居。

农夫市场

直至南北战争之前，在美国的大多数城市中都有公共的食品市场。在20世纪40年代，因为农夫们寻求更好的价格而购买者寻求新鲜的食物，公共食品市场曾有过短暂的回潮。之后，州际高速公路出现了，本地的季节性产品市场也就此垮了。

现在这些商业性的公共权益正在被重新建立。从纽约市的联合广场到旧金山的港口大厦，城里人正在重新发现相约寻找那些自制食品者的快乐。现在，在50个州里有将近4000个农夫市场，比10年前的数目翻了一倍。

公共区域

从纽约市的布莱恩特（**Bryant Park**）公园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的开拓者广场⁸⁵，再到波士顿的科普利广场，城市广场正在复兴。连底特律，一个为汽车工业而建立的城市，也在重新装点着自己的城市中心，为了名为马迪乌斯校园公园（**Campus Martius Park**）的新的公共广场，还改变了行车路线。这个广场从夏季到冬日都是人头攒动，并为这个地区吸引了约5亿美元的新的投资。

在波特兰，非正式的邻里组织重新设计了路口，他们以人行道上的生动设计作为自己的标识，并经常会为社区建筑添加诸如物品架和游戏区之类的附属设施。

时间银行

帮助邻居是美国人的传统。但随着越来越频繁的迁移，人们对其所付出的好心会得到回报产生了犹疑。时间银行⁸⁶就是一个解决的方案。

这个主意本身很简单。当你花一个小时帮助了一个邻居，你就挣到一个“时

间元”。以后当你需要帮助时，就可以花费你所储蓄的“时间元”。在纽约布鲁克林，一个为老年服务的卫生维护组织的成员，使用这类“货币”来互相帮助，修理房屋、交通，以及陪伴，等等。这是一个值得复制的模式。

城市 Wi-Fi

互联网是 21 世纪的人行道，所以毫不奇怪，在城市中都开始了高速无线网络的建设，就像曾经的街道建设一样。许多城市都运行着可以覆盖几十个街区的无线“热区”，提供互联网的免费接入。在旧金山和新奥尔良，免费接入甚至覆盖到整个城市的范围。在其他城市，如费城，则在整个城市范围内推动低成本服务。

区域性的创举

有些公共权益是区域性的规模，就需要有区域性的管理。以下是一些处于概念、设计和实施的早期阶段的例子。

空气信托

当联邦政府还在喋喋不休得谈论着气候改变的时候，有一些州已在采取行动。其中最先进的是区域温室气体行动 (**the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由从缅因州到特拉华州的 7 个东北部的州所联合启动。他们的计划是减少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并要求水电部门必须持有排放许可证⁸⁷。至 2006 年中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尚未得出答案：污染者是否要为其许可证付费？或是大部分都还是免费？

有上百个公民群体都正在呼吁州政府拍卖排污许可证，并以相应的收入来降低消费者的成本。“从历史意义来讲，污染者一直在免费使用我们的空气，”马萨

诸塞州气候行动网络 (the Massachusetts Climate Action Network) 的马克·贝斯洛 (Marc Breslow) 说,“但是没有理由允许他们继续这样做下去。大气层是属于公共的财产⁸⁸”。

对于所写到的这些,有一些政治家正在专心倾听。佛蒙特立法机关投票通过要100%地拍卖全州的排污许可证,而不再将其免费赠予污染者。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关键的委员会已经批准,要用五年时间过渡到全额拍卖——尽管州长米特·罗姆尼 (Mitt Romney) 粗暴地将马萨诸塞州从区域行动中撤出了。在纽约,州总检察长埃利奥特·斯皮策 (Eliot Spitzer) 宣布,他支持100%地拍卖。如果斯皮策能在2007年成为州长,拍卖就很可能实现,这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流域信托

在20世纪30年代,田纳西河谷的权力当局的主要工作是洪水防控以及为7个州供电。今天的流域信托的使命会有所不同:要保护河流和鱼类,还要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来看看我们最大的流域——密苏里—密西西比—俄亥俄流域,它将25个州的水和废弃物排入墨西哥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墨西哥湾的渔民注意到在夏季期间“死亡区”扩大,鱼类和甲壳类生物数量直线下降。根据环保署 (EPA) 统计,死亡区已经扩展到约5000平方英里的范围,原因是**低氧⁸⁹ (hypoxia)**,也就是缺乏溶解于水中的氧气。原因大概是由于水草的过度茂盛而触发的加速效用,最终消耗掉了水中的氧气。

是什么引起水中植物生长的如此快速以至于影响了整个生态系统呢?一句话,营养物——就是农民用来滋养他们的地上作物的同类肥料(氮和磷)。土地中的过多肥料被冲刷到密西西比河中。1997年,一个跨部门的专题小组专门对这

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2001年，它发出呼吁，要产业和政府采取“自觉地、实际的、有成本效益”的行动。不幸的是，至今并未有太多效果。

我们何不将密西西比盆地的表土层和流经的水域视为必须为未来后代保护的一种公共资产？然后，我们也许就会创建出一个密西西比土壤与水源信托。

这个信托将持有盆地内的所有肥料（也许还包括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权。它的工作将是使化学品的施放减少到安全水平以内，并对妥善管理其土地的农民（和其他人）施以奖励。

每年，信托都将出售逐渐递减的可交易的对土地施放的许可证，制造厂商可以竞标购买。招标所得的收入将会流向那些达到了妥善管理标准的土地看管者。这将使化学品集中的农业成本增高，而使妥善管理土地的农夫得到奖励。农民的作物产出可能会暂时有所降低，但他们的收入不会降低。在一二十年之内，湾区将会恢复生机，美国核心地带的种植业也会变得更加有生机，这个过渡的时间将取决于信托与发放许可证减量的比率。

水牛公益

大平原（The Great Plains）被称为是“美国的失落的塞伦盖蒂（Serengeti）”。曾经，成千上万的野牛、羚羊和麋鹿在那里游荡，土著部落则进行着有节制的狩猎。欧洲移民到来时，随之而来的还有牲畜、谷物、还有藩篱。很快，大型的野生动物都灭绝了。

大平原繁荣了一阵子，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衰落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口锐减，土壤风化已达到沙尘暴中心（Dust Bowl）的程度，当地的主要水资源——奥格拉拉蓄水层的水位迅速下降。至1987年，地质学家黛博拉与弗兰克·波普（Deborah and Frank Popper）提出了一个长期修复的概念，他

们称之为**水牛公益**⁹⁰ (*Buffalo Commons*)。

这个设想触发了整个地区的想象力。举行会议、开展研究、组建专题小组、兴起了一个运动,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足够野牛和其他土著野生动物自由生存的巨大走廊。这个面积可能达到1000万或是2000万英亩的没有藩篱的大草原,不仅将重新恢复一些已经濒危的野牛种类,它还将使整个区域成为一个高质量生活的地方。国家保护区与类似的实体,都正在努力将这个公共权益的资产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

国家行动

公共权益的组织原则是可以向上兼容的,在本地和区域行之有效的规则,可以同样地应用于国家的范围。通常,最好在尽可能低的层次上建立公共权益的组织,这会增加社区的参与和透明度。然而,有时所涉及到的公共权益是如此巨大,必须要有全国性或国际性的管理架构来支撑。以下列举了一些国家机构的可能性。

美国永久基金

一个美国的永久基金,将作为本卷所提议的新的公共部门之中的核心部分。它是对于资本主义将私有资产集中在5%人口手中的弊病的纠正,或至少是加以改良的途径。它采用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方式,将公共资产的收入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公民。这将会是第三个使得收入流向美国人的“管道”,前两个是工资和私有资产的收入。

如在第七章中所讨论过的,美国永久基金的收入部分来源于出售污染许可证——大部分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许可证——其余则来自公共权益在企业利润的权益。第一种收入来源与我们治愈全球变暖的努力直接相关。如果我们决定要

将二氧化碳的排放，比方说，在今后 60 年中每年减低 3% 的排放，也就是科学家们所建议的必须水平，这将为美国永久基金带来巨大的收入，其中有些可以用作公共物品，另一些则可用作人均分红。我们降低排放的速度越快，分红就会越多。实际的效果就是，红利与公共物品就是对于美国人采取正当的生态行动的奖励。

逐渐地，当后一碳时代的基础设施被建立起来，碳排放将会稳定在一个低水平上，作为美国永久基金的收入来源也就会随之降低。到那时，第二个收入来源——在公开上市的企业中所占权益的分红——就会跟进。这种收入来源将会使每一个公民都在上升的企业利润中享有一份权益，就像他们曾享有的第一种收入来源——从污染降低中所分得的权益一样。有谁会拒绝这样的组合呢？

要建立并运行这样的永久基金，即使是从很小规模开始，也是一个至为关键的示范和信号。与社会保险信托基金相似，随着时间推移，其管道中将会流通着越来越多的钱。它将为公共部门建立起基础原则——每人一股。并且，它将改变美国人关于我们的经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污染者所**没有**付出的每一分钱，都会出自每一个人的钱袋。不仅是未来后代将要承受自然资源被损毁的损失，健在的当代美国人的银行户口也会受到损失。对未来的不负责任，带来的是立即的和广泛的代价。

儿童机会信托

儿童机会信托是国家公共权益基础设施的第二个主要支柱，它将对于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弊病——将阶级特权代代永续相传——加以纠正。

与基于世代传袭的贵族制的封建主义不同，在理论上，资本主义是精英制的，或至少是“靠运气的”。玩家们如果不能拥有同等的机会，也都应拥有公平

的成功机会。赢家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努力工作、才能和运气，而不是由于出生的偶然性。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资本主义 2.0 比这个理想还相差很远。

作为一种生存权利，儿童机会信托将会为每一个儿童注入启动资本——一种在生命起始阶段的社会保险。如第七章中所述，这个信托的收入将来自于生命终结时的回馈。我相信，这种资助机制要好于从国库中拿钱。它将对于社会的起始资助与生命结尾回馈的义务直接联系起来，建立起一种类似宗教的公共权益，连接着降临和离去的每一代人。

电波波段信托

一个波段或波长信托将具有一个清晰的使命：减少企业对我们的民主所施加的影响。其经济与生态影响将会是巨大的（降低企业的政治影响，将会使许多政策得到改进），但是相对于其政治目标而言，这些还都是其次的。

根据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一项研究，我们免费给予企业广播公司的波长许可证，大概价值 5000 亿美元⁹¹，当无须许可证的 wi-fi 得到普及之后，这个价值可能会有所减少，但同时，广播公司通过将波长出售给广告商而攫取了本该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成百上千亿财富，至少其中的部分是本该属于我们的。

这些钱部分来自于那些必须要购买电视和广播广告来争取胜选的政治候选人。问题还不在于广播公司不劳而获的大笔额外收入，而是在于政治候选人被迫要向他们付钱。这迫使政客们为了能付钱给广播公司而要向企业捐助者叩头求乞。其他的民主制度都会给予政治候选人免费的播出时间，而我们则为了保护广播公司而锁定了我们的波段。换言之，通过波段私有化，我们实际上已经将我们民主私有化了。波段信托的工作将是，通过拿回我们的波段而讨回我们的民主。

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实现。方式之一并不需要一个真正的信托机构。国会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明，广播公司必须免费给出一些时段为政治候选人所使用，以此换取免费波段的牌照。另一种选择是，广播公司可以为其牌照付费，而收入都归于一个无党派的信托机构，这个信托机构将为需要购买电视和广播广告时段的候选人们分配资金，分配公式将兼顾考虑到媒体市场与其他相关选择之间的成本差别。

公益税额减免

有些公益信托将通过销售使用许可证而产生收入，另外许多机构则**需要**收入，才能够购买资产权，以便复兴濒危物种或是作为儿童的启动资本。因此，鼓励多重收入来源是非常重要的。最好的方式是通过联邦公益税额减免（**federal commons tax credit**）。

20世纪70年代，当我从事太阳能事业时，我们的客户享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双重减税。就像我当时经常需要去作出解释的，税额减免与减税不同，前者要更大。减税，是从应纳税的收入额中的减除，如果你应缴纳的税率是30%，一项**减税**可以为你的每1美元节省30美分。相对照的，**税额减免**，是从你的纳税款中的直接减除，与你的税级（**tax bracket**）无关。只要你需要付税，它就能为你的每1美元节省100美分。

公益税额减免的前提假设是：富有的美国人对公益的亏欠要比他们现在向政府所付的税款更多。在此前提之下，公益税额减免可以如此实施：联邦政府可以将最高税级再提升几个百分点，同时，给受到影响的纳税人一个选择：将多出的钱付给政府，或是贡献给一个或几个符合资格的公益信托。如果人们选择后者，他们会得到**100%**的付税信用，从而避免增加的税收。于是，对富人们发出了这

样的信息：**你必须回报更多。你自己选择是要交给国税局 (IRS) 或是直接交给公益，如果你想取消政府的中间环节，没问题。**

公益信托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格呢？或者，它能以接近公平的方式给所有公民带来利益，或者，它征集资金为了拯救某些被危及的公共权益。社会保险、美国永久基金、儿童机会信托，还有大多数的土地与水源信托，都符合资格。而相对之下，一个普通的慈善信托就并不符合资格。对普通慈善的贡献，仍将得到从应纳税收入中的减除，但不是从应纳税款中的减除。

全球行动

根据几乎是全体科学家们的一致共识，世界已经十分接近气层碳含量的临界点，因此我们必须急剧地减少碳燃烧，否则，很快就将引爆气候灾难。这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其整体经济系统中安装减少碳应用的阀门。我在前面描述过，美国可以通过应用一个碳信托或天空信托来实施这个任务。我们不能依靠我们自己来制止全球变暖，所以，此类的美国信托的一个必要的实施条件是一个全球性的信托。

全球的碳信托要求各国政府都要认识到，他们本来就能够并应该认识到，必须要授权给**全球性的**信托机构，正如他们将其**内部**的信托职责授权给信托机构一样。我认为，面对当前清晰的危机局面，其他选择都是无效的。

想想那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漫长而折磨的气候谈判。他们先是在1992年由所有参与国达成了**一个没有牙齿的宣言——1992年的里约会议的《国际多边环境条约》(the Rio Convention)**——所有国家都自愿在2010年时将其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5年之后，又在京都达成了**一个稍稍多了几颗牙齿的协议**。然后又花了5年时间，来对运行规则加以解释和批准。为了接替将

在2012年失效的京都协议，又将开始一个同样冗长的谈判过程。

无疑，如果不是美国政府那么固执地反对，这些谈判可能会进展得更快一点。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将近200个主权国家同时参与谈判而想达成一个能使所有人满意的结果，过程自然会无比繁冗，而达成的结果与科学家们所指出的必要程度相去甚远，也就是毫不奇怪了。那么，这大概就是应该授权的时候了。

我可以设想一个全球大气信托的工作方式。它将由信托所组成的一个小型理事会来治理，并由所有签署国家作为成员。理事将由成员们任命，这也许有点类似于联合国安理会，要为几个“强大势力”保留席位（在此情形下，就是大的污染排放国），还要预留各个区域的席位。然而，当理事们被指定之后，他们的忠诚将从各个独立的国家或区域转向未来后代。这一点至关重要。

依据同级审查过的科学根据，理事们将决策如何设定碳排放的全球限制标准。每年，他们要按照当年的排放限量来发放可交易的碳排放许可证。这些许可证的一部分（初始时是大部分）将按照事先同意的公式免费发给各参与国，其余的将由信托机构进行拍卖，拍得的收入将用来修复由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对受害者的救助。信托将要决定每年用于这些目的的许可证的数量，以及拍卖得来的资金的具体用途。

理事们根据投票多数进行决策，没有否决权。就像在法庭上，他们以书面形式解释其决策，具体解释他们如何对未来后代进行保护。比如，成员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投票废除理事会的决定。如此，签约国尽管**可能**以短期利益超越长期利益，但是，他们必须做在明处，并必须含蓄地承认他们从未来后代那里的窃取或借贷。

症结的问题在于，将在成员国中使用何种公式来分配碳排放许可证？有这么多国家的不同利益，要想设计出这样的公式，首先要确立一些普遍的权益基本原

则。京都协议书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它是一个交易的杂烩，还要躲闪回避对美国的取悦之嫌，结果就是没能作出清晰的规定。然而，下一个国际制度，必须要有为穷人和后代的诉求，同时也要有美国和其他发展国家的诉求。没有一个基于权益的组织原则，就不大可能看到任何结论的达成。

幸运的是，权益组织原则的先例已经存在了：就是所谓**合同及衔接**⁹² (*contract and converge*)。以下是其工作方式。

首先，先要达成降低污染的日程，这就是等式中**合同**的部分。然后，将要在各国之间根据人口来划分全球大气公益的权利——每人一股。然而，静态的人口数字持续不了几十年，在此期间，配额公式将根据人口的变化进行**衔接**，**衔接率**是有待商谈的题目，然而，首先须被接受的是人均权益的**目标**。

在衔接之前和之后，得到超过其排放量的许可证的贫穷的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以将多余的许可证出售给那些富裕的、相对人口较少而需要更多许可的国家。如此一来，对大气造成过度污染的国家，可以从那些较少污染的国家购买排放权利，于是各自可以产生不同程度的污染。也就是说，美国还可以将现在的碳排放量水平保持上一二十年，但是我们需要为此向那些贫穷的国家付费。

全球大气信托⁹³机构是否会过度屈从于国家主权呢？我认为不会。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我们所谈论的是管理一种特定的全球性公共权益的信托机构。这个信托的唯一任务，就是设定并强制向公共领域的某些排放限制。某些主权损失是会存在的，但比世界贸易组织所造成的要少。与我们和所有国家将会获得的相比较——一个稳定的气候——我们的主权损失只是小小不言的。

如果全球气候信托能够被建立起来，它将成为21世纪的分水岭事件。从地理政治的意义上，它将为一个和谐的世纪奠定基础，正像《凡尔赛条约》(Versailles Treaty)曾奠定了20世纪的不和谐道路一样。它还将有助于整个世界

从容地应对全球性石油产量下降的问题，据专家们说，这个问题已迫在眉睫。

在经济意义上，全球大气信托可以激发一些重要的变化。全世界的企业都会立即将投资转向效率能源与非碳能源的基础设施，从而带动一个新科技的大潮。经济——包括我们的经济——将会繁荣，不是因为**不在乎**更高的碳价格，而恰恰是**因为**在乎。

为什么这些会发生呢？最简单的原因是，全球大气信托将会驱散巨大的不确定性的疑云。商业能够看清楚碳燃烧的未来，并更加确认，价格打击——比逐渐升价的危害更大——不会使他们的规划脱轨。这样的信托还会消除易于引起国际战争的国际紧张的主要因素——石油储备下降引起的争夺与混乱。还有，向贫穷国家的货币流动（通过向富裕国家出售排放许可证）将会提升它们的经济和工资水平，有助于美国的出口，也有助于放缓美国工作机会的损失。所有这些都确保，当高碳行为降低的同时，低碳行为将以相应的速率提升。

然而，加速的经济行为并不是我们所能仅见的益处，还会出现质量的改进。于是，随着长途旅行的成本上升，制造商将会从全球生产转向本地生产。农夫将重新回到廉价的石油化工产品之前的生产方式，他们会种植更多的有机产品，并通过农夫市场和城市购物俱乐部来销售产品，从而免除掉中间环节，以保持其产品的更高价值。对于不易腐坏的产品，消费者将会更多地通过互联网而不是开车到商场去购买。感谢易趣（eBay）、分类黄页网（Craigslist）以及类似的服务，消费者可以买到更多的二手货而减少向垃圾堆的丢弃。更多的工人会骑自行车、乘坐投币公车和火车，或是在家里在线上班。城市将更鼓励步行，郊区将有更方便的交通枢纽连接，会出现更多新兴的合居户型。所有这些改变都将是有利润的，甚至是令人激动的。如果我们有了国际大气信托，这些变化都会更加顺利地发生。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任由我们的大气像一个没有管理的垃圾场，我们光荣的工业舞会将会被唐突地终结，而跪倒在油价飙升带来的打击、气候灾难或是货币恐慌之下。在此之后，没有人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

政府的角色

我的最有价值的经商经验是，你要做成什么事，必须找到合适的人，给那个人发出清晰的指令，授以权威和资源，然后就走开。也就是说，要授权。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政府。当政府想要做一些事情，它必须找到人来完成。它可以在其官僚体制之内增添人手，或是将任务承包给外人。只要能够以合理的代价达成公共目标，哪种方式都无所谓。

当涉及到建立新的公益部门时，每个人都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政府尤其要承担四个重要的角色：

1. 直至将公益任务的责任分派出去之前，政府就是默认的受信托者，必须坚守信托的标准。

2. 政府是初始的权益分派者，也是资产权的终极仲裁者。它应该将更多的资产权分派给公益信托，并使公益权利优先于资本权利，而不是任由几乎所有权利都被私有化。

3. 只有政府能够以类似社会保险和健康保险那样的中介方式，来贯通同一代人和几代人。我们还需要政府为健康保险和儿童机会信托起到同样的作用。

4. 政府可以对先前已被私有化的公共权益部分的回购和恢复进行资助。尤其是国家和州政府所拥有的发行长期免税债券的权力，可以被用来收购私有土地和水资源的权利。

这四个角色反映出政府所具备的独特责任和优势。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中，政府并**没有**竞争优势，本书中就对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了许多讨论。

先前我谈到了信托功能——必须**有人**来保护我们所共同分享的遗产。我们需要使这个功能得到妥善地实现，倘若我们不能做到，我们的后代以及其他很多物种，就将遭遇不幸的命运。所以，我们必须问谁是实现这个功能的最佳选择。证据显示，政府或私有化企业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因此，信托，就成为我们的后代所依赖的选择。

我向所有那些关心未来的人们指出：**向信托授权的时机已到**。我们需要授予信托机构以清晰的使命、权力和资源，然后，就让它们去做吧。信托机构可能并不完美，但在很长时间内，它们可能会比所有其他已知的选择都能够更好地完成任务。

第十章

你可以做的事

两条道路没入林中，我……向足迹稀少的那条走去，
一切改变，即由此发生。

——罗伯特·弗洛斯特 (Robert Frost, 1920)

我们终于要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建立资本主义3.0做些什么呢？

我在前面提到，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支配了美国政府，但还不是全部。每个世纪总会有一两次短暂的空隙，其间，非企业的势力能够占到一点优势。没人可以预言**何时**将会再出现这样的空隙，但可以放心地说，那是肯定会到来的。我们必须在其到来之前，为建立一个强大的、自我持续的公益部门作好准备，使之不会轻易地又被再度滚动起来的政治之轮所肢解。

要在**那时**作好准备，意味着**现在**就要忙起来了。

第一，我们要开始注意并谈论我们的公共财富，无论在哪里看到，就要指着它告诉世界，它是属于谁的。

第二，我们需要要求比现在更多的生存权利和资产权利，属于所有人的权利，建筑于我们的操作系统之中的权利，保护我们自己也保护未来后代的权利。

我要强调资产权利的原因是，在美国，资产权是神圣的，它们得到宪法的保证。一旦你拥有了资产权，就不会在没有公平补偿的情形下被剥夺。这些保护已使那些拥有私有财产的人们受益，也应使分享公共财富的人们都能受益。

第三，我们要为公益部门想象和设计出多重的组成部分，即我们希望公益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我们还要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建立并测试我们的模式。过去，在本地发展起来的模式经常会得到自我复制，并扩展到全国的水平。这就是社会保险和我们的许多环境法规所生长扩大的方式。

全体的角色

为了建立资本主义 3.0，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扮演各自独特的角色。在本书的最后页张中，我将描述不同人群的角色，他们的参与是至为关键的。

父母

你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够得到最好的东西，你们希望孩子们安全，实现他们的潜能，找到幸福。然而，你们会留给他们什么呢？我所谈的不是钱，我是在谈那些非物质的赠予——一个强壮的社区，一个富有活力的文化，还有一个健康的星球。你们能——我们能——留下这样的礼物吗？

是的，我们能——**如果**我们与其他人携起手来。携手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可以面对面地交谈，或是与那些心意相同的陌生人在网上交流，我们可以通过组织和选举，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教堂、犹太教会堂或是清真寺。

没有人能够独自改变社区、美国或是全世界。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联合其他人一起来实现这些改变。联合谁，如何联合，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我所要求的是，你们要去做，今年就开始。

工薪阶层

你们靠着挣工资一直过得还不错，感谢工会，你们已经挤进了中产阶级。你们有带薪假期，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加班时得到一倍半的工资，有健康和养老金，还有最重要的，安全的职位。即使是在那些没有工会的公司，如果你们想要的话，也能够找到优厚的报酬以及终身雇用的机会。在雇主、雇员和社区之间，即使不是法律的契约，也还是有着一种社会契约。这就是美国版本的福利国家，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分子，那可真是不坏。但是，这些年来的年景可是有些晦暗。

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上，资本在以光速移动，而你们只是需被最小化的成本。经理阶层所寻求的——资本所**强令**的——是下个季度的更高利润。你已经将最好的生命时段都交给了 **Acme Inc** 了吗？太糟糕了。没有什么比缩小规模、外包或是玩弄你们的养老金等等更能迅速地改善业绩的了。忘掉工会的帮助吧，它的牙齿早已掉光了。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你们可以做些什么？诚实地讲，没有太多可为。在全球资本的时代，你们的收入形式——工资——处在了十分不利的竞争位势。但随着时间推移，事情可以好转起来。出路是——如果不是为你们自己，也是为了你们的孩子们——通过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形式，使你们（和所有人）通过公益财富而获得**资产收益**。这种权益是你们的生存权利，不能被缩减或外包。它以现金的方式付红利，以及其他不那么明显的付出形式：健康保险、免费的互联网接入、健康的食品、清洁的空气，还有很多可以钓鱼的去处。那么，去讨回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们的生存权利吧，在起居室、教堂、理发店、美发厅，去那里讨回权利。运动就是这样兴起的。

资本家

你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资本的诡计，你们知道如何将一点点钱变成一大堆（这些诡计大多数都涉及到从公共利益中的获取）。但当你们以后清点着自己的财产时，能不能为每一元钱都感到问心无愧？或许你有时会想：“我是不是曾经、或正在，拿得太多了？”

嗯，请允许我直截了当：**你们确实拿得太多了**。但不必太担心，我并没有说你们是无赖。我所说的是，如我们所知，资本主义对于私有财产的拥有者给予了过度的奖励。这是**系统的**谬误，而不是个人的毛病。它的危害并不太在于你们从中所得到的奢侈，而更在于剥夺了其他人的生活必需及其对于全社会带来的扭曲。

我并不指望你们会将所得到的多余奖励立即交出来，若这样要求你们，也超过了我对自己的要求。但我的确要求你们考虑做两件事：（1）现在就将你们部分多余的财产馈赠出来，而其他的财产留待你们去世时再交出。（2）如果其他公民要求升级系统，以使得无资本者能得到更公平的奖励，请不要与他们为敌，让他们去做，那是能够行得通的，而且将会对你们的孩子们和整个地球都有好处。

公益企业家

你们将要改变这个世界。你们将要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公益部门，你们将是资本主义 3.0 的无名英雄，或许得不到广泛颂扬。

一个公益的创业者，与私营的企业家们相似，是一个梦想家、催化剂、创始人。你们看到了一些尚未实现的需求，并看到了通向它的途径。你们将人们聚集起来，制定规划，并使其得到实现。有时可以奏效，有时则会失败。一个公益创业者的区别在于，他不会得到股票。你们被一种不同的力量所推动，那就是，一

种想要**回馈的愿望**。你们并不是无我的，你们享受成功、表彰，甚至还包括钱。但是，你们想要贡献和分享财富的愿望，平衡了你们对自身财富积累的欲望。于是，你们选择了公益，而不是企业部门。

一个公益创业者可以在几乎任何地方工作。在街区闲逛一会儿，发现缺少了什么？一个社区花园？一个自行车道？一个 wi-fi 热点？还是一个食品购买俱乐部？于是就采取行动，去实现它。无论你们的兴趣是在于一条河流，还是一种文化，或是整个地球，就去参与吧。选定一种公益，研究关于它的一切，爱上它，找到那些负责的人，然后参与或建立一个使之重建的组织。

如果你们想要一个榜样，就请想想蒂姆·伯纳斯-李，万维网的发明者和推动者。当伯纳斯-李产生了使用超文本形式简化互联网的想法时，他当时还是 CERN（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高能物理研究室的程序员。超文本技术使得互联网的读者可以通过简单地点击一个超文本的链接，就可以自动转移到世界任何地方的另一个页面，再无须任何那些只有怪人才搞得懂的令人烦闷的协议，只有一种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存取无缝的信息空间。

伯纳斯-李编写出了超文本转移协议（HTTP）和超文本标识语言（HTML），更重要的是，他说服了 CERN 将它们向世界发布，而没有版权、许可证或是其他任何的附加条件。这使得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而不必畏惧诉讼或付一个子儿。伯纳斯-李后来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领导着一个国际联合体，致力于将万维网保持为非专属的区域。

一路上，伯纳斯-李有无数次创始或联合创始商业性生意的机会，也无数次可以赚到成千上万美元的财富。而每次都被他拒绝了，“我想看到互联网的增殖，而不想花费我生命中的哪怕是一个小时去操心什么产品发布⁹⁴。”这是他的解释。对他而言，对公益的贡献，远比自己赚取大把的钱更重要。

作为一个公益创业者，你们的工作会比企业人士的要更加困难。因为你们是在未知的流域中行走。你们所为之寻求保护的公共权益可能缺乏财产权利，要取得这些权利可能要花费上很多年时间。事实上，你们最先要做的事，往往就是先要搞定财产权，还需要征集资金，也是足够困难的任务。

最终，你们将会在身后留下一个能够为后代保护你们所热爱的公共权益的机构。这就是对你们的成就的衡量。

律师

你们是财产权的建筑师和守护者。你们的劳务得到了私有资产拥有者的优厚酬劳。现在，你们应该为公共权益付出更多的才能了。

你们的任务是设计并保护**包容性的**资产形式，以使得尽可能多的人而不只是少数人受益。为此目的，你必须同时扮演防卫和进攻的双重角色。作为防卫，高度警惕那些从公共权益的“攫取”——这是随时都在发生的。我指的不是政府的获取，而是指企业的获取，这才是更加频发而更少被注意到的。污染就是一种攫取，噪音也是，吞噬掉短缺自然资源的租金也是。你们首要的任务是要针对这类围剿而捍卫公共利益。

你们的第二个任务——进攻的部分——是要为公共权益打造出新的财产权。可以是混合的，就像保护性地役权。发挥你们的创造性，私有的和公共的财产权常常是可以互相融合的，通过融合而使得双方都受益。使这些都成为现实，就是你们的贡献。

经济学家

作为一种思考实验，请在你们的模型中添加上公益财产权。设想它们与未来后代和所有在世的公民同等相关。再作更远一些的相关设想，想象它们对于短

缺的公共利益耗费进行控制的阀门。然后对数量、价格、收入等加以计算。如果不可能达到数字的精确，就使用重要性的级差，观察对GDP的影响，还要观察总账中**公益一侧P**的结果，以及每一代人之间、不同代人之间的权益、还有自然的权益。然后，向世界公布你们的发现。

如果建立模型不是你们的领域，那么就去做机构设计吧。信托机构应该如何组建？它们应该管理何种资产？它们应该拥有何种资产权？牢记，资产权和操作系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演变中的社会安排，你们可以对其产生影响。

宗教领袖

在美国，我们有许多种信仰，然而我们所共同认同的是：造物是神圣的，人类有责任去保护它。

如果我们作为物种对于主的赐予是负有责任的，我们最好开始去履行职责。我们当下的表现是可耻的，我们使空气污秽、砍伐森林、开采海洋还以邪恶的速率杀灭物种。一个愤怒的神会将我们统统处以死刑，而一个更温和的神也许只是将冰山融化。

可以停止对造物历史的争辩了，需要开始专注于其未来。在眼下看来，未来是严酷的。充满信心和缺乏信心的人们都必须团结起来对造物加以保护，这是迫在眉睫的世界性的任务，并且是神圣的任务。如果我们人类要起而执行其作为造物卫士的特殊角色，我们必须立即将我们的经济机器修整好。请帮忙！

政治家

所有人都需要你们的注意。第五频道在第三条线上，还有一位强势的说客已等在你的门口了。你们很难从树木之中看到森林，我能告诉你们什么呢？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在道路中央有一个岔路，一边是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

义，另一边，是其升级。你们必须决定要站在哪一边。你们的选择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意义。很可能，地球的命运以及上万亿美元的走向，就在你们的手中。我希望你们有勇气，我希望你们会选择升级。

然而，这不是向政治家说话的方式。应该这样说，我们需要降低对于外国石油的依赖，需要在美国增加工作机会，还要保护环境。所有这些都需要钱，政府没有这么多钱。但有些事情是政府**能够**做的。首先，授权给一个独立的部门——这个部门类似于联储局——由它来掌握美国碳排放的总体控制权。这样一来，当能源价格上升时（肯定会有的），就不会由你们去承担责备。并且，要确保碳管理机构必须发放红利，就像阿拉斯加永久基金⁹⁵所做的那样。于是，当支票寄达你们的选民时，你们就会得到信誉。

其次，你们在演讲中尽可以大谈工作机会与能源独立，并推动一个由出售污染许可证的收入所资助的美国永久基金。几年之内，你的选区中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安装了新的能源系统，**并且**兑现了红利支票，你将成为一个英雄。

最后，告诉你的捐助者们无须担心。你是一个低税的小政府，是付钱就做事的那种人，你认为环境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来保护，你愿意看到一个所有权的社
会，在其中每个美国人都有延迟纳税的储蓄户口，并且，没有任何孩子会被落下。

一个新时代的新型经济

21世纪不能再是20世纪的延续，因为，我们与太多的临界点已经仅仅相距咫尺了。

但如果它不是一种延续，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操作系统，因为如果我们仍固守现在的系统，就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临界点将会到来，很可能，形势将失去控制。

通向一个新的操作系统的路径并无捷径，也不清晰。我们——是我们所有人一起——需要首先对前提、然后是对一些基本的设计原则达成共识。我们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测试理论性的模型，然后根据需要进行纠错，再逐渐地扩大规模。

我在这本书中所寻求的，就是要照亮这条路径。我已经想象了一个新的操作系统，我将其命名为资本主义 3.0，尽管名称远不及内容来得重要。它涉及到我们的利己欲望与我们的集体责任之间的平衡，并涉及到如何将这些责任嵌入我们的经济操作系统。

资本主义 3.0 的尤其优越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分阶段地进行安装，在新系统安装之前，我们无须停机或删除旧的操作系统。的确，我们甚至都不会替换掉旧的操作系统的大部分内容，照原样运行就好。我们所要做的是，增添新的功能，或是即插即行的模块，能够使得转换渐进并安全地进行。以下这个公式是对此过程的描述：

企业 + 公共权利 = 资本主义 3.0

就像是詹姆斯·瓦特蒸汽机的管制部分，这些增添的部分将对我们的引擎全无抑制的过度行为加以管制。当某类弊病变得太严重时，一些新的程序就会拧紧弊病的阀门，或者授权给那些可以信任的人们来执行。如果金钱的循环太不平等，新的程序就将改变其循环，所凭借的不是收入的**再流通**，而是资产的**预流通**。当企业对于文化、社区、或是民主自身造成太多损害时，也会被给予相似的纠正。

这个新的操作系统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一旦被安装之后，就不能轻易地被拆除，因为它是基于资产权利，而不是基于随着政治潮流起伏波动的政府项目。如果你对此存有任何疑问，就请想象一下社会保险和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持续能力，这两者都为资产权的回报而定期付出收益。社会保险已有70多年的历史，未曾错过一次付款。2005年，它逃脱了一次由布什总统所领导的私有化运动。阿拉斯加永久基金也是类似的情形，它至今已有25年多的历史，还在1999年击退了欲将其部分收入转归国库的企图。

资本主义的这第三个版本是对其前两个版本逻辑的继承。在资本主义1.0中，我们经历了物品的短缺，在资本主义2.0中则是过剩，在资本主义3.0中，我们拥有了很多，但并不是太多。我们还有更多真正需要的东西——更健康的生态系统、社区和文化——以及更少的欲求。我们将在“我”和“我们”之间达到更恰当的平衡。我们需要更多的联系、更少的孤立，更多的安全和更少的焦虑。最后，我打赌，我们将会变得更加幸福。

在此征途之上，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新的交通规则。现在被私有化资本所独享的权利，将被由信托所代管的未来后代所分享，甚至是占得优先。相似的，私有财富的拥有者获取收入和继承财富的能力，也将与所有人获得类似权益的能力相匹配。我们现在所要个体面对的一些风险，例如疾病，将会被分担风险的机制所缓和，不会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

最大的改变将存在于我在第四章中所描述的第三个公式之中：**自然资源的价格不再是零**。取而代之的是，自然资源的价格——或至少是自然中那些最短缺的与最濒危的部分——将会逐步升高。这将促使企业（和消费者）将目前外部化的许多成本转为内部化，并会推动他们改变投资和消费的方式，从而逐渐减少对自然的危害。商业企业将会向清洁和可再生的能源科技投资，农民将更少地使用化

学品，本地生产的食品将会比远方生产的食品更具有竞争力。消费者会从驾驶大量排放废气的汽车转为使用更经济的交通工具，也会因此而更减少横冲直撞。人们会从远距离的郊区迁移到小镇和大城市去居住。

然而，并非所有东西都要改变。市场上的赢家依旧可以享有特权。政府不会过度限制我们的生活或生意。没有人的私有资产会被侵犯，市场仍然充满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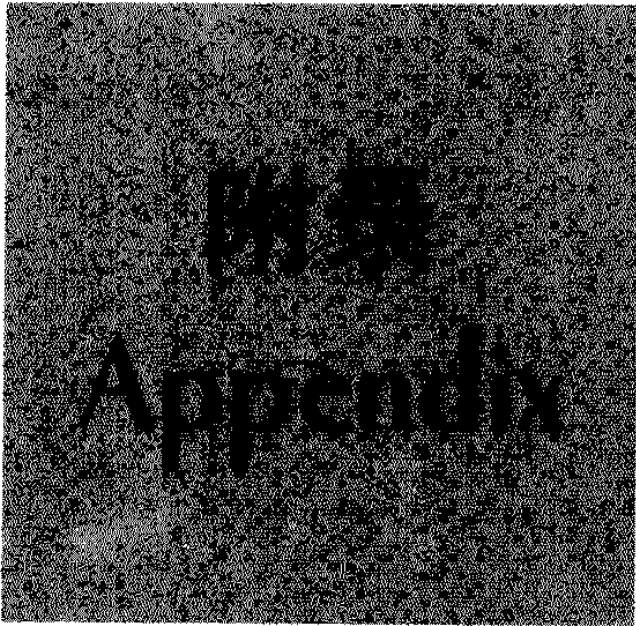
并且，对商人来说，最棒的部分就是：资本主义 3.0 将会继续保持利润最大化这个美国资本主义驱动力的公式。其好处不仅是单纯地保留了公式，而是由于通过美国永久基金使所有的美国人都分享到了成功。所有美国人都将从自然资源的健康与企业的健康运行中**同时**受到益处。

资本主义 2.0 拥有其光荣时代，它平衡了国家之间的贸易边界，并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物质丰富。但是与它的辉煌伴随的是巨额的欠账，债务现在已经要到期了。

也许我们应将我们自己想象为一个快要破产的公司，我们付不起所有的账单，但可以偿付其中一部分，尤其是当我们真的想要延期付款的期限的情形下，我们有时可以选择用权益来偿付债主。无论如何，我们需要重组我们的经济，从而使得我们不会在未来再陷入同样的债务。这就是资本主义 3.0 的作用。

但是资本主义 3.0 还有一个更高远的目标：要同时去帮助资本主义和人类，来实现两者的最大潜能。为此，我们的经济机器必须停止对公共权益的损害，并开始对其加以保护；同时，它必须更快地提升在底层的 95% 的人类，要更快于顶层的 5% 的人的提升速度。这需要的远不止于热情的词藻，或是包裹破损边缘的几条绷带。它所要求的是升级我们的操作系统。

我希望本书已经对如何实施作出了阐述。那绝不可能是容易的，但我们**能够**做到。我们拥有知识和财富，唯一需要的，是意志。



企业、国家与公共部门的关键特征

	企业	国家	公共部门
关键功能	制造；追求短期利润	定义，分配， 平衡权利	分享赠予， 并为人类后代加以保护
关键机构	企业；工会	立法机关，执法法官	生态信托，永久基金， 开放使用公共权益， 跨代契约，社区公益
关键角色	董事	政治家	信托
对……负责	股东	选民（捐助者）	平等地对后代人类， 在世公民，非人类生物， 以及社区负责
驱动公式	利润最大化； 对现存股东分派收益	赢得最多选票 (募集最多的钱)	保护资产；花费收入而 不耗费股本；遵守审慎 原则；愈多受益者愈好。
时间范围	下个季度	下届选举	下一代人
拥有权制度	每股一元	每人一票 (每票一元)	每人一股
可以转移拥有权	可以	选举权：不可以 资产：可以	享益权：不可以 使用权：可以
根据……来源	自愿购买	税收	自愿使用
根据……流向	股权	政治权利	平等拥有权力

斜体内容并非以法律规定，而为事实。

注释

序：

1. 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公共权益的悲剧》，《科学》，1968，162，1243-1248。
见以下网址 www.sciencemag.org/sciext/sotp/commons.dtl。
2. 描述了一个经济体系：E.F.舒马赫，《小即是美》（纽约：HarperCollins，1973年）。

第一章：升级之时已至

3. 被危及的人类文明：杰拉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坠落或成功》（纽约：Benguin Books，2005）；罗纳德·莱特，《进步简史》（纽约：Carroll & Graf，2004）。
4. “一个理性的牧人认为……”：哈丁，《公共权益的悲剧》，1244。这篇文章发表25年之后，哈丁解释说他在1968年所说的话意思是：“一个‘有管理的公共权益’所指的是社会主义，或是私有化的自由企业，这两者都可能有效，也都可能失败：‘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但是对一个没有管理的公共权益，你就甭想什么魔鬼了：因为过度资源耗费将减少存量，毁灭是注定的。”（《科学》，1998年5月1日，p.683。）我并不认为这个“说明”是有意义的，如果一个“没有管理的公共权益”是注定自我毁灭的，而“有管理的公共权益”的定义是社会主义或私有制，留给我们的就还是只有三个选择：悲剧，专制或私有化。在本书中我描述了四种选择：信托制。参见网址：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280/5364/682。
5. 回路：因为某些原因，科学家们将善意的回路称为负，而恶意的回路为正。我是用了更具说明力的形容。
6. 两个关键机制：这是瓦特控制装置的工作方式，当引擎加速时，主轴的转动加快，离心力就将链臂上的两个飞轮（flyballs）升起来。这个运动使得进气阀门变小，从而使引擎慢下来。现代类似装置包括热水器的温度调节启闭装置，厕所的冲水阀门，还有汽车的自动巡航控制等等。
7. 一次性企业家的回答：西奥多·瑟斯·盖则耳，《劳来克斯》（纽约：Random House，1971）。

第二章：资本主义简史

8. “因为，劳动力是劳动者的无可置疑的财产”： 约翰·洛克，《政府二论文》(印安纳波利斯：Hackett, 1980 [1690 初次印刷])， 五章， 27 节。
9. 时代的巨大变迁： 卡尔·波拉尼，《大变迁——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0 [1944 年初版])。
10. “通过建立土地资产拥有资产体系……”： 托马斯·佩因，《地权公正》(<http://geolib.pair.com/essays/paine.tom/agjst.html> [originally published 1797])， i04, i05, 22 and 23 节。
11. “国会要制定一个巨大的企业福利项目是毫无道理的……”： 鲍勃·多尔关于免费赠送波长的讲话可见于 www.anu.edu.au/mail-archives/link/link9601/0035.html， 也可见于 1996 年六月号《读者文摘》中拉尔夫·金尼·贝内特的撰文《电波大赠送》。
12. “如果你从他人的钱包里偷了 10 块钱……”： 沃尔特·希克尔，《公共权益的危机：阿拉斯加的解决方案》(Crisis in the Commons: The Alaska Solution) (Oakland, Calif.: ICS Press, 2002), p.217.。
13. “大不列颠或美国的企业还只是寥寥可数”： 亚当·斯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2 [originally published 1776])。
14. “企业即是‘法人’”： 最高法院关于企业的人格见于对 Santa Clara County v. 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 的裁决， 118 U.S. 394 (1886)。
15. 财富 500 强企业的销售额： 我对财富杂志的网站的数据(收费)进行计算而得出。见 See [http:// 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500_archive/full/1955/index.htm](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500_archive/full/1955/index.htm)。
16. “变化如此巨大……”：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富裕社会》(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p.2.。
17. “我们若想在晚餐时享用更多的鱼……”： 见 www.worldchanging.com/archives/004143.html。
18. 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 我高兴地注意到， 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所使用的两阶段理论与我的理论有相似之处。戴利的专注点在于人类经济的领域， 他在“空虚的世界”与“丰满的世界”之间划分了界限， 在前者， 自然资源是丰富的， 而在后者， 自然资源是短缺的。
19. 可能导致的后果包括……：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 综合报告》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5), p. 1。

20. **二氧化碳却占到了总排放量的30%**：自1451年起的燃油与水泥生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综合相当于2900亿吨；（参见：http://cdiac.ornl.gov/trends/emis/tre_glob.htm），美国自1800年的历史排放量是840亿吨，（参见：<http://cdiac.ornl.gov/ftp/trends/emissions/usa.dat>）；于是，美国对于污染的影响份额是29%。
21. **福利使得穷人更穷**：查尔斯·默里，《失地：1950至1980的美国社会政策》（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22. **大多数成熟企业的财务增长来自其保留的盈余与债务**：马乔林·凯利，《资本的神圣权利》（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2001），p. 33。
23. **1983年至1998年之间在美国股市上总增值的一半，都流向了顶层的那1%的人群**：爱德华·N.沃尔夫，“富人更富”，见于2001年2月12日《美国展望》，www.prospect.org/print/V12/3/wolff-e.html。
24. **综合社会调查**：理查德·莱亚德，“幸福：社会科学有线索吗？”2003年3月3日至5日，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的莱昂内尔·罗宾斯纪念演讲。<http://cep.lse.ac.uk/events/lectures/layard/RL030303.pdf>。
25. **3000个这类的信息**：迈克尔·布劳尔与沃伦·莱昂所著的《高效环境选择的消费者指南：来自相关科学家联盟的实用建议》（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1999）。www.ucsusa.org/assets/documents/ucs/CG-Chapter-1.pdf。

第三章：政府的局限

26. **国有化与私有化**：哈丁，《公共权益的悲剧》。
27. **制定法规的机构**：理查德·波斯纳所撰“经济法规的理论”。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Autumn 1974; George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Spring 1971; Gabriel Kolko,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8. **200多位是前参议员**：小罗伯特·F.肯尼迪，《对自然的犯罪：乔治·W.布什与他的国会伙伴们是如何掠夺国家绑架民主的》（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p. 32。
29. **MBNA……用于游说**：考特尼·马比乌斯，“Big Donors Go for Broke with Bankruptcy

- Bill, " Bankruptcy Reform News, Mar. 4, 2005. www.bankruptcyfinder.com/article%20folder/bigdonors2005.html。
30. **“最具影响力的集团”**: 阿力克斯·诺特,《特别报告: 超过100亿的产业影响网》(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2005)。
31. **此类事例**: 菲利普·申农, "Lobbying Campaign Led by Credit Card Companies and Banks Nears Bankruptcy Bill Goal," *New York Times*, Mar. 13, 2001。
32. **葛兰素威康制药公司……**: 吉姆·德林卡德, "Drugmakers Go Furthest to Sway Congress," *USA Today*, Apr. 26, 2005。
33. **广播业花费**: 凯文·菲利普斯, *Wealth and Democrac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ich*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2), p. 326。
34. **税收来保护自然资源**: 阿瑟·皮古,《福利经济学》(London: Macmillan, 1920)。
35. **联邦储备委员会**: 见 www.federalreserve.gov/bios/default.htm。
36. **“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隐藏着现金流以及投资回报的真相……”**: 萨利·菲尔法克斯, *Lessons for the Forest Service from the State Trust L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1999), Discussion Paper 99 – 16, pp. 22 – 23. www.rff.org/Documents/RFF-DP-99-16.pdf。
37. **阿拉斯加州不得以此方式歧视新居民**: *Zobel v. Williams*, 457 U.S. 55, 1982。
38. **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 肖恩·巴特勒, "生活, 自由, 还有一点现金", *Dissent*, Summer 2005. 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ticle=211。

第四章: 私有化的局限

39. **“单一目标底线的好处在于……倒不如说是会造成混乱。”**: 克莱夫·库克的文章“好公司”, 发表于《经济学人》杂志, 2005年1月20日。
40. **赫维茨**: 内德·戴利的文章《劫掠红树林: 查尔斯·赫维茨, 迈克尔·米尔肯, 以及贪婪的代价》, 发表于 *Multinational Monitor*, 1994年9月。
41. **运营资产公司**: 《关于美国具有社会责任的投资动向的报告》(华盛顿特区2005年社会投资论坛)。
42. **财富500强中90%的企业……是不会去反噬给他们喂食的手的**: 保罗·霍肯的文章“你的钱是否与你的心同在? SRI共同基金的真相。” *Common Ground*, Oct. 2004, p. 14。

43. **股东干预**：《关于美国具有社会责任的投资动向的报告》。
44. **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论**：罗纳德·科斯的的文章《社会成本的问题》，见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 1960, pp. 1 – 44. www.sfu.ca/~allen/CoaseJLE1960.pdf。
45. **在科斯的模型中，污染是污染者与被污染者双方的问题**：肯尼迪所著《对自然的犯罪》，p.190。

第五章：再造公共权益

46. **私有财富**：《2006年美国统计摘要》2006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2006), Table 703. www.census.gov/prod/2005pubs/06statab/income.pdf。
47. **生态系统服务**：罗伯特·科斯坦萨与保罗·萨顿所撰文章“Global Estimates of Market and Non-Market Values Derived from Nighttime Satellite Imagery, Land Cover, 和 Ecosystem Service Valuation,” 发表于《*Ecological Economics*》2002年六月刊, p. 509—527。
48. **互联网 (Internet) 对于美国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衡量互联网经济》(Austin: Cisco System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Jan. 2001). www.momentumresearchgroup.com/downloads/reports/internet-indicators-2001.pdf。
49. **非营利性的文化活动也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成百上千亿美元的价值**：《艺术与经济繁荣：非营利艺术组织与其观众的经济影响力》(Washington, D.C.: Americans for the Arts, 2002). <http://pubs.artsusa.org/library/ARTS095/html>。
50. **“充足的与良好的”**：洛克，《*Second Treatise*》。

第六章：造物之信托

51. **“主将其土地与生命物种交付给我们的第一代先祖，那责任又传递到我们手中。”**：引自2004年《*An Evangelical Call to Civic Responsibility*》。
52. **“在路口……”**：《加州司机手册》(Sacramento: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2006), p. 16. www.dmv.ca.gov/pubs/dl600.pdf。
53. **资本的权利凌驾于所有其他之上**：凯利，《*资本的神圣权利*》。
54. **是各种社会选择了它们的掌权者**：再对驾驶规则的例子加以展开：在20世纪，有30个国家改变了道路的驾驶方向（几乎全部都是从左侧改为右侧）。正如选择主流的资产权，选择驾驶方向也是一个社会的选择，并且，社会是可以改变主意的。

55. **农夫 vs. 濒危的鱼**：Juliet Eilperin 所撰 “Water Rights Case Threatens Species Protection, Washington Post, Dec. 7, 2004, p. A18。
56. **Trebah 花园信托**：关于 Trebah 花园的更多信息，见 www.trebahgarden.co.uk。
57. **信托**：受信托者的责任描述，见 www.trustland.org/about/responsibilities.cfm。
58. **“一个信托人所须信守的……？”**：1928 年，卡多萨在出席纽约上诉法庭的 *Neinhard v. Salmon* (249 N.Y. 458) 一案时，作出关于信托的信托职责的阐述。
59. **世界范围的信托机构**：关于英国全国信托的信息，参见 www.nationaltrust.org.uk，关于自然保护，参见 www.nature.org，关于美国的其他土地信托，参见土地信托联盟 (Land Trust Alliance) 2003 年全国土地信托普查，www.lta.org/censur/。
60. **二氧化碳使用**：彼得·巴恩斯，《谁拥有天空？我们的公共资产与资本主义的未来》(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1)。
61. **“让我们假设……”**：科斯，“社会成本的问题”，p.2。
62. **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New York: Cosimo Classics, 2005 [originally published 1880])。
63. **公益物品，vs. 公共物品**：我必须承认，尽管我非常喜欢公共物品，但我不喜欢以公共权益的租金来资助公共物品的主义。我认为，公共权益的租金应被分配给其拥有者，就像企业收入的分配一样，并且，所有的个人收入，无论其来源，都应课以渐进的税率，而税收则用在公共物品之上。将公共权益的租金转移到公共物品，实际上是对穷人的隐性税收，并又是对富人的一份礼物。
64. **选举人可以“炒掉”选出的官员**：参见《联邦制文件》10号，“联邦作为针对国内宗派与暴乱的保护，” *New York Packet*, 1787年11月23日。这个文件讨论了宗派的危险性，以及如何设计宪法使其能通过核查调整而减轻风险。

第七章：共同的生存权利

65. **“目的不是保证……”**：乔治·威尔，“美元领域”，*Washington Post*, Feb. 28, 1999, p. B7。
66. **再流通 vs. 预流通**：约翰·罗尔斯，《公正的一种理论》(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67. **减少污染 = 更多收入**：此刻，联邦政府与几个州正在向企业污染者发放免费使用大气层的许可证。政客们竟能够以共享的自然资源制造出新的资产权，并将这些宝贵的资产给

予少数的企业，这实在是令人震惊，然而，他们真就这么做了。

68. “无论其业主是否在该物业居住……”：关于 1787 年西北法规的内容，参见 www.historicaldocuments.com/NorthwestOrdinance.htm。引文自第二节 (section 2.)。
69. **40% 最贫困家庭的儿童将得到 880 英镑，信托基金的全部所得统统免税**：关于英国“孩子债券 (Baby bonds)”，参见“出生伊始的储蓄：孩子债券是一个伟大的理想”，*The Guardian*, Apr. 11, 2003. <http://society.guardian.co.uk/publicfinances/comment/0,,934537,00.html>。并见于斯图尔特·怀特所编著的《公民的权益：未来共同资产政策的探究》(Bristol, U.K.: Policy Press, 2006)。
70.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就意味着对于机会的源泉的负债。”：对老比尔·盖茨的引言取自 2003 年 1 月 14 日城市学院举行的一个论坛。并可参见 <http://taxpolicycenter.org/publications/template.cfm?PubID=8248>。
71. **美国的健康保险**：关于肥胖、糖尿病，以及抑郁症等的信息，参见 www.newstarget.com。关于美国的健康保险覆盖率，参见《美国的收入、贫困、与健康保险覆盖率：2003 年》(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Aug. 2004), p. 14. www.census.gov/prod/2004pubs/p60-226.pdf。关于美国与加拿大的健康保健成本，参见 Paul Krugman 所撰文章 “The Medical Money Pit,” *New York Times*, Apr. 15, 2005, op ed page。
72. **人均花费**：Stephen Heffler, Sheila Smith, Sean Keehan, Christine Borger, M. Kent Clemens and Christopher Truffer, “U.S. Health Spending Projections for 2004—2014,” *Health Affairs*, Feb. 23, 2005。
73. **花费于行政成本的百分比**：Steffie Woolhandler, Terry Campbell, and David Himmelstein 的文章《美国与加拿大医疗保健的行政成本》，*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Aug. 21, 2003。
74. **平均寿命**：CIA World Factbook, 2006, 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第八章：文化共享

75. **公共领域**：关于安妮王后法案，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atute_of_Anne。关于公共区间的更多信息，参见杜克大学法律学院的公共区间研究的网址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ublic Domain at Duke Law School) www.law.duke.edu/cspd/index.html。

76. **公共领域**: 保罗·斯塔尔,《媒体的塑造》(New York: Basic Books), p. 118。
77. **“我们的精神环境……”**: 凯利·拉森,《文化塞车: 美国的热症》Culture Jam: The Uncool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9), p. 13。
78. **“感觉不间断地经受着广告和营销的狂轰滥炸”**: 斯图尔特·艾利奥特,《广告效率的新调查》, New York Times, Apr. 14, 2004。
79. **电视广告的时间加以限制**: 加利·莱文,“过度广告使观众离开”, USA Today, Oct. 12, 2005. www.usatoday.com/printedition/life/20051012/d_cover12.art.htm。
80. **电波波段的私有化**: 关于洛威尔·帕克森的引言, 参见 www.tvtechnology.com/features/Bigpicture/f-FB-DTV.shtml。
81. **“当我们在享受着……”**: 关于本杰明·弗兰克林的引言, 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klin_stove。
82. **消费者的药品成本**: 迪恩·贝克,《智慧资产的改革》,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July 2005. www.paecon.net/PAERreview/issue32/Baker32.htm。

第九章：建立公共权益部门

83. **土地信托**: 关于 Dudley Street Neighborhood Initiative。参见 www.dsni.org。
84. **地表水权**: 关于 Oregon Water Trust。参见 www.owt.org。
85. **波特兰公共场地**: 关于波特兰街道路口的更多信息, 参见 <http://cityrepair.org/about.html>。
86. **布鲁克林时间银行**: 关于布鲁克林老年人计划与“时间银行”的更多信息, 参见 www.timedollar.org/。
87. **二氧化碳的排放许可证**: 关于 the Vermont law, the Massachusetts bill, and Spitzer's statement, 参见 www.massclimateaction.org/RGGI/RGGI.htm。
88. **大气层是公共资产**: 参见 www.rggi.org/。马克·贝斯洛的引言, 参见 www.rggi.org/docs/mcc_auctions_letter.pdf。
89. **问题是缺氧**: 关于密西西比盆地与水域缺氧, 参见 www.epa.gov/msbasin/。
90. **水牛公益**: 见 Frank and Deborah Popper 的文章, “The Great Plains: From Dust to Dust,” Planning, Dec. 1987. www.planning.org/25anniversary/planning/1987dec.htm。
91. **波段许可证的市场价值**: 关于免费发放给广播公司的公共波段的市场价值估计, www.

new-america.net/index.cfm?sec=programs&pg=spectrum_direct&bg=blk&continue=yes&X_TRANTYPE=download。下载新美国基金会的《波段的公民指南》。

92. **合同与衔接：**关于合同与衔接的信息，参见 London-based Global Commons Institute 的网址 www.gci.org.uk/main.html。
93. **一个全球大气信托：**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于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签订。有人认为该条约为二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

第十章：你可以做的事

94. **“我想看到互联网的增殖……”：**蒂姆·伯纳斯-李，《Weaving the Web》(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1999), p. 84。
95. **像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所做的那样：**1998年，阿拉斯加预算出现赤字，立法者试图染指永久基金，而不是提高税率或削减支出。然而，在随后的公民复决中，选民们以84比16拒绝了该提案，政客们就此放弃。“选民们大声地说出，决‘不’！” *Anchorage Daily News*, Sept. 15, 1999, p. A1。

互联网资源指南

托马尔斯湾研究所 Tomales Bay Institute

由托马尔斯湾研究所主办的 (www.onthecommons.org)，是关于公益理想与评论的整体最棒的网站。

公共知识 Public Knowledge

一方面提倡在艺术家、作家与其他文化创造者的权利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倡导在文化公共权益的公众权利。 (www.publicknowledge.org)

创造性公共权益 Creative Commons

如果你的写作、电影制片、摄影、或录音等等是为了出版的目的，创造性公共权益为你提供的许可，可以保护你作为作品创造者的部分权利，但将其他权利与公众分享。具体的分成取决于你 (<http://creativecommons.org>)，科学家们也许对另一个网站有兴趣 (<http://sciencecommons.org>)，其中针对的是学术方面的类似问题。

土地信托联盟与太平洋森林信托

Land Trust Alliance and Pacific Forest Trust

土地信托联盟可以帮助你找到在你的地区运作的土地信托机构，并向会员信托机构提供关于如何更有效地为未来后代保护土地的培训 (www.lta.org)。寻找对役用期森林（那些仍适用于砍伐的森林）进行保护的读者，将会在由太平洋森林信托的森林管护网站中找到有用的信息。 (www.pacificforest.org)

美国社区花园协会

American Community Gardening Association

想要在你的邻里开始建立一个社区花园吗？美国社区花园协会的网站可以提供帮助。 (<http://communitygarden.org>)

城市修复项目 City Repair Project

城市修复项目专门从事在城市环境中创建公共交际场地,其网站包括了激发想象的例子,以及与全国各地从事相似工作的群组的链接。(www.cityrepair.org)

数字民主中心 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

数字民主中心,为保持并扩展在互联网上免费的多样性资源而战。(www.democraticmedia.org)

时间元 Time Dollars

社区公益可以通过交换对邻里帮助的时间而得到自我发展。“时间元”已建立了一个记录这类贡献的系统。(www.timedollar.org)

公共区间 Public Spaces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公共区间项目一直在帮助城市和社区创建富有活力的公共区间。它的网站(www.pps.org)所拥有的关于帮助人们相互联系的公共区间的多种方式的图片,令人惊叹。

全球大气公共权益 Global Atmospheric Commons

位于伦敦的全球公益机构,是人均共享全球大气公益的首要倡导者。在其网站(www.gci.org.uk)上,有关于“合同与衔接”概念的精确解释。

提醒

请谨防假冒!有些自诩与公益有关的组织,其实与本书中所描述的公益管理方式与保护都没什么相关。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公益:自由市场保护环境”(The Commons: Free Markets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的博客,它对于不受约束的过度企业行为视而不见(www.commonsblog.org)。稍微不同方式的还有生态权益。(EcoEquity, www.ecoequity.org)

参考文献索引

关于资本主义、公共权益以及经济理论的著作数不胜数。以下我所列举的，是我引用了其内容，或是对我的思考产生了重大贡献的书目。参考的文章已在注释部分加以说明。

Ackerman, Bruce, and Anne Alstott. *The Stakeholder Societ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garwal, Anil, Sunita Narain, and Anju Sharma. *Green Politics: Global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s*. New Delhi: Centre for Science and the Environment, 1999.

Alperowitz, Gar. *America Beyond Capitalism: Reclaiming Our Wealth, Our Liberty, and Our Democracy*. New York: Wiley, 2005.

Anderson, Terry, and Donald Leal. *Free Market Environmentalism*. San Francisco: Pacific Research Institute, 1991.

Ashworth, William. *The Economy of Nature: Rethink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Ecology and Econom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5.

Athanasiou, Tom. *Divided Planet: The Ecology of Rich and Poor*. Boston: Little Brown, 1996.

Baden, John, and Douglass Noonan (eds.). *Managing the Comm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Bakan, Joel. *The Corporation: The Pathological Pursuit of Profit and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Baker, Dean, and Mark Weisbrot. *Social Security: The Phony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Barlow, Maude, and Tony Clarke. *Blue Gold: The Fight to Stop the Corporate Theft of the World's Water*.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Barnes, Peter. *Who Owns the Sky? Our Common Assets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1.

- Berners-Lee, Tim. *Weaving the Web: The Original Design and Ultimate Destiny of the World Wide Web*.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 Bollier, David. *Silent Theft: The Private Plunder of Our Common Wealth*.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Bollier, David. *Brand Name Bullies: The Quest to Own and Control Culture*. New York: Wiley, 2005.
- Boyce, James (ed.). *Natural Assets: Democratizing Environmental Ownership*.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3.
- Brown, Peter. *Restoring the Public Trust: A Fresh Vision for Progressive Government in America*.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 Brown, Peter. *The Commonwealth of Life: A Treatise on Stewardship Economics*.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01.
- Buck, Susan. *The Global Common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8.
- Cavanagh, John, and Jerry Mander (eds.). *Alternativ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 Better World Is Possible*.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2002.
- Coase, Ronald.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Collins, Chuck (ed.). *The Wealth Inequality Reader*. Cambridge, Mass.: Economic Affairs Bureau, 2004.
- Collins, Chuck, and Felice Yeskel. *Economic Apartheid in America: A Primer on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Security*.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 Daily, Gretchen (ed.). *Nature's Services: 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7.
- Daily, Gretchen, and Katherine Ellison. *The New Economy of Nature: The Quest to Make Conservation Profitable*.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2.
- Dales, J. H. *Pollution, Property and Pric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8.
- Daly, Herman (ed.). *Economics, Ecology, Ethics: Essays Toward a Steady-State Economy*. San Francisco: Freeman, 1980.
- Daly, Herman. *Beyond Growth*. San Francisco: Freeman, 1997.

- Daly, Herman, and John Cobb, Jr. *For the Common Good*.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 Daly, Herman, and Joshua Farley. *Ecological 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3.
- Darley, Julian. *High Noon for Natural Gas: The New Energy Crisis*.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Press, 2005.
- De Graaf, John (ed.). *Take Back Your Time*.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2003.
- Diamond, Jare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 The Ecologist. *Whose Common Future? Reclaiming the Commons*. Gabriola Island,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3.
- Fairfax, Sally, and Darla Guenzler. *Conservation Trust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1.
- Fairfax, Sally, and Jon Souder. *State Trust Lands: History,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Use*.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6.
- Foster, John Bellamy.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4.
- Freyfogle, Eric. *The Land We Share*.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3.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 Gates, Bill Sr., and Chuck Collins. *Wealth and Our Commonwealth: Why America Should Tax Accumulated Fortunes*. Boston: Beacon Press, 2003.
- Geisel, Theodor Seuss. *The Lorax*.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 Geisler, Charles, and Gail Daneker (eds.). *Property and Values: Alternatives to Public and Private Ownership*.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0.
- Gelbspan, Ross. *The Heat Is On: The Climate Crisis, the Cover-Up, the Prescrip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7.
- George, Henry.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Robert Schalkenbach Foundation, 1966. (Originally published 1880)

- Gladwell, Malcolm. *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2000.
- Glennon, Robert. *Water Follies: Groundwater Pumping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Fresh Water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3.
- Glover, Linda, and Sylvia Earle (eds.). *Defying Ocean's End*.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4.
- Gore, Al. *Earth in the Bala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 Greider, William. *The Soul of Capitalism: Opening Paths to a Moral Econom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3.
- Hammond, Jay. *Tales of Alaska's Bush Rat Governor*. Fairbanks: Epicenter Press, 1996.
- Hardin, Garrett. *Nature and Man's Fat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9.
- Harris, David. *The Last Stand: The War Between Wall Street and Main Street Over California's Ancient Redwoods*.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7.
- Hartmann, Thom. *Unequal Protection: The Rise of Corporate Dominance and the Theft of Human Rights*. Emmaus, Penn.: Rodale Press, 2002.
- Hawken, Paul.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 Hawken, Paul, Amory Lovins, and L. Hunter Lovins. *Natural Capitalism: Creating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99.
- Heal, Geoffrey. *Nature and the Marketplace: Capturing the Value of the Ecosystem*.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2000.
- Heilbroner, Robert.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1987.
- Heilbroner, Robert.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 Heinberg, Richard. *The Party's Over: Oil, War and the Fat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Gabriola Island,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5.
- Hickel, Walter. *Crisis in the Commons: The Alaska Solution*. Oakland, Calif.: ICS Press, 2002.
- Hill, Peter, and Roger Meiners (eds.). *Who Owns the Environmen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 Hyde, Lewis. *The Gift: Imagination and the Erotic Life of Proper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 Kelly, Marjorie. *The Divine Right of Capital*.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2001.
- Kennedy, Robert F. Jr. *Crimes Against Nature: How George W. Bush and His Corporate Pals Are Plundering the Country and Hijacking Our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 Keynes, John Maynard.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3. (Originally published 1930)
-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8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6)
- Korten, David.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1995.
- Korten, David. *The Post-Corporate World: Life After Capitalism*.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2002.
- Kunstler, James Howard. *The Long Emergenc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5.
- Kuttner, Robert. *Everything for Sale: 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 New York: Knopf, 1997.
- Lasn, Kalle. *Culture Jam: The Uncool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9.
- Layard, Richard. *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 Leopold, Aldo.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Lessig, Lawrence. *The Future of Ideas: The Fate of the Commons in a Connected Worl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 Lessig, Lawrence. *Free Culture: How Big Media Uses Technology and the Law to Lock Down Culture and Control Creativi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 Linden, Eugene. *The Future in Plain Sight: Nine Clues to the Coming Instabil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 Locke, John.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0. (Originally published 1690)
- Lovelock, James. *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Lovelock, James. *Healing Gaia: Practical Medicine for the Planet*. New York: Crown, 1991.

- Marsh, George Perkins. *Man and Nature*. New York: Scribner's, 1882.
- Mayer, Carl, and George Riley. *Public Domain, Private Domain: A History of Public Mineral Policy in America*.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85.
- McKibben, Bill. *The End of Na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 McNeil, J. R.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 Meadows, Donella,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 Meadows, Donella, Dennis Meadows, and Jørgen Randers. *Beyond the Limits*.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Press, 1992.
-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Synthesis Report*.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5.
- Monbiot, George. *Manifesto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New Press, 2004.
- Murray, Charles.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 – 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 Nordhaus, William D. *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 The Economics of Chan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4.
-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Ostrom, Elin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Parker, Richard.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 Phillips, Kevin. *Wealth and Democrac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ich*.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2.
- Pigou, Arthur C.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20.
-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0. (Originally published 1944)
- Ponting, Clive.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 Porritt, Jonathon. *Capitalism As If the World Matters*. London: Earthscan/James & James, 2005.

-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Roodman, David Malin. *The Natural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 Rothschild, Michael. *Bionomics: The Inevitability of Capitalis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90.
- Ruskin, John. *Unto This Las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 (Originally published 1860)
- Sachs, Wolfgang. *Planet Dialectics: Explorations i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2000.
- Scherf, Judith (ed.). *The Piracy of America: Profiteer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Atlanta: Clarity Press, 1999.
- Schor, Juliet.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 Schor, Juliet. *The Overspent American: Why We Want What We Don't Ne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 Schumacher, E. F.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73.
- Schweickart, David. *After Capitalis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 Shanks, Bernard. *This Land Is Your Land*.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84.
- Sherraden, Michael. *Assets and the Poor: 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 Shiva, Vandana. *Biopiracy: 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1997.
- Shiva, Vandana. *Water Wars: Privatization, Pollution, and Profit*.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2.
- Shiva, Vandana. *Earth Democracy: Justice, Sustainability,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5.
- Shulman, Seth. *Owning the Futu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 Simms, Andrew. *Ecological Debt: The Health of the Planet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2. (Originally published 1776)
-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00. (Originally published 1759)
- Steinberg, Theodore. *Slide Mountain: The Folly of Owning N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Stone, Christopher. *Should Trees Have Standing? Toward Legal Rights for Natural Objects*. Los Altos, Calif.: William Kaufman, 1974.
- Stone, Christopher. *Earth and Other Ethic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7.
- Stone, Christopher. *The Gnat Is Older Than Man: Glob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Agend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uzuki, David. *The Sacred Balance: Rediscovering Our Place in Nature*.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98.
- Swann, Robert. "Land: Challenge in Opportunity." In William Vitek and Wes Jackson (eds.), *Rooted in the 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Tudge, Colin. *The Time Before History: 5 Million Years of Human Impac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 Washburn, Jennifer. *University, Inc.: The Corporate Corrup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s, 1958. (Originally published 1904)
- White, Stuart (ed.). *The Citizen's Stake: Exploring the Future of Universal Asset Policies*. Bristol, U.K.: Policy Press, 2006.
- Wilson, E. O. *The Diversity of Lif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 Wright, Ronald. *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New York: Carroll & Graf, 2004.

关于作者

彼得·巴恩斯是一位企业家和作家，他创建并领导了多个成功的公司。如今，他是位于加州 Point Reyes Station 托马斯湾学院的资深研究员。

巴恩斯在纽约市长大，并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学士，与乔治敦政府颁发的管理学硕士的学位。巴恩斯以马赛诸塞州的 The Lowell Sun 记者的身份开始了他的事业，后来又成为新闻周刊 (Newsweek) 驻华盛顿的记者，以及新共和杂志报 (The New Republic) 的驻西海岸记者。

1976年，他在旧金山创建了一个由员工集体拥有的太阳能能源公司，并于1983年共同创建了运营资产资金，后来又担任过运营资产长话公司的总裁。1995年，他被授予北加州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称号。

巴恩斯曾担任过众多公司和机构的董事或理事，其中包括国家合作银行 (the National Cooperative Bank)，加州州立能源辅助基金 (the California State Assistance Fund for Energy)，加州太阳能工业协会 (California Solar Industry Association)，社会责任企业 (Businesse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彩虹劳工协作组织 (意译: the Rainbow Workers Cooperative)，Techmar, Redefining Progress)，预防家庭暴力基金 (the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Fund)，公共传媒中心 (Public Media Center)，关掉电视网络 (TV-Turnoff Network)，噪音污染清洁屋 (the Noise Pollution Clearinghouse)，绿色和平国际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加州税法改革协会 (the California Tax Reform Association)，以及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他在本书之前，还著有：《典当：公民战士的困境》(The Plight of the Citizen-Soldier, Knopf, 1972)，《人民的土地》(The People's Land, Rodale, 1975)，以及《谁拥有天空？我们的公共资产与资本主义的未来》(Who Owns the Sky? Our Common Assets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Island Press, 2001)。他所撰写的文章被广泛发表于《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旧金山时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美国瞭望》(The American Prospect)，《Utne Reader》，以及其他各地的报刊。

1997年，他创建了 Mesa Refuge，一个位于北加州的作家休养场所。他有两个儿子，扎卡里 (Zachary) 和伊莱 (Eli)，还有一位伴侣科妮莉娅·达兰特 (Cornelia Durrant)，以及一条狗——烟儿 (Smoky)。

本书电子版本的说明

关于本书的创造性公益的电子版权的说明

包含本书英文版全部内容与图表的电子版本，可以从 <http://www.onthecommons.org> 免费下载。本著作的电子版的版权是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2.5 License（包含某些限制）。查阅此版权许可的内容，参见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2.5/>，或致函以下地址：Creative Commons, 543 Howard Street, 5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4105, USA.

一个驾驭资本主义并保护社会公共财富的新操作系统

■ 国内评价

题目很宏大：关系到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结论很“简单”：建立公共权益信托机构，以人类后代和人类以外的物种为信托利益方。

——**吴士宏** 公益活动家，前IBM、微软、TCL集团高管

读了彼得·巴恩斯的《资本主义3.0》，我有一种梦想成形的感觉。……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

——**吴思** 著名学者

无论3.0版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现实能否出现，这一设计已经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创见的奇书，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蒙或启示作用。

——**杨东平** 著名学者

所谓的资本主义3.0升级版，就是“企业+政府+公益信托组织”。作者的主要贡献，在于发现了公益信托的经验和原则对环境保护及升级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意义。

——**杨鹏** 著名学者

■ 国际评价

这是一本危险的书——它将带来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也是一本保守的书——它能够将资本主义从其自身的悲剧性缺陷中拯救出来。每个有思想的公民都应阅读此书。

——**弗朗西斯·穆尔·莱普** “正直生活奖”获得者，《一座小行星的食谱》和《民主边缘》的作者

彼得·巴恩斯，运营资产公司的合伙创始人，他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主张：资本主义3.0。这个版本的资本主义可以拯救地球，可以重新修正财富的众多不平等，并且可以讨回公共权益——我们的空气、我们的水、我们的电波波段以及更多。这是你从未见过的资本主义，先来一睹为快吧！

——**乔治·莱科夫** 认知语言学的奠基人，《别对大象有看法》和《谁的自由？》的作者

在《资本主义3.0》中，巴恩斯以直言不讳与非冲动的方式对公共权益进行了设计。本书对于一个一个重要命题而言必不可少的。

——**比尔·麦吉本** 美国著名环保人士，《自然的末日》的作者

阅读《资本主义3.0》好似戴上了一副新眼镜，其观点清晰、犀利、新颖。它为解决资本主义对公共权益的威胁问题提供了一个锐利的新工具。

——**迈克尔·波伦** 《纽约时报》畅销书《杂食者的困境》的作者

巴恩斯的关于公益信托的概念充满了智慧，影响深远。如果能够被大规模地实施，它将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

——**马乔里·凯利** 《资本的神圣权利》的作者

